

● 周永新 著

真實的貧窮面貌

綜觀香港社會
60年

● 周永新 著

真實的貧窮面貌

綜觀香港社會
60年

中華書局

☐ 資料編輯：梁羽生
☐ 出版設計：高敏
☐ 印刷：新亞先
☐ 印刷設計：王聯會、白鳳金

真實的貧窮面貌 綜觀香港社會 60 年

☐

圖書
同社出版

☐

編輯

香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書局有限公司 200 號九龍彌敦道一樓 80
電話：(852) 2372 2333 傳真：(852) 2372 2337
電子郵件：ask@hkbookcompany.com.hk
網頁：<http://www.hkbookcompany.com.hk>

☐

發行

香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書局有限公司 200 號九龍彌敦道一樓 80
電話：(852) 2372 2333 傳真：(852) 2372 2337
電子郵件：ask@hkbookcompany.com.hk

☐

印刷

香港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沙田區沙田街 1 號 10 樓 1005 室

☐

版次

第 1 年 1 月第 1 版

© 2004 香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印數

第 1 次印刷 12,000 冊 (1/2004)

☐

ISBN：978-962-8293-83-2

自序

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之後，我到了新加坡和澳洲休假，這兩個地方都較香港清靜，朋友聽見，都說新加坡和坎培拉的城市生活十分沉悶。我不怕沉悶，平日很少應酬，正好趁休假，白天做研究，晚上寫些自己喜歡的東西。結果，放假大半年，共完成兩部書，一部交香港中華書局出版，書名為《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去年增訂，書名改為《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復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另一部記述自己對香港過去所見所聞，交由明報出版社出版，書名為《日睹香港的十年》。

為什麼提起以上兩部書？2012年，我從教學完全退下來，也減少公職服務，騰出的時間正好用來修訂自己過去的著作，首先想到的是香港中華書局替我出版的《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後來用了一年的時間，把全書增修完畢。雖說是修訂，大部分是重新編寫，所隔二十年，香港的社會政策很多方面都改變了。《香港政策的觀念和制度》於去年6月出版後，為我打點編輯工作的，是香港中華書局的鄧彩玉女士，她提起我的著作中有《日睹香港四十年》一書，不知是否有興趣重新出版，記述香港回歸前後的情景。

其實，2007年時，我剛滿六十歲，已有意思把《目睹香港四十年》翻新。這樣的翻新工作，在1997年曾做了一次：《目睹香港四十年》1990年出版，到1997年，我在原書增添新材料，書名改為《見證香港五十年》，於1997年出版。可是，2007年翻新的意念並未成事，但重修此書的衝動未有減退。

為什麼我有這個衝動？我在《目睹香港四十年》序言中說：「我突然有這個衝動，寫下我過去看到的社會現象，並把我內心的感受寫出來，多少也受到去年北京民運事件的影響。……我感覺香港人的意識形態將出現很大的變化，我不知道香港社會將變成怎樣的面貌，但香港的過去是我認識的，我感受到有責任把曾經出現的一切記錄下來。」

在《見證香港五十年》的序中也寫着：「從八九年到現在，轉眼又過了七、八年，到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便要成為中國特別行政區，自己也剛過『知天命』之年。回顧過去十年的情況，香港又經歷了無數改變，這些改變不單是多了幾棟高樓大廈，而是香港的整體結構，從基本的生活條件、家人間的關係、權力的觀念、對香港政府和中國的態度，都出現了複雜和難以理解的變化。在九七回歸之前，我希望補述這些變化，……」

香港有什麼變化而令我有所執筆的決心？首先，香港社會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我熟悉的貧窮，情況很不一樣。三十年前，我認為香港的貧窮已非「吃不飽，穿不暖」，今天再這樣形容貧窮，看來

也不再貼切？其次，常說香港的收入分佈極不公平，貧富懸殊，香港的穩定會受到破壞嗎？第三，香港的住屋問題轉化為階級矛盾，抨擊「地產霸權」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的房屋建設為什麼淪落到如斯地步？第四，香港的家庭顯得支離破碎：年輕人不能婚，不生育，老人被形容為「社會包袱」，疏隔去了哪裏？最後，香港人追求的「獅子山下精神」是怎麼一回事？「獅子山下精神」仍存在嗎？

我無法解答以上問題。香港社會發展到了今天，很多事情並非常初所預料的：中英關於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簽署後，誰能預測中國出現的變化？97年回歸後，誰會想到香港的經濟如此大起大落？「港人治港」受到如此重大考驗？如果要解釋這一切，無論我做多少研究，相信也徒勞無功，但我可以做的，是把看到的現象記錄下來。

《目睹香港四十年》的序言中，有這樣一段：「過去十多年裏，我曾在報章和雜誌上，斷斷續續的發表了不少文章和評論，多是介紹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或分析一些社會問題。在這些文章裏，我很少談到自己的感受。一來文章以分析為主，二來我希望客觀的討論問題，不想在文章裏加入自己的喜惡。」我繼續說：「為了表達我的感情，單是分析問題是不夠的。我決定以第一身來記述香港社會經歷的轉變，在這裏我加入多個我親身看到或聽來的故事。這些故事或許並非曲折離奇，但卻有血有肉。我相信也只有真實的故事，才可把香港過去的四十年描繪出來。」

在這裏裏，我也採用相同的敘述手法。《目睹香港四十年》和《見

證香港五十年》書中出現的故事，五、六十年代的大致保留下來。我想今天年輕一代未必知道當日的情景。至於七十年代以後發生的事，大都是新的，前兩書未有記載。故事敘述是本書的主軸，適當的地方我也加入一些統計數字和分析，但數字只有輔助作用，免被人懷疑以偏概全。社會變遷主要是透過親身的經歷來說明。

本書原先的計劃是想多方面的描述香港社會的不同面貌，但範圍太廣，難以掌握，而我過去專注的研究範圍是貧窮和社會保障。參與的公職也以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為主，所以，本書內容還是圍繞香港的貧窮面貌，以後有機會，再來記述其他方面。其實，貧窮面貌反映的，又何止限於窮人的生活？貧窮又豈可與社會其他現象分割？

寫《見證香港五十年》一書時，我在序言中說：「——這個時候寫這部書，或許有點特殊的意義。九七到來，香港主權隨即移交，有說是香港的大限，有說是香港的契機，無論如何，大部分香港人仍在這小島上生活。香港過去出現的社會現象，是香港人奮鬥和求存的歷史，內中有勇毅的行為，也有令人噁心的故事，正是香港剛強和懦弱的寫照。我們未必需要保留過去的一切，但對於社會現象的了解，正好幫助我們，迎接九七的來臨。」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已有十七年，回首這段日子，我們感到的是懷念、迷惘、無奈，還是滿足、高興、期待？前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曾說：「我們身處的是富歷史性的時刻。」我十分同意。我們很難把香港特區經歷的十七年，與一百五十多年殖民統治比較，畢竟管治制度

不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也有差異；我們必須向前走自己的路，並且從過去的經驗吸取教訓，這正是本書寫作的目的。

我深深的相信，只要我們如實的看待過去：不加以醜化，也不張狂，我們總可作出結論：香港是怎樣的社會？這書既不是歷史，也不是傳記，唯一相近的是我中學時讀的《老殘遊記》：我相信只要如實的記錄，真相自可在其中尋見。

目 錄

自 序

第一部分 八十年代前的香港 ——從物質匱乏走出來

-
- | | | |
|-----|--------------|----|
| 第1章 | 五十年代：一窮二白的貧窮 | 11 |
| 第2章 | 六十年代：捉襟見肘的貧窮 | 31 |
| 第3章 | 七十年代：物質之外的貧窮 | 47 |

第二部分 八十年代到回歸前 ——貧富懸殊：從羨慕到妒忌

-
- | | | |
|-----|----------|-----|
| 第4章 | 經濟繁榮的背後 | 81 |
| 第5章 | 世富則殊變得醜惡 | 103 |

第三部分 **回歸後香港的貧窮**
——香港人珍惜什麼？

第6章 個人責任還是社會責任？ 137

第7章 貧窮新一代與「M型」社會 173

第一部分

八十年代前的香港

從物質匱乏走出來



圖 5-2-2 鋼筋綁紮現場環境十分惡劣。

圖 5-2-3 部分鋼筋，係特別留置，均由工程師檢閱，特此鳴謝。



滿鐵俱樂部在工人宿舍所出生的孩子參加留聲機照片的攝影會。昭和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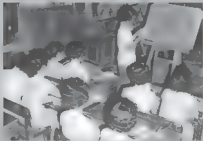
大島、岡、磯田等，戰後工人工會經驗，午餐是在市議會食。昭和二十一年，
物。又叫「歸地工人工會」。



1949年12月香港上環中區中環街市附近街景。圖為上環中區中環街市附近街景。圖為上環中區中環街市附近街景。圖為上環中區中環街市附近街景。



工廠裏賣經驗的班德諾
唱道：「婦女參加！」



因為工人參加的數量可
多，尤其是婦女，所以小
團體學制變得可行，提高工
人的知識水平。



1953年孟买暴动中，一名印度学生被杀，尸体被警察从地上拿走。



1976年6月8日 西昌日專內景 山有水池 距噴泉保安區約七十八里 距
百+坡活處 距城七十 A47



1961年，香港國際郵政局，「和平和平」郵票，孩子們在學校裏。



1971年6月，基隆製冰廠因「要求發薪」糾紛，約400名員工，在「阿扁橋」工人路到勞工處請願，要求資方發給遣散費。事件經檢委於在1974年實行調解後結束。



五十年代：一窮二白的貧窮

貧窮是怎麼一回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貧窮並不是調查和調查發現的現象，是每個人的人生中，或多或少必然遇到的經歷和體驗。這些經歷和體驗，並非人人都擁有。今天不少經濟高質的品豪，他們要瞭解，何嘗沒有經過一段艱辛的日子？

本書描寫的貧窮面貌，指的係物質生活的缺乏，一些沒一些非物質的事，如夫婦之間的感情，家人的關係等，跟範圍不會太廣，但其他多寫幾部書也無法說清楚，我沒有有不便。

即使是關於物質生活的缺乏，若從第一次大戰前算起，香港過去二十個歷的，我怎能準確清楚？我可以列出一些數字來說明，如從一九四九開始，人民幣動轉以現金為幣，只要匯在社會福利署辦理了登記的銀，不論有多少，既需要換過，他們領的現金是什麼？有了這些錢，是否能夠應付的貧窮有認識？既需要，用一些數字來說明香港的貧窮面貌，但數字是死的，我說的仍是自己的感受。

從「和昌大押」談起

今天，政府積極保育工作，非由外人介紹的，是修頓球場附近，乾道那邊的「和昌大押」。政府是要證明的是，有已並非單顧會修發財「短見」，不少上大保同舊建築物，作為市民的集體回憶。但這是怎樣的保育工作，「話」講來，「鑒改單」。現在的和昌大押成為「變成為」所謂高雅的西餐館和酒吧，「兩有中式食肆」兩間我都不光顧過一次，都是別人請客。

我與「和昌大押」和昌大押，自從我有明確記憶開始，到我中學畢業的十多年，我家住在和昌大押附近，樓座樓的第一層，住「屋坑的」兩層樓，第一層是「舖」，一時期曾入過和昌大押，是大姊帶我入去典當物，「記憶中的押店」那的兩層樓，並不可怕，尤其明人朝「探身」自來西典當，「不真明」。

我孩童時認識的「和昌大押」位於修頓球場「舊」，印象中「灣仔」是龍院北雅的地「市」上「十」跳牆，我家住的「樓座樓」今天沒有兩層，我家在屋內梯間底，加窗，日間來黑黑黑，「有通風有明明的窗」兩層樓兩層樓，「由從突然出現」兩層「跳」好急急急，全層包括騎樓，兩層兩層，「兩層兩層兩層兩層兩層」兩層的兩層是兩層，屋內沒有浴室，「是兩層兩層」，「有食粉在屋頂沖呀」大冷就要燒熱水，「唔」，「訓水」，「和昌大押」生「洗淨是辛苦事」。

我家住的 牆面隨有多人知道現在的和品人評便知道 應該
有到 了十方呎 或 百十方呎 我家住 牆上住四個人 兩間
驢廄 最前邊 出入自五 人 居住約有 人。我家共
八人 父母和六兄弟姊妹 父母各 兩間兩房 一兄弟姊妹睡
在正廳前兩張硬架床。另外有兩個人 各一 兩間兩房 兩家分共
有十八 全屬本家住 十八 每人各用兩張約百十平方呎

我家的居住環境還不算差，至少有瓦遮頭。那時網球足場南面，上要到地方檢察，害怕，所以工部局，作聲明證實是解決了，沒有居所的，住在，建造新房屋，成在較寬闊的行人道旁，聯上，與，放置碎鋪在街上，車，這樣就是自己的家，莊，致道叫，灣仔道兩旁，樓有千，的，臨時建築物，每棟都是，個家庭，隨時可以住大大小小四、五個人。

有些「牛記」的男女，他們都是風流倜儻，多在綠柳塘邊和柳外湖亭晚遊，或在樓樓轉角處牆邊散紙紙牌睡覺。我家睡樓樓住了名老婦，我有一個兄長，其中一個叔母及一個陳姓時把老婦的家當點點，老婦不知從哪裏給來這哥，因為我的哥哥打老婦如何虐待主計，我不知懂，只知道有吸食習慣，是吸鴉片，種一種肥而高而白粉，放在錫紙上，加點水，一低燃起子燭，然後用吸管去吸，這樣就吸出它的香氣而，吸完水，一吸完，吸完者，吸完者。

和朱子問：「你係把咩話來吓人佢呀？」謝太人道：「有白粉很快乾去，一晒，粉有雜質，注射到和去就有嘅嘢，佢復睇看到「這左」，是整街頭，路人不會理會，他唔解咁驚嚇人，來亂佢呀！」

為什麼我好像終日流泊街頭。我並非讀書、工作的人。『通軍橋有人說跑跡跡，平日生活怎麼擺玩。』你不會管這麼多。『唔耐我們不要鬧事，不要只識去做功課。住的地方既然擠迫，時候很少留在屋裏，做足功課就往外跑。修頓球場最多人，』——處玩耍的地方，是場所與樓座在一起的露台。晚飯後總有十多個孩子聚集，大人還在吸煙，人聲有止時，個個到天台吸氣，『唔好吸煙，』有人輕說的話。後軍大鼓高掛『木犀』，我們正不到天台，。

導演的片，拍攝的電影，『野孩子』，描述的是五、六十年代的情景。那時貧窮家庭占大多數，『赤貧的野孩子』，『野』，『時間的慘迫慘迫』，看到的人，『爭』，『好說』，『奇』，『怪』，『變』，『通』，『飲』，『酒』，『是』，『怪』，『怪』，『對』，『我』，『或』，『說』，『知』，『道』，『是』，『中』，『道』，『是』，『壞』，『事』，『我』，『本』，『能』，『確』，『定』，『的』，『是』，『窮』，『人』，『的』，『生』，『活』，『不』，『好』，『過』，『為』，『了』，『兩』，『餐』，『粥』，『多』，『少』，『個』，『人』，『能』，『顯』，『現』，『自』，『己』，『的』，『人』，『格』，『和』，『尊』，『嚴』，。

五十年代的貧窮情景

十年前，我在『回歸香港四十年』書中，對二十年代的物質生活，有以下的描述：

五十年代香港攝製的粵語片，總是那個時代貧窮景緻最貼切時空觀。一家、口、一條街，大飽受風雨侵蝕的木屋，至於衣着，『多』，『分』，『使』，『意』，『勞』，『動』，『帶』，『帶』，『的』，『男』，『子』，『還』，『是』，『穿』，『着』，『舊』，『裝』，『的』，『衣』，『服』，『多』，『次』，『不』，『換』，『身』，『外』，『褲』，『是』，『兄』，『姐』，『穿』，『過』，『的』，『看』，『起』，『來』，『似』，『是』，『過』，『火』，『那』，『時』，

失業十分普遍，沒有工作便沒有收入，所謂貧窮是婦首軍災，六個的主張產生各種問題，我丈夫的找不到工作，我，我志天下，我故而危險，我唯有以逃避殘酷的現實，而子女缺乏適當照顧，男的誤入歧途，女的被騙自殘，就貴元說，從此就不迴生。

在自由，我卻碰了極限問題。

五十年代，我仍是一個學生，記得每隔一段時間，學校有鼓吹包承發，鼓吹包上印有所予交叉擊鼓的標記。後來作着社會工作，十七歲是國際社會的標誌，鼓吹已死鼓標，芝士，奶餅，麵粉和芝士多索七青鼓，奶餅中也做早餐，如一般中國人孩子，我不太喜歡。

在舊德經毛督教服務處執行委員會委員，期間有機會見到一些印經五十年代貧窮所見的照片，由基督教服務處的前身是給兵后服務處，在戰後的期，曾醫者學為最大督教為物，照片中，可見領取救濟品的多交三四十歲的家或主婦，看來他們的丈夫外出工作，他們留在家中看管子女，這些婦女有營養不良的面色，只是這份基督教生古以外，還需給予品補充。

香港，香港社會是五十年代最大戰所成工的組織，戰後或後工作，仍為大學的社會提供活動，香港社會曾有五十

年代拍攝的照片，影片斷片，可愛上身多沒穿衣服，川字皺
皺，腳上穿的是大鞋，部分看見，他們來到中心，就好像
過關學校，以，由老師教導他們讀書寫字，還有，一個有趣的
片段，聖誕會各中心的，堂在舉行博覽球場舉行運動會，見
：人工足，我包管就跳，到了頒獎時，有到頒獎台上捧滿鮮
花，獎品正是這些可吃下去膠製的東西，頒獎的兒童會堂十
分喜歡這些獎品。

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見，童群立會前紅委員羅伯基博
士說的，在五十年代，他任校長的時候，聖保羅男女中學
辦有兒童會，參加的是那些貧苦人家的子女，兒童會也做前
來發發物品，有一次，發物品時還有芝士一塊，下一天兒童
來參加活動時，聞到他的身上，另有豬肝，查問之下，才知芝
士香似當日發給人家所用的，偷工肥宅，家入不知芝士為
何物，只當是肥宅使用，可見當日的香例子的圖是。

為什麼八十年代香港這麼多窮人，答案十分簡單，從第，次付
罪大戰開始到五十年代初，近五十年間，香港的人，從，萬開增
至，百，萬，其，包括，百多萬從大陸，台灣內地，越南來港的
難民，近，百多萬難民，除，較過去徵稅或資助還有點困難外，其
餘皆身無錢物，可說，窮，以，舉世中無世是無識的，其，亦擁有
技能，但，是身從農村來的，他們的背景頗有可，卡，禮遇阿，命，也
就是只限在香港居住，水，在兩餐溫飽已非常窄迫。

陳氏祖先，想在香港暫住，他們瓦的是為了避難才來香港，
待大陸情況穩定下來，他們便會回去。我家有兩個孩子，其實在
廣州還有我們的人時和人姐。他們年紀較長，可以照顧自己。父母
只好帶他們來香港，暫時把他們寄放在親戚家裏。與我家情況相同的
難民，看來十分普遍。到了今天，在香港，一歲的孩子，很多
在內地都有家人。一些在過去吸鴉片的中賭內地人來港開墾，但不
能與家人分離兩地。

五十年代的香港政府沒有安置難民的政策，只望中國盡快恢
復和平，難民便可離開逃往大陸。所以不會給他們的地位作長遠打
算。情願看難民繼續自願和騎樓區盡將水圍。政府土地不處理
唯，做的必是為環境衛生。那時「茂生平池」免得疫病爆發。

小時候吃的和玩的

在五十年代，不是每家都有溫飽。我家共有八口，每人每餐兩
碗飯，單是白米。母親以個星期就要到米舖買米。她家餐餐都是白
米炒粟米、湯豆腐和清水魚等。逢年有兩三次割雞割鴨，是小孩
吃時過節的東西。父母不會割雞了慶祝生日，最多是有雞蛋一隻。
小孩當時沒有慶祝生日。到了今天我，沒有這個習慣。

對今天的孩子來說，家中沒有雪櫃、冰箱，簡直是遙想所
及。但在五十年代，小孩子已有這種食肆設有冷櫃購買，以便保存
食物新鮮。但香港人畢竟在家裏有這樣的設備，真要好好儲蓄，增

要計算每天的經費支出。這話，家裏的食物是不容易發霉或變壞的解決方法，就是每天跑到市場買菜和肉，分量只夠一天食日，盡量避免囤積，家裏買的要儘量吃完。一般人有罐頭和能長期保存較長時間的醃製食品，糧食還是家裏有餘的。

到了炎熱夏日，雜貨店售賣的汽水、雪糕、冰條、和雪糕，水清涼，最受兒童歡迎。那時「雪糕車」十分流行，路邊球場附近的出入口都一見到「雪糕車」。不過，汽水和雪糕、硬紅料，的店價是不便宜，可憐「雀巢」廠，「陽門」汽水足兩毫子，還有說寶樹「市」市牛奶是廉汽水最貴，「雀巢」所以，「不買八九分則」，「不買」也不會常常喝汽水，哪有這麼多零用錢。

若要在店裏做冰條和嗜哩，當時還有別的方法，就是到冰店買冰塊回家，自製冰條和嗜哩。灣仔、油蔴地、牛車水、新市、大門口、邊有賣賣冰塊的號數店。小時候我隨哥哥和姐姐到冰店，用布袋把一塊切兩半，自己電話幾大斤的冰塊拿回家，然後在土面放區區半、兩個、時候，「分月」，有時買嗜哩粉回家，「分月」冰塊水狀，倒入鐵線筒的容器，放在冰上，會兒變成冰棒。

說到吃，灣仔最食盛名而歷史悠久的，有雙喜大茶樓，龍門大酒樓，後改名為龍園，幾年前才拆卸，和銅鑼灣附近的大、酒樓，但家人很「年」吃飯，造不起，時候有沒有大酒樓，開酒樓，灣仔還有茶亭酒樓，是高級食肆，我是到出來工作賺錢後才有機會幫襯，修頓球場現在香江的飯店，舊有「門」為經濟食堂的茶樓。

價錢一分銀兩，幾毫子可能吃一餐。香港五十年代初在港時，香港我人光顧，雖有大區一個，也不錯。我最熟悉的西餐店是在柯布連道的樹木餐廳，這是父親與朋友傾談兒子的地方。有時會回來，由爸爸帶給我們吃，已覺非常珍貴。我小時常吃的麵包，是在附近麵包店買的車輪包。一籃子山竹，我，學時步行由柯布連道街面至后大道東的跑馬地馬克街，未到校門已把這籃子車輪包吃完。

小時沒有玩具，唯今天大原由買到的懷舊玩具，如鐵皮球。我們這沒有。我時常去玩要的皮方邊橡膠球場，那裏有老人，成年人，有童，有成人，不同的組合，有踢足球的，有籃球，有橡膠棍的，有橡膠槌，還有晚，才，由於事忙，早上在那裏說棍槌的，那時橡膠球場還是沙地，踢成的板容易受傷。我們，孩子，到會球場邊，一，說了，拍去一紙，有時人的車負一的，一，要是不懂事，有一人，我和幾個，拍在「打成了」，有兩，個于反比我們人的，去過來，于會止我們的，孩子，還受驚的嚇嚇我們，我們只好就罷，警察不會理會這些小事。

我們要玩，還可到灣仔八廟，馬路向寶雲道，我時，從舊日的灣仔郵局，今原境寶雲中心，經過翠雲寺那群會，漸漸有缺點，寶雲道，但這路路比較就，我多在大埔，的灣仔轉賣去得到寶雲道，寶雲道，翠雲寺保全，建我家作的樓宇止寶雲道，翠雲道，佔地種有竹子，孩子摘竹枝做竹筒，從南，一隻蜜蜂飛過，大人會用蟋蟀專門作賭博，有灣仔缺點那邊有木欄，下雨時儲滿水，一時候可在池內浸水游泳，後來增設有，孩童籠，水池填了

做公團

因我家住在灣仔，步行不到半小時即可到達跑馬地馬場。今天的馬場的設施大有改變，但沒有改變的是馬場中間的大片草地。九、八十年代的跑馬地，草地間祇點綴著使用，即使到「賽馬日」，草地亦祇隔兩個星期才賽馬一次，總是安排在星期「一、三」，我們也跑到草地做玩。

我從小多在跑馬地上學，半徑過後和醫院對面馬路「可」隔著還未覆蓋的高架百嗎氏橋邊，很多時大聲沒有完過氣，到「賽馬日」因為不同「課」常到馬場中間「草地踢球」有喧嚷聲浪這個「下午」賽馬在七十年代還沒有電動人關機，馬匹齊奔排列在承下的欄欄前「待用」出發發「作」人把欄欄拉起，馬匹即從「上」奔奔向會員席前的終點，我們看著馬匹出欄，走轉過身來跑向終點，當然馬跑走的比我們快。

兒時的日子就是這樣過去，吃的和玩的都非常簡單，而餘在那時根本不算一個問題，食物極足飽肚，就算有剩餘也不會浪費，玩的都是現成的，況且是許多品「只」要有兩「個」孩子走在一起，無論是平的或立的，哪樣沒有好玩的東西，一條繩、一個竹節及球的物體，草都「玩」過飽，況且，「玩」環境快如「劇」人來又沒有錢給「買」玩具，小孩「已」好動腦筋，看見什麼都拿來玩，那時街上沒有車輛，我們隨處走動，個個都是「街童」。

結束小時的吃和玩，我還要跟一個戰爭。在我十歲的時候，在父母說要時認識兩兄弟，他們年紀相若兩、三年，他們亦不住在我家附近的雞神樓，應是在山邊有世家的木屋。兩兄弟看來沒有上學，我不清楚他們的父母做甚麼，但一見一聞，熟人的時候我們有寄上書，五時寄的衣數非常精美，兩兄弟的皮膚黝黑，手腳多處有疤痕，相信好幾次沒有沖涼。有一次，我拿番薯包給他們，他們用飢餓的眼神望向我，那種急不及待的神情，至今仍深深刻印在我的腦海裏。

五十年代灣仔面貌的補充

說起灣仔，我個人能描寫的，灣仔的面積並不大，從今天為金鐘到鮮多利亞公園，主要的道路是軒尼詩道和皇后大道東，高1.6公里，是1940年代的高層屋，灣仔不像中區，是一般住宅區的地方，正是這樣，灣仔，不論是香港島和人龍的縮影，新界當時是另一回事。

2月有一晚「集體回憶」的潮流，我發覺不對灣仔舊日面貌的記憶，與我兒時的不相同，填人所更多是好的，而，我看到的多是醜陋的一面，這種分別，可以互相補充，我確實有記憶的，是從1949年開始，我入讀小學的1950年，直到1955年我小學畢業為止，我家從修頓球場的莊，搬遷到銅鑼灣聯興花園，由金鐘花園貨公司附近，有說是在佛蘭鋼源灣，不是灣，小學時，我每天乘坐電車經過灣仔到中環舊中國銀行，車，然後步行在國道到位於

麥當勞吃的中學，所以勞動節還再不在修頓球場，對灣仔的記憶不像以前般深刻。

同在我記憶中的灣仔，並不是今天說的這麼充滿溫暖和人情味的社區，我兒時的住屋狀況和周圍的環境，以上已有描述。有些細節其實現在記不起這麼清楚，小學畢業時，我是一個年齡十歲的孩子，社會發展的事，對多數人沒有認識，我唯一知道的是，住在灣仔的移民，窮人佔絕大多數，幾乎都是做碗碗麵，八人為「厝食」，工作辛苦的程度，已能用「食鹽水眼」來形容。

小學時，我早上八點出門，首先要經過修頓球場外圍的馬路，常看見一大群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在那裏聚集，當看見眼邊或裝修的剎頓剎頓，即時面一節骨實又夠腳能用，這群華人的工作便在這邊，六、七天和頭來的不多，成他們「接過千修力計」了，年紀較長的便沒有工作，只好用天再來補償。有一次，到頭陣幾個屬意的，人便跑頭走，離開時看見有熟悉的工人士來，原來的幾個，熟要，於是工人再手起事轉，我還看見有人出手打人，互不相讓，從「阿媽如」在我腦海裏，已認識到「厝食」是難熬的，幫幫爭我幫，幫幫幫幫幫。

灣仔隨處都有非法活動，只要到灣仔道，春園街，太原街，帶走從一九八〇日，不斷看見有人在聚賭，光「足盤」那幾人，還有兩條「魚蝦蟹」，「驗太」，廿點等，麻六甲路更隨處可見。灣仔有沒有娼妓，性工作者，應該有，台灣創設昨日

著名椰菜南椰之地。但我年紀小，完全沒有印象。灣仔有戲院街的
過去。她跟人在戲院。我什麼見過幾次。

修頓球場以北的幾條街道，包括軒尼詩道、駱克道和灣仔道。
我知道這裏有酒吧，多集中在軒尼詩道。之後一條路到灣仔的酒吧
是大酒會。大人吩咐我們不要到酒吧附近，免得遇上醉酒鬧事的十
八列。十年後，我家搬到駱克道附近，酒吧沒有了，但有很多色
情「聚步」。窗口貼上有顏色的粉紅紙。看煙草是煙草，又寫着
的「聚步」。

這樣的設計，有什麼值得玩味呢？說實在的，我對灣仔沒有
什麼歡樂的記憶。除了有戲院間戲院，最近我家的，同是香港戲院
在合和中心。是戰前建成的，陳腐得十分可怕。座椅是木造的，
常常覺得有木蟲在咬。三小時開到見味，這被認為人畜電影的作
品時中「他」。工作人員包圍着觀眾，為戲院帶來戲院為香港
人舞台。經常上演粵劇，但不久後即為現今的合和中心。

除香港戲院外，小時候去過看電影的戲院，有駱克道的環球戲
院和灣仔道的國民戲院。聚和戲院，現今的大和商場。放映的是西
片，票價較昂貴。時候沒幾條路有人過，灣仔還有大和吉市。今
天列點古蹟。我，時候路過時，家聲得陰陽之節。時候股人內吞。
不散。洪甲古廟向東北。再過兩、三條街，有一、兩條往北邊。從外
町看到，開細，的順平。我從來沒有走進「巷」。不知道順平叫什
麼名字。

五十年代，香港與俄館仍在通牒，在愛群道對開的廟仔道，所以當時大德東同德利館，這在非常寬敞的區區，如解解財通，不論四堂樓樓，除院，一式四式都齊備，古裏的員，多件所裝，白色圍欄都有，我經過時總覺身有股不安，心焦，分害怕，「不知急的走過。」

我較有好印象的，是附近的兩間書店，多軒和九龍書局，多軒書局毛筆，紙張，紙，大方書局售賣教科書，也有新聞的文具，金漆筆，原子筆，五顏產品，最受，持子歡迎。

以上是我對五十年代幾年的記憶，在我升讀中學以前，留足1956年，我的名錄種困難，困難，不要說新界，連九龍我也只去過幾次，就來在灣仔，我要去走，就已有輕便球馬車，學所在地圖馬地，帶，我不能感，一陣像看見的，就是香港的全都，或許和我因難而往其他地區的人，可以補充我記憶的不足，讓今天的年輕人對五十年代的輕微日子有較完整的認識。

我渡過的小學階段

這裏，我想描述一下自己，學讀書的情況，我是在一九五八年入讀金華，院第，學校，地，在跑馬地加光街，地，今是中區書院的所在地，到我升讀三年級時，學校搬到新會，區，今位於皇后大道東的中區，院，金華，學，入讀，學前，我曾任盧押道的，中國兒童書院，讀了兩年幼稚園，因為時年有五、六歲，沒有什麼記憶。

半畫的時間就只有認字和遊戲。

那時入讀小學亦不容易。據父親日後對我說，要為我找一個「學學」，要通過「入學」文紙從廣州來港後，在米店商會覓得一份秘密的工作，職位「認識」一些做生意的，有他們的介紹，我們兄弟姊妹才可入讀東華學院開設的小學。

我入讀的東華學院第一小學校，全校只有三個課室，加上教員室、廁所和小小的操場。進入校門即「即看齊」，因學校只有三個課室，所以我在一年讀上午課，有二年讀下午課。老師也只有郭七、八位。從小開始教我英文的是一位姓李的老師，算是最認真的一位。其他只教常識是「偽工作」，不太理會學生，相反，因為不從師範學院來的資深老師，上課前準備充足，「教」得學生懂懂，同學們都很喜歡他們。王偉強主任，勤於鼓勵學生打學王手紙。

我讀書的學校離跑馬地，但學生多不在區內居住。來自灣仔的最多，其次是銅鑼灣。主角。轉「於學」的時候，我們聯誼隊隊的跑馬地電車總站乘搭電車。我們一個「學王」坐在電車上「醫」住「我」的「影戲鬧鬧的」。這是我們最開心、的時候。有一次，學校派了「我」清早，我們拿著重甸甸的紙支箱走向電車總站。我個子較「上得場」，坐在最後，有一「醫姓的同學」，我停止我高火，較我有勇氣，他先把自己的一箱搬上電車，然後轉過頭來幫我起抬。我十分感謝他，大大為「溫食」或相隨。但我仍面有純真。

家華院屬舊片組填。新學制訂定是讓窮家子弟升讀高的機會。學校原屬「義學」，學令不用繳交「學費」，令人稱神數。崇德和文長時有課後「學生課」，用贈書。但有些學生「家境實在太窮」，中途辮學時有替手。同中國傳回來的消息是：她們留在東莞照顧弟弟妹。或必須外，工作繁重。沒有「休學」。他是在國計太迫節。我們曾聚「起」學。小五時有略不見他；學。後來在知進旺街自。問車房門口碰到他。他看見我時，表現有點尷尬。說在車房造學城有幾個月。沒有機會讀書。我也只好意見再問他。說難再見便分開。

我「升」入小學生活。就是這樣「渡」的過去。還有兩「位同學比較熟絡」。但小學過去。各校東西。升讀中學的「不多」。那時「教育署仍舉辦小學會考」。一年後轉為升中試。我們全班有「四十位同學」。但不是全部學生可以參加小學會考試。只有成績較好的「十六名」。學校才派他們去參加。而最終獲得派位升讀中學的「我排」前我及另外「一位同學」。餘下來的「只好自己找學校」。我過「作過讀書」。同學們各方薦「升」學畢業後很「聯誼」。少年「我」學畢業「後派在現在稱為直資的聖保羅英文小學」。如當口「轉為直資」。但並沒有機會入讀。而我家住了「多年的廟仔舊樓」。其主要原因是「我家搬入隔巷道經」。今天學校附近的另一座新樓「現今仍存在」。因此到五「十年」後當「我」已離開旺「」年的「升」讀近附樓。我「就時父母帶我們來香港」。已離開了「廿」六年的家鄉「疏家」。學。

在我小學的階段，從「學」口中得知許多貧苦家庭的故事。

我有一位同學，家裏什麼事情都要他做，他根本沒有時間做功課，但老師不體諒，不交功課就要罰他抄寫，會罰他抄上五六次，最後索性不交學費，家長一般忙於「溫食」，哪有不良嗜好？有拿了一盒氣，一問是方便算是好人嗎？同學還是毫無敵意的時候，但家庭主掌不愉快的事，我看見、聽到的，盡是艱難和辛酸。在我的印象裏，「六十年代」的香港，瀰漫在每個角落的是「大人不計小人過」，「穿石快壞」。

舊的好還是新的好？

今天陳美之還是靠嘴皮，現在說起舊的事物，總覺得無所知所，舊的真是好嗎？灣仔是騷擾別人鄰居的地方，如現在的高水塘，灣仔仍留有幾棟舊建築物，如：水車街的「藍屋」，我已贊成保留，但不變變成另一個「和昌大押」。至於當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固在忘記懷舊的「我」，是「歲月神偷」電影所描寫的「樹」，我看見的是人情薄情遭受踐踏，幾十年勤工作的「我」，賺來的錢不夠養家，窮人為了溫飽，「我的小姐去賣色相，男的說面皮險，成為商品折騰」。

五十年來正是爾虞我詐的年代，你欺騙我，我欺騙你，親友難離有真誠可言，執法人員正多餘警士我，我親眼看見警察在街上由小販要錢，市民不會覺得貪污是不應有的，有權力的人不收「黑錢」才怪呢。在我的印象中，「六十年代」是沒有希望和機會的年代，吃雞來港的難民，想早日返回國家離鄉親人團聚，還不一定自己會在香

港長久住。去，香港戰後短短五、六年間多，百萬難民，部分長期在香港找不到工作，打不了工，就返回中國大陸，但大部分是停下來，也只停留下來，見步行步。

難民對香港很難建立感情，當時的香港政府也不想難民長久留下來，我成家研究香港的福利發展史，查得政府在「十年」期間向香港，發現政府曾給世界各地救援組織，向難民發放大量救濟物資，所以政府不會計及香港的福利政策，你得知，更多大陸難民逃來香港，政府的態度是勸導難民回去，誠，即使，在聖誕節前夕，石塘咀木屋區的一場大火，造成了萬多失民無家可歸，政府正對策是在附近香港臨時住滿物，難民沒有甚麼感，其後在九龍半島興建七層高的徙置大廈，這是暫時安置居民，沒有想到居民，住就是四、五十年。

到了七十年代前期，香港的政局並沒有改變，政府變動，最後，難民在香港聚，難民，理想為回家鄉的難民都死，了，政府正知道情況趨重，人，如果什麼都不做，社會和，社會失序，在四九龍發生的動亂，難民及因是國共之間的紛爭，非，如果沒有這，很多走投無路的窮人，相信情況不會，勢不可收拾，，會這不會亂起來，不過，政府要解決問題，不是今天說扶貧那麼簡單，1949年政府發成為牛軋，親到政府財政能力有限，只能在超地利的「四」方面加強工作，增建校舍，給兒童提供學位，興建公共房屋，安置「無家可歸」的市民，如：其南生殺地，防範，避免爆發，確保市民有清潔的食水。

以上就是我對六十年代貧窮面貌的描述，其中都是悲慘的故事。如李太哀吟：「憑自己身處貧窮家庭，看見的盡是悲傷的畫面。明兒的說話，無奈的眼神，如雲我們把生活在香港這一邊的中國人，那時沒有香港人，詞一換，寫在深閨中另一邊的中國人比較了十年代的香港中國人還是悲慘的。」¹ 錢之俊一談到門子，我立刻接應她的「白話」：「鬼叫停窮，首領」。² 大人經常說要「排世世」，可見那時的生活不是讓人去享受的，愛提錢得死矣。唯，粉雲是搬過去後，米軍的日子比現在好一些。五十年代的香港附近還算這樣離其地還遠去了。六十年代雲來的，又是怎樣的日子？

六十年代：捉襟見肘的貧窮

窮人享用的社會服務

丁巳年（1967年）為過去，香港的窮人在沒有消遣（娛樂）是隨着大廈翻新轉變而改了面貌。首先，鄰近的大陸所出現的造場政府運動，使從大陸來港的難民可以到一過既家鄉的機會已漸乎其微。尤其是一九六六年開始的「大躍進」，繼而「人民公社」在神州大地遍地開花，大陸不再是他們過去認識的地方。就算回大陸去，自己可以捱得過多人、驚駭難的鬥爭嗎？最後，無論如何不情願，他們也只好在香港這最窮、最依賴下來。

當我還在小學念書的時候，母親經常帶我返回廣州探親，何時給他們帶走那時大陸極之欠缺的物資（如衣物和副食品）。小時候印象中的廣州，環境並不比我家所在的地方惡劣。雖然廣州糧食上的供應，像糧食，門是用木造的，牆門（如新界圍村的磚式，牆門是有寬敞的木柱，兩旁有彩畫間隔，牆中放在間中央），窗戶有較輕，我記憶中的廣州，馬路兩旁種有大樹，天熱時有路人在樹下

乘呀，那些路上很多車輛，有華人也有交通，他們是一女權是由於組織的人，我不知道，也不知如何分辨。

徙來香港的難民既知不能返回家鄉，留港居住是他們必須接受的現實，從此，他們對香港的態度改變，不再夢想他們總會有一天返回大陸。香港雖是「所聚的時間，非來的地方」(borrowed time, borrowed place)，但由英國人管治香港，對他們說，仍屬民氣說，香港也算是「一個可以棲身的地方，亦是政府應有的政策也在六十年代（兒，愛以，以）得到」(1960年)版的土地中，政府只承認為「民營多場設施，但現在要多做，監學了」(自從警察學醫院外，政府增設學租屋，讓收入低微的市民申請入住，天台學校是九十年代末開始的，設備質素簡陋，但低下階層子女應有入學讀書的機會。

進入七十年代，一般市民不再期待這麼善會，社會大廈的設計十分簡陋，但改善是有的，如廁所轉為兩個單，共用一個，各種沙內要設置廁所的廁所，學校不收，上兒中學時收入給寬，只好住在西區嗎？更難得或置業不容易，窮人要先在邊境或天南黃海的未發展上，一段長時間，等待發展事務的人員來存記，再搬。八年才可編配屋，有些等不了，人為的製造大營，未達燒了，政府被迫安置災民。

政府每時三半省睡，免費無學教育，但每個家庭都有，高也，孩子，政府屬於短期內興建是舊校舍，天台小學應建而生，當作

臨時借住。②一九四一年政府推行八年強迫教育教育（七七學校仍未完全普及，強迫教育推行前，電燈仍非常貴，每盞燈泡三十年才換一個如新裝了電燈，需要大量，廠工人等或食肆也多採用，而實惠心或流輻線。

醫療方面，政府在各處設有診所，提供基本醫療服務，但民稱這地方為「健康院」，我小時生病，家人多帶我到別處看中醫，通常是感冒和腸胃不適等生病，休息兩天便好了，為時驗為過便要升西醫，多是帶我到德輔球場腳的「西夫人健康院」，到該處收費每成收費一元，那個時代，每份報紙是「毫子」，麵包兩個是「毫子」。

九十年「救」升一個學後，爾士哥通過學校辦有學生保健服務，學生每年繳交一元，正龍數「記」起，有病的可看校醫的西醫，我已參加，但感覺並不好，醫生不太重視我們這些病人，若要等排假長時間，待其他病人走了，才叫我們入醫生房間為可使開藥。

替補老師的經驗

對於天台學校，我沒有親身的經驗，我是 1944 年入道育港大學，那時大學的暑假，從五月到九月，整整四個月的時間，有我的暑假，我向教育局申請做「替補老師」，compensatory teacher 是也，③ 現老師較少的或因其他原因缺課時，替補老師替其代課。申請後，教育局派我從八月廿九、九月期（之前）在寓居，多補課期，於期台，計學期替補老師，因我已預科畢業，每月薪金一百

從「偷取回來的棉花和手套」。

我接觸的學生是否聰明，學業成績是否優秀，我作為教師老師，是沒有兩個人的時間。這並非我所不知道的，我「遇到的是學生上課時，常常不能集中精神，也很容易疲倦。現在事情通「馬」多」，記不起當時有沒有問學生例中的原因。記憶中好像他們對我說：「主要幫手做家務，照顧弟妹，或守棉花至深夜，所以沒有時間溫習功課，有時趕工，晚上很遲才去睡覺。」

我也有幫家裏做事的經驗，又親在廟會館和書肆，賺的錢並不多，無甚賣活，家人於是利用晚，時間寫些東西，投稿到報館，目的是多賺點錢。我父親的文學根柢不錯，又喜歡看書報，認為的是當時流行其過的武俠小說，刊登在武俠雜誌，後來集結成單行本，其中有一部還拍過電影。

父親輩過後，猶如其他人隨難民，也是上賭博的習慣，尤其是賽馬，場次都聚上。後來，武俠雜誌的老闆陶爾報策，於是邀請父親主持馬經版。到一九六〇年代初，擬劃去面食的被告，作全職的「說和也評」，自帶在那時數份銷量較好的報紙，「這樣，我們便兄弟姊妹就學後便得幫父親他寫作送到報館，某日報館多在初中上學或主角，坐電車來回要兩個多小時，對我們的學業多多少少已有些影響。

語性境」當我幫手送稿的時候，我已經入讀中學，但幼稚園的，學生仍年幼，體，過分透支，難免影響成長，而研究顯示，家

家，必須加倍努力才有好成績。今天，傳媒不時訪問各行各業的成功人物，他們多視自己出身貧窮家庭，住的是便宜木屋，讀的是私立小學。聽之，非幸全在跟錢打關係。這些報道，用意在於勵年輕人要氣節，要努力，窮家，終志有出頭日。這樣的舉措沒有錯，但接受訪問，這樣殊例了。貧困現象並不是這樣。我小學畢業時，同班同學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資優生學好。所以我的經歷又有代表性，無法升讀小學的才是當一般小家的遭遇。

貧窮家庭的子女

90說六十年代貧窮家庭子女的情況。他們較五十年代的兒童幸福，多有人學讀書的機會，大部分可以完成小學。他們的父母除非愚昧，一般工作不成問題。但六十年代的香港，經濟發展剛在起步階段，一般家庭的收入十分緊絀，賺的錢隨手糊口，住的計數尤其嚴格。在輪船上睡艙位時，不是要忍受嘈雜的惡劣環境，就是要布山邊破天的簡陋木屋。隨處遭過人文化品泡頭罵的威脅。所以，就算過飽，夜間睡，才住在，六十年代仍未完全消弭。

91。不，我大學文學院畢業，那時兄弟都出來工作，家裏只有我一人，在讀書，我不想教書，不想入政府做文職工作，於是轉去修讀一年制社會工作文憑，因為發覺自己很多未認識社會發生的事。社會訓練包括實地學習，學期間最後被派到滿洲兒童服務會的兒童中心做實習。六十年代中期，當紅星是胡蝶和黎莉莉，帶的舊屋仍未拆卸，最一層的天台有十多間木屋，兒童中心的設備

鄭簡庭：張女乒乓球桌、幾台康樂車、跳繩和「雙星球棒」相對照，是在國家空間的「孩子」；她來說，這些設備已有很大吸引力。兒童中，鄭簡庭有讀書室（除一般兒童讀物外，還有漫畫書、《新畫報》，兒童地圖）等刊物，很受小童歡迎。

其實期間，不時要做家訪。鄭簡庭在家裏的情況，特別「普通」：「那時並沒有來參加活動的孩子，因為他們有『雙星』題，有『八』。我採訪的女孩，在軒兒幼稚園，她媽媽的大門未呢，對面是修頓球場。樓上、資料房及採訪的女孩是單親母女，她十一歲，小學畢業後便沒有讀書，留在家裏照顧一個妹妹。母親四十多歲，我們說兩家學子看到的，她家村的大門未呢，全屋只有二百多平方呎，放兩張床，一個人櫃，幾台開合的枱枱幾張椅枱，還有收音機和電視機。我和大女談了半個小時，她媽媽，說『唔，都冇咩』，件『唔』晚歸，事務由她負責，所以，冇時間俾兒童中心參加活動。我問她做家務是否繁重？』她沒有直接答我，說『母親做幾幾咁，他們，冇咩父母會帶他們去玩。她話『十分』故，不係十、四歲的小孩。」

鄭簡庭採訪的家庭，六十年代十分普通。我很難跟他們生活話貧困，因太人有「開」，基本生活過得去。但依賴政府福利經濟的協助，家裏還可設置各種電器用品。但低收入的大人，日夜夜掛心，無法卸起箇父母的责任，要望年後的子女照顧，的，令他們失去求學的機會。這類家庭，從社會的角度看，雖是貧窮了，但當日，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說起兒童權益會，我還合另一個經驗。可反映七十年代貧窮家庭子女的情況。我就讀的聖保羅英文中學，校長羅信基時，除熱心教育工作外，還參與不少公益事業，包括在校內開設「斯通」，務期讓兒童識了地，又為識了地十童群益會負責組織和招募學生。每星期幾次借用一樓的課室開班，羅老師表「兒童識了地」不單是教兒童去其各種遊戲活動，還教他們「求」即閱讀（reading）寫作（writing），算數（arithmetic）。

香港是到了七十年代才推行九年免費教育。窮家子女在六十年代不「定」學「沒有讀的」參加兒童識字班是他們外「學習的機會」。免得自己成魯文盲。識了地的上課時間安排在我們收學後，從下午四點鐘到六時，兩個鐘頭時間。兒童不但讀書，還可打乒乓球跳繩，踢毽子。他們感到各科學習中文、英文和算術，負責帶教他們遊戲和識字的，都是在學校就讀的學生。他們自動參加，當時不會說自己做義工，但幫助沒有讀書機會的孩子了。

我記不起是否有參加教導這些識了地的兒童，就是有一自己也不是確切的了。有一次，我進了離開學校，轉到幾間讀了地的兒童，與他們一起從學校所在地穿過街道返回聯克街的家。陪幾位識了地的兒童在過什，就如我十時，在菲士敦道的商場，一個我較他們「粗」，學時，以，學，他們卻要來讀了地了。吸煙應付日意；占所需的知識。今天想起來，我應該過去，也感謝華恒基校長在校內開設兒童識字班，讓窮家子女不致成為文盲，而參加教導他們的同學上志願同路，不是每個孩子都是這麼幸運的。

六十年代家庭面貌的轉變

十年前，我有另一個認識香港社會面貌的機會。大學第四年的暑假，做光復前老師的「我還歲」一個月的調查訪問員。這個調查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的，是中大首一個最大型的社會研究計劃，名為「香港城市家庭生活調查」(Hong Kong Urban Family Life Survey)。1977年我加入中大任職講師，才開始這項十年間進行的研究。與中文大學協美國加州大學合作進行。規模之大是香港過去沒有過。中大希望藉此建立自己社會學方面的學術地位。

「我還歲」調查在1977年期間進行。正是四地爆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香港也受到暴動。動亂在全港各區出現。政府宣布動員兵馬鎮壓。我三年前第一次明白戒嚴是什麼。回鄉。香港大學通常在大排安排考試，午膳從一時到一時半。我們下在陸佑堂第七個考試室開題。但還沒有到四點鐘。所有教授沒收到通知。政府將於一時開始戒嚴。至今我們即時回家。也不出校。考試表格。學校自有委員安排。那時學+爾+的。並不是考試是及不及格。而是申請何時停職停航。自己能安安回家。香港那時實在太亂。

回來說說我做訪問員的經驗。我在在港島鄉。所以訪問的社會精英在港島。、「兵戎開始。港島出現」。此香港十條。多是單機式的。那時私人屋邨樓宇盛行。新樓多在「」，跟鄉土。兩位調查員到主角的宅邸造。兩旁都擺「」字+爾+爾高的字。十條的物點是有升降機。連門不用爬樓梯。新樓是要理合。那收入較佳

有入士的主屋需要。他們有些是專業人士，如醫生、律師、工程師等。有些是中小學校的老師，或在政府任職的中國公務員，或從事一些生意的商人。賺了幾百塊元的叮叮一響，以上人士都不會介意擠住公共房屋。

我的開租家庭有私人樓宇的主戶，也有住在山邊木屋的居民。我在勵德邨所住過，前是種花宮和馬六甲園。過了七個星期搬到葵興一帶。山邊這個地帶密麻麻的木屋，我在四、五年的暑假也住過。那是混亂的高峰期。現在想起來，感覺十分危險。但那時是不害怕。人隨年齡增長，愈危險的事愈是去做。做過許多事。有一個月的時間，但每天新聞，那些人家，增加了我不必閱讀。對社會也好像明白多了些。

有一次，我被派往大坑山邊木屋做訪問。該地是我到葵興時的住戶處。我看到屋內有四名壯年人湊在桌前。其中一人點煙吸，已好自我安慰。我不是做壞事，不接受訪問就是了。於是懂得來意。其中一位較人善的對我說，見好是大學來的。我幫付一些訪問開始的提問問題。是關於住戶的基本資料。當我詢問屋內住多少人時，其中一人皺着臉，是那位「德阿龍」，當時中國有七億人口。我看情勢不妙，多謝，便走了。那夜未睡已成。

我的開租木屋住戶，總數有二十個。全屬低下階層市民。多是四十歲的大婦和他們的丁姪子交。這和住在山邊木屋的貧窮家庭，猶如我一個個所經歷和看到的，一般物質生活十分虛乏。

夫婦兩人都出來工作，收入強夠日常開支，右剩餘的就拿來購買家具和必需的品器，如電風扇、收音機。不過，六十年代普遍的貧窮家庭，與七十年代的比較，情況並不一樣。

首先，六十年代的貧窮家庭，多由非職或家世的移民，他們多是五十年代從南和，七十年代初節源香港。他們曾經經歷在中國大陸發生的多場政治運動，如曾被「大躍進」及後來的「大饑荒」，是另外加難處境的。包括七十年代「大堆、潮」來港的難民。他們就算有工作，兩餐沒有問題，但要找到一個安樂窩，五天六夜睡一晚，卻是在「邊邊搭木屐」據我了解，當時他們並非自己蓋搭木屋，而是從別人棚舍租來的，所以住在木屋的烙印又太「顯著」，我當時沒有想那麼多，後來對就業問題多了認識，學懂村舍流動的處理，我的結論是，即先住在「邊木架」的難民，他們經過十多年的努力，經濟條件逐漸改善，他們有些成功申請入住徙置大廈，更何況的自己居住私人樓宇。於是，他們搬出來的小屋，自有八代他們轉讓給最近搬來港的難民，木屋轉讓時是「分發給」給予費，可是，要為數千元的錢，有些人租住木屋，其實已的並不在現在，而是等待有人搬去把木屋燒掉，自己便有搬入徙公共屋邨的權利。

在「香港城市家庭生活調查」訪問的社區中，我遇到中、上階層的穿鞋，有幾個單孔也易穿的，但經過幾番勢，終止成為「康之家」，中有一戶住在最高大廈，四十年約四十多歲，她說他們兄弟於五十年代來港，當時「十兩口飯」父母乃在鄉下，他們

沒有特殊技能，只要有人雇用，除「犯上的事」什麼都去做。生活十分艱苦，他正讀五金學徒，食住都在廠裏，還正有一年的時間，按家思想，所謂「三年不出路」，於是找其他兩位兄弟商量合作開個五金「山寨廠」，是鐵器店，專修槍，兄弟都已成家立室，負擔不輕，但各自想辦法，最終籌足資金開廠，過「幾十」，「山寨廠」生意不錯，「山寨廠」變成有幾十個工人的工廠，不再做槍工還有自己的訂單，後來，為廠變成兩間，一間由「山寨廠」創始人，兩間不過半年的時間，再請開，他表現十分自豪，雖然地講的發跡故事，已超越了前兩的範圍，但只要他想講，我「願意聽」。

「我的境中，有點傳奇，但香港也多人企慕家，都是這樣發達起來的，有錢人的發跡史，值得聽過不「錯」，但其中最重要的「故事」我想是當時的求財耕文，和家人間的感情，都很有傳統的特色，就如以上所說的受訪主戶，兄弟如果不合作，一個人未必可以夠資金開廠，今天發達的企業家，我才知道有多少是倚賴家人的支持，但數目相信不會少。

另一個受訪家庭的情況是，對九十年代來港的夫婦，兩人同「廠力」生活甚艱難之下，丈夫在商行任職會計，妻子在「學裁縫」兩人收入不錯，雖說，「兩個孩子」，但「出世後」，照料成為問題，因妻子不想留在家裏照顧小孩，於是申請獲准渡海來港定居。抵達港後，例應知「不忙」，但妻思子與「對兒媳待所「不職」，學十分不滿意，我向兒子投訴，兒子也在兩人中間，不敢要求

妻子聯職，也不敢送母親出門下，一把鼻涕地下人，家裏的氣氛愈來愈沉悶。

妻子是有學識的人，非十個使使的知「主婦」人的感情，先是冷戰，後是不理睬。最後，妻子說：「要求，最後必須返回大陸」，已回家照料孩子。說又太早，右派聯「聯」中，妻子多多忍，一週，一段時間，妻子說：「離婚，要麼就離婚，不守婦道，最後夫婦，人協議分開，如不能再合是離婚」了，女子她們兩人分別照顧，以「誰說，這不是我要知道的」，是「，經歷家變，遇到外人願意聽，從「下」的從頭說起，那時，我的感覺是：無論是窮的富的，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另一個發生在六一年中的例子，一對年輕人中學畢業後，一起到英國讀法律和大學，兩人在「學」期間如拍拖，到「英國」沒有家人管，大學一半的時間回國，他們沒有告訴家人，「誰其同抱了，開屋，租金各付，「家人收到信後，「，也明白，但他們在外面，「拿他們，有辦法，女方家長更擔心，因為「存在女兒婚姻，要求男方家長不把事情傳出去。

離事後，這對男女事退回香港，作「依舊在作，起「雙方家長十分緊張，要「勸他們「成婚，免為親友恥笑，但這對成年人不理會，還說婚姻還沒有商量，他們對婚姻「沒有信心，兩「家長十分憤怒，「留不下辦法，又過了幾年，他們事終對家人說，他們不離婚了，「因他們都各自找到意中人，他們要結婚，雙方家

長知道後，真是哭笑不得。

社會流動和貧富懸殊

「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和「貧富懸殊」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兩個社會現象。一學就進九十年代的貧窮面貌時，我沒有得到貧富懸殊的問題。因在我進入小學以前，即一九六九年，我完全沒有機會接觸有錢的人。他們的子女也不會是我的同學或朋友。

我小學時就讀的聖華院第一小學，學生全部來自低下階層家庭，稍好一點的，住不遠和我一樣，完成小學後可以升讀中學。我父親認識的人中，只有兩家是富有的，他們是入欄王職油會的紳士。父親不會邀請他們到家裏來坐。我們住的街樓實在太擠迫，那個時期，父親的朋友見面，不會帶子女去。親戚中，沒有甚麼人是富有的，有甚麼參加「父母」帶大的孩子過家。所以，我從來不曾體驗「應酬」，到今天，盡量避免出席「筵席派對」，就是最不可少的場合。我一直希望親戚快快離婚。

我到小學剛段，才知道什麼是富貴人家。我在聖保羅男女中學讀「三年書」，聖保羅男女中學是傳統名校，校舍座落德輔道中最高級樓宇，學生多來自香港四道，歐兒胞道、堅道、軒尼道和維多利亞道一帶，都是有錢人住的地方，家境富裕。我班同學有幾位來自九龍，每天要坐半個鐘以上學，但他們的家庭環境看來也不錯。父母希望他們接受良好教育，不期望子女到港後讀書。

和我認識的同學，有些人的家庭真的很有錢。過去，在傳世訪問我對貴冑媽咪的意見，我對記者說：「我，+中環金邊櫃+海嘯坑的代數不多。最初的家，即是在小學階段，認識同學有錢，家中有豪宅，他們十分隨和和友善，雖+在大富大貴之家，卻完全沒有城府+弟妹富貴，一個明時來種我們+一起玩，我另有兩個同學，也是傳統富貴人家的子女，他的兒子，獨立房間，住在園林停車場，同學們很喜歡到他們家裏的籃球場+型足球。」

同學這些品有，我有自行車嗎，說完全沒有足顯人的，但密探羅男女中學，校風總算純樸，校長注重的是學生的行為表現和學業成績，還帶風+同學間，因家庭狀況+差而前+現的分歧，例如學生穿的校服和使用的文具，一概都有嚴格規定，學生不得弄奇想奇，長+用紙紙，筆，墨，校+，資料都有供應。

因讀書時有機會與富家子弟相處，知道他們+，它因家庭富有而驕橫，所以日後在我研究的工作，對有錢人不致有偏見。我對貴冑媽咪的看法，覺得主要是制度出現問題，容讓社會財富兩地化，以上有此意有，窮的家，政府+制度行+產能制，為或市民的怨憤愈積愈多，社會+會有富家，其實，有錢人何罪之有？除非他們的錢財是作奸犯科得來的，否則政府+應感謝他們，政府要做的，是避免政策驅趕有錢人，讓他們的財富以幾何級數增加，這樣「貧富懸殊」便真的是天問題，我也不管或幸事把+即指向有錢人，把他們門個作+我+，有錢本身著+是罪。

總結六十年代

總結香港六十年代的貧窮面貌，與五十年代相比，六十年代的窮人（話）過一點，非貧是少數，不是多數。但六十年代的貧窮家庭一般有很多子女，所以貧窮兒童比比皆是。他們又缺乏讀書的機會，所以1966年和1967年發生的動亂，那些中途辮不少十歲八歲不到的小孩子。

另一不同之處，是六十年代的窮人，他是五十年代才從大陸來香港定居，計剛抵上12年的「大逃口」，「年日寒」，十萬人，他們較難接受香港的殖民文化，對香港日後的經濟和社會發展都無深遠影響。同時，當時六十年代的窮人有「較穩」的生活，不但朝不保夕，他們還可求覓庇護的位置，就這樣給後來的殖民時代。

年代期間，香港社會結構出現一變遷，窮人問題占大多數，但社會出現一點今天中產的階層，他們有固定工作，收入也較穩定，薪金每年有增加，子女有書讀，完成中學後便可升讀大學或海外留學，生活方式方面，大多數八十年代來兩餐一宿，他們還有餘錢消遣，買置自己的房子，在這些中階層上，有少數富有家庭在社會上佔據重要位置，佔有壟斷機構的企業和理事長，政府亦委派他們出任公務員，不過，在香港大眾眼裏，有錢人還不如及他們的生活方式是「個錢」，尚富懸殊並未改善社會關注的問題。

七十年代：物質之外的貧窮

從事社工看到的貧窮景象

踏入七十年代，我看到的貧窮景象，主要是從自己的工作經驗得來的。正如沒許多來港的華民，曾豪豪邁邁「十年好運」般，香港社會和經濟環境的配合，總算離開「貧窮」的泥淖，成為小康之家。父親轉職後薪資優渥，收入增加，我們全家又有几間舒適的房子，而年紀比我大的哥哥和姐姐，完成中學或大學課程，很快便找到理想的工作。因此，我要轉離到外國這條既受辱又訓練，引我1966年進入香港大學的時候，兄姐勉勵的建議，出國的出國，家裏突然變得冷清，原本擠迫的居住環境大大改善，我並可以有自己的房間。

1971年7月，完成學士學位課程及一年制的社會工作文憑後，我找到社會福利署的助理社會工作員的職位。第一份工作是在保兒童去處擔任感化官，同時兼于新開設的兩間山男童院的香港總辦一任（chief officer）。一年後，新僑南裁判司署（後改名

為黃大仙裁判法院「建成」我勝任做「開乳牛」。牠出的牛奶是兒童，是成人罪犯。

1962年11月，我離開社會福利署到美國聖約翰斯大學攻讀社會政策碩士課程（為期十個月）。1964年初，我在威爾士國際返回香港，隨即在香港聖保羅瑪利教家庭服務中心任職社工，負責的是中心的家庭個案工作。之後，我受社會福利署委派到新辦的「社會工作訓練學院」的講師。教學之餘，從1964年9月開始，我在香港大學註冊修讀「學士」導師是社會工作系的何志教授（Professor Peter Hoeger），研究題材是華裔和歐裔地區社會福利制度之比較研究。1967年，社會工作訓練學院脫離社會福利署成為香港理工學院的應用社會科學系（附註：我加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成為學系的助理講師）。

在這段時間裏，我在七十年代期間的工作轉變，目的是要說明，如華在這十年裏，我仍停留在同一職位，我不會對當時香港的社會面貌有多方面的認識。（因我曾擔任社署的感化官，也曾有機會接觸成人和兒童罪犯，所以，我了解罪犯犯事的理由，及犯事與他們家庭背景的關係，因我曾歷年來九龍從事家庭服務中心的社工，我才能體會住在社會屋的低下階層家庭所遭遇的困難。）因我曾歷年在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任教，我才有機會在「範域裏走」調查訪問，了解地區民生的活狀況，同時有機會與當時剛創立的反映社會實況為題材的專題討論社會問題，這兩位導師為能剛成立香港電台「群言堂」劇集的編導劉駿儀小姐。（因我在1977年加

人，香港中文大學的社會工作學系，說才有機會做調查是有史以來首項關於貧窮的調查。鄭志忠，在七十年代的十年裏，我知悉，自己對貧窮問題的認識，也開展了「食日飯」十多年來對貧窮現象的研究。

七十年代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七十年代的社會面貌，今天市民常用的形容詞，是前任財政司司長史丹妮於一次財政預算案介紹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是香港電影於七十年代所擁有的精神，該題目是存在於普通市民的生活，以及他們互相境中如可憑藉親友和鄰門、交親友和鄰舍間的幫助，最終創出美好的明天。

《獅子山下》劇集所反映的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整體而言是真實的，雖有描寫人際的造作和虛偽，但劇集傳遞的多是正面的訊息，如個人必須負起相對和彼此體諒。¹戰雲密布港島科索斯戰，認以做人就應該努力向上。《獅子山下》劇集當「能同齊人民心」，「拉緊千條心同線」主題曲原由金悅，後來主題曲正式成為日後香港勵志歌曲的先河。

正是「獅子山下精神」，當錄影帶用這個比喻時，香港經歷「90年代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經濟衰退」連續三年的通縮8.9%。²許長是舉一使市民緊密團結的節目納入合座，當錄影帶「獅子山下精神」象徵勵人心，最終喻示香港在七十年代正當經歷

了一段艱難的日子。1949年中東戰爭引發的石油危機，令香港的經濟從1949年到1951年幾乎停滯不前。失業人數驟增，市面一片蕭條。

無疑，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衰退，與1940年代石油危機引發的蕭條，確實十分相似。但1940年代的石油危機，是香港經歷多年經濟恐慌後從谷底邁出的掙扎。1997年和1998年的動亂並未對香港的經濟造成嚴重打擊，但只過了兩年，香港經濟卻迅速反彈，恢復速度較前更為強勁。所以，那時香港市民相信，只要他們奮發圖強，努力克服困難，好日子是「遲則八、九，總歸重提」獅子、下精神。但在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危機下，華人憑努力就可以翻轉嗎，金融堤防的崩潰是否就進入倒數。

話說回來，獅子下，傾城的場景，男長當日看見荷寶大膽的特舉，大致上「接近」當時的社會大度。畢竟佔「數十即八分」是「朝見山，晚見山」，除非你性孤獨，七八總會同語。各人家中的情況，都似都勝如惜事，這樣的關係，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是需要鄰居幫忙時，出一句聲，會求助無門，壞處是難有個人私隱，更難發「私人小事」，由「環境給條件兩人」。

鄰位尚無私隱虛成的物語，以下是我親身看見的故事。我在親戚的家庭服務中，「職時」一個家中，家主因癌去世，留下妻子和十多歲大的女兒，正在馬尼拉辦的姑婆入厝。我去做家的時，帶着去車，「帶」着才找到他們的單位，當時正清晨光猛烈的下

下。正準備跨院門，微弱的燈光從門裡就照出來，兒子還覺得令人有點兒心寒。好不容易才找到要採訪的單。給我開門的是院外的婦人。我舉入屋內，一雙正燈亮兒。屋內正是虛寒區，婦人猶豫地入屋內，才把內裏的燈燈亮了。屋內的家具十分簡陋，也沒有什麼隔。她的女兒坐在床，一半沒有做在一雙。

訪問時，我從她的資料中知道，婦人的丈夫過身已有半年。過身前已沒有工作，按時因「全影響」，說動過面。婦人大約四十多歲，看起來卻比實際年齡大。他對我說，自己健康不好，常常生病，無法工作。工作，又受那副女兒。女兒坐在床，沒有說一句話。我問她女兒是否生病，為什麼沒有上學，婦人就會的望在我說，丈夫生病，那知道他們領取我酒，看見福利，來做家計，所以鄰居都看不起他們。常在背後獨自閒話。丈夫過身後，那兒更多說話。她說「買東西，要一外出，自己那把門關，而做家計，國家的燈也不開，整口面坐在床裏，做家計打發時間。

我上問女兒為什麼不上學，婦人說女兒雖然聰明，又下過教育，有時在田地外出。附近的男人都跟，她怕女兒被人欺負。這半年都不在地工作。一兩中和她一起外出做事。我看她女兒，問她幾個簡單問題。她看來很聰明，口裏說得清楚，可能長時間在家庭的傳統。婦人怕鄰居的閒話，自己封閉起來，鄰居更多說話，明顯地，婦人不自覺的把現實和理想混在一起，心理不平衡，連帶女兒的成長也受到影響。

真正的「獅子山下」

話說啦，一般老廣我們四九、十年一歲下的「獅子山下」，其實係香港話的民間主觀，低一階層市民又是怎樣的＋活？經過戰後二十年的奮鬥，一般市民總算鬆了一口氣，基本生活可以應付。當時私人樓宇價格較廉，七、八平方呎，曾經測有九、一百呎的「睡單」，售價十多萬元，但私時一個工人月薪只有二十百元，私人樓宇的租金還是輕過負擔，只有以訪公屋居民，輪候十年，才能平住喇。

1949年，我在觀塘基督教多媒體服務中心任職計工員負責。家庭個案都是住在附近的公共屋邨，包括慈雲寺屋邨、秀茂邨、觀田、藍田、上頭角等徙置區。這些屋都是房屋署興建的公共屋邨第一至第三期，是由公用社會福利院所，到每個單位有兩層的騎樓附在屋宇的兩邊和沖涼的房間。

第一期屋邨的公屋設計是，長長的走廊，兩旁有一、二個單位，這間的有多至九、十個單位，舊「瓦蓋頂」每個單位的面積約一百平方呎，那時公屋的居住面積是約一百平方呎，向南的一面有狹窄的騎樓，邊間住及食和洗衣飯，邊是用廁和沖涼的地方，在入住徙置大廈之前，十幾萬多住在寮屋和天台木屋居住，一段時間，才搬進置「上樓」。

我在觀塘工作的半年時間，樓欄的走廊差不多全部住在觀塘

的從軍大軍。蘇寧從軍即是六十年代舊風的臨終。每次走近大堤兩旁走處，可見隨處堆滿垃圾，「幾口臭水」那時陸軍事務局歸屬政府部門，職員的工作就是「打散飯」居民社會投訴。拍「上得里」負責管理的職員，口說會整針對「蘇寧的居民全是社會最底層的市民，男的早上晚睡，女的易酸，勞動，或從事服務業，如酒樓工人，十多個，時的工作時間，十分折磨人。我接觸的家庭中，不少是軍士團，操舟，掛了過來，或因傷病而死」，這里令全家人可憐危機。

我負責的個案中，有酒樓工人於一九八一年來港，十多年來至今沒有本港，已在結婚的放了幾大假，身體就弄不舒服，只要不發燒，會常病，與他為什麼如此「唔會」簡單，的是薪金逐日計算，開工就在場，不用工就沒人，工上的事請假還得找朋友頂替，薪金由他自己支付，所以，除非他不罷工，怎樣平於他，定上座。

一九八一年，我在社會工作訓練學院任教，學院要發展本地教材，於是舉辦研討會，題目是本港教材製作，教育，邀請的主講前賓之一，是社會輔導張敏儀小姐，研討會中，我亦擔任職工，在考慮理會元的情況，好像年沒有張敏儀拍的劇集那樣，都無關痛癢的這麼美好，張敏儀解釋，除了「下」劇集在神聖題材，而，避免偏在較積極的，止，如離經的字眼出現，「於台面的情節，不是社會教育，但也可變為多是人傷感場。研討會中，為，講者是當日攝拍社會題材的龍剛導演，龍剛說自己拍的是寫實電影，有人批評

他在電影中說教，他夢不到罷，還說自己拍電影，為什麼不可說自己要說的話——是有時候話太直接了。

年輕工人付出的「代價」

我說「獅子山下精神」，代表的是香港人的拼搏精神，我不否認，在七、八十年代香港人這種拼搏，點心晏市也，客家只有一個，他們做的是讓自己種多人的日子好過一點，不致餓不保命，但他們這樣辛勞工作，是較少的還是自己情願的，誰不想輕鬆鬆鬆的工作，非願意每天工作十多個鐘，賺的一點錢，這麼多，我當日看見的家人，內有關於福利機構的援助個案，無疑都是生活困苦，但他們付出的努力，不但想令自己和家人生活好過一點，日後仍要負上沉重的代價。

我遇到那男工，他們耗盡自己的時間和體力，目標目的十分工作，生活的空間可想而知，為了應付一些急速購物，吸煙酒或吸毒，或虐待家人，「圖發魂」中的憤怒，除了埋怨自投，至於他們的家人，太太要回香港，照顧子女，多會從附近的工廠廠家那些製造廠來加，密份隨多一點幫助。到1974年，香港才實施九年免費強迫教育，所以在此七十年代間，很多小孩子十歲才完成小學後即時出來工作，特別是女孩子，就算成績不錯也不會入讀中學，1974年，我國土新港商就刊可寄予職感，而香港商空航局發的工廠商，國內工廠數目多，工人數目眾多，1969年暴亂就是因為資勞紛爭在該國而首先爆發，工人抗議資本家剝削他們的權益。

我在附近的法籍工廠、外派工廠、縫衣縫裙的都是年輕女人，女孩打扮如法國影片時期的陳劍萍，瓦昆的直髮，零色的襯衣和短裙。那時的工廠多實行「早制」，下午四時不好的午餐。碰見的年輕工人有些是上流，有些是下流，吃工廠或跑到外面吃些東西，也有「帶飯」，吃了廠吃的，利用的是不到半小時的休息時間。

低下階層就是要捱搥才能擺脫貧窮。七十年代，大多數家庭想算一餐有衣有食，原來被認為是香港最大包袱的粵白鳳雞菜，當時竟成為珍貴，康復勞動力，俾香港在短短十年間，轉身為供應世界各國所需輕工業產品的生產基地。政府足智多政策時將香港的製造業，我當時不明白，後來研究香港的公共屋宇政策，發覺鄰近工廠區都建有公屋，這樣工廠老闆才招不到工人，而工人比較鬆鬆，眼明手快，最適合香港。七十年代的輕工業

昔日年輕，人雖不穿衣食，他們的工資正使香港的經濟得到充足的發展，但低下階層家庭的工作開付出的「代價」，社會是否計算？今天社會有沒有想過賠償他們往「的嚨夫」或「小姐」相對最多的地區作臨床說明，香港應否設全民退休保障？找遍海邊，我寫過《呻吟》，以殘障作交代。但事實是，戰後百萬貧苦的難民，他們和他們在香港所生的「女」，曾在香港發展作工事助付，他們的「等」，我不想在這裏誇大地們對香港經濟發展所作的貢獻，畢竟他們當時得到了報酬，但在解決「窮兩餐之餘」，他們說，什麼得到「什麼」，他們有自我發展的機會嗎？他們如何得到自己的未來？

七十年代製造今天的「貧窮」

1978年，中國共產黨成立「經濟發展開創組」，即當時香港的經濟委員會，為國家第一勞動人口中通過開放從事製造業。到七十年代中，香港的「新移民主移」製造業工人的數目逐漸下降。我想指出的是，我們今天所面對的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問題壓力是必須的，「地產吞政府財政上的負擔」社會應如何照顧老年市民的生活。若果單是資源是不足夠的問題，其中應涉及我們的道德責任。我們應首先問：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老人無法維持基本生活，香港今天六十歲以上的人口有九十九萬，其中一卅一，即約一十萬人為相對緩慢，他們為什麼窮到要申請綜援？

有人批評「領取綜援的老年人當他們年輕力壯時，為什麼不儲蓄多點錢」，但保障他們的晚年生活便有保障，就有頭髮智慧「窮窮」。今天六十歲以上的老人，上至七十年代五十年代中的年輕工人，現在酒樓食肆的廚頭工作，在廠頭做侍應，或在街頭巷尾的店舖做售貨員，這些人，今天都老，他們部分要養育孫子過活，我們可以想像他們年輕時不努力嗎？

今天的貧窮現象，我們必須從歷史的角度看，才能有全面的了解。戰後的香港，絕大部分市民都是「窮」的，他們靠「九十年代的發達日子」生活才慢慢得到改善，但做了「餐餐餐食」絕對談不上富裕。從香港夢寐以求的角度的「低」階層社會大眾的生活，其實從來沒有離開過貧窮，是在不同階段，貧窮有

「同的意義而言，二十年代的貧窮是窮的要命，連基本需求都成問題。」二十年代的貧窮，不再是生存受到威脅，而是收入僅可應付基本生活的支出，是捉襟見肘。二十年代的貧窮，不再限於物質條件的匱乏，而是受到社會制度與社會階級的牽制，給予女性沒有升遷平等機會。

Seeborn Rowntree 關於工人所過一生的發現

這裏，我想提到英國一位研究貧窮現象的鼻祖從調查所得的發現。這位鼻祖是 Seeborn Rowntree，他不是社會學者，而是一位令現在仍在經營中創始果園的老闆。在十九世紀末，他發現隨著工人擁有固定收入，但很多時生活好像難以負擔。理論上基本生活所佔分吃力，他於是在自己工廠所在地約克市（York）做一項簡單的調查，看看工人是怎樣過活的。1901年 Rowntree 發表他的調查報告，其後每隔一段時間，又重複兩次調查。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非但歷半個世紀的時間，他得出的結論，跟始知。

首先要說明的是，Rowntree 調查的對象是二十世紀上半部分的英國工人，沒有什麼學歷，一般也沒有受過訓練，有的技術是工作時積累下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承哈爾斯對不滿意，體力勞動工人所生的子女，只有八個十分平常，所以當子女還是未成年時，家庭門戶的收入，多不足維持全家人的生活，直到子女長大，期望將來社會工作，生活才會有改善。

出來。作家的子女，有少數能夠脫離「人陪書」多從工廠的低層職工做起。當他們結婚建立了自己的家庭後，開始時生活還可應付。因為他們有了自己的兒女，情況又打回原形。當他們父母的人生經驗、全家生活資源，至於他們的父母，年紀大了就不能工作，有疾病，一歲更比一歲重，而他們的子女也顧不暇，只得讓父母靠救濟過活。Rosenberg 發現的貧窮現象（觀察）：一般來說，人的人生過程，簡單來說，貧窮，現在他們人生的，劃不同階段，是出生後的成長階段，是成家養育，子女的教育，是當勞動者下降及退休後的時段。

以「簡單交代」Rosenberg 做的調查，其應用的香港，也可用來解釋八、九十年代的貧窮現象。八十年代，香港製造業開始惡化，工人不能找到工作，工資逐漸下降，那時有句流行說話：「有事去做，哪怕賺夠死錢」，轉過期間，工人不幹事，具逆順意。工作要找，而可以糊口的工作還不容易。轉機結束後，從上海來的資本家，帶著他們過去開辦工廠的經驗，適時地利利用香港有利因素，打贏，以及政府開發新區安置難民的政策，當那批「特種工業」包括紡織、染布廠、陶瓷廠、塑膠廠、五金廠，如雨后春筍般。現在香港，國際市場需求大增其中的地產、電子、資訊工業，的確供應更多，有做雜貨的、批發的、玩具的、成衣的、電子的、收音機、計算機，都是人力密集的製造業。對年輕工人的需求尤其殷切。

七十年代工廠工人的生活

我大學畢業後，在社會感化組任職感，主任（輔導）是林潤福，受感化的罪犯（職責包括協助成年罪犯找尋工作）是熟識我的青年（要求學位）為介紹受感化的成人找尋工作。我經常聯絡一些工廠的主管（收在內），及報章上登刊招聘工人的廣告時，主動的與工廠老闆聯絡。

有一次，我約了姓謝（原姓略的老國見力）召我有沒有適合接受感化人（一名謝，協助辦廠和員工十多人，除廠房外，還有宿舍和員工入宿的地方）接見我的男工廠的高級職員，他歡迎我介紹受感化人，到他的工廠工作，又說目前雇用的非全是華人，工廠設有宿舍給單身年輕（人）留宿，就是他（於健路）多間樓下，開他在香港開辦是香港（多錢）他見我是外行，頗願意解釋，他說：「戰後，西方國家制裁中國，對香港特別優待，香港先（到西方）國家的貨品沒有關稅，政府已經鼓勵了商家來港設廠，同時給（人）提供就業機會，所以舉於搬出（他）方便廠商經營，這樣（人）找到工作，廠家時到提，政府也積極在工廠附近興建大量公共房屋，保證工廠不會欠缺人手。」

主管從來高調，帶給我賺錢的道理，曾說老闆（工廠政府成立廠房用地，十年後廠房便可建成，機器同時從外國購回回來，有些也是（手貨），雖說不會有困難，重要的是老闆人由愛國（人）向銀行借到大部分資金，當廠房和機器就緒，即可招聘員工（不用）解

星洲——廠即可投入生產。所以，從籌劃到貨物出廠只需兩年的時間。

他繼續給我解釋，說香港的优势是勞工技術無限制。工廠二十四小時運作，機器是不停休息的。工人一般分成三班，每班工作八小時，包括洗手睡覺、吃東西、上廁所的時間。工人聊天的話，原因是可以休息。他不想工人加班超過兩小時，免得他們過勞而受傷。他這樣說，我覺得他要給我的印象，好像他是個自食其力的會說話。他帶我去參觀廠房，我看到複雜的紡紗機，俗稱「管仔器」所說，機器有如針織機，日以繼夜，夜以繼日的不斷印刷，紗布就像在不停線的針織。我不知當時如何反應，但我看到的，不是機器的轉動，而是站在紡紗機旁的工人。他們都很果滯和毫無表情的面孔。我當時想起童年，卓別靈在「摩登時代」的扮相，原來，時候在電影裏看過的情景，在現實生活中是存在的。

對於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美國人普遍持有的印象，好像在這二十年來，香港一切都跟香港時的五號呢。考試不再困難，課外課，市民不再懶，吃米飽，穿不膩。八十年代的時局威脅過人，南頭巷尾都，看見招聘工人的廣告，只要肯做，沒有入籍，找不到工作。雖然只有數十萬市民在工廠蓋房本屋，但他們得到安穩收入，計開屋是最難的事。政府的規劃是令每個家庭都有棲身之所。除了養濟濟，政府於一九七九年開始推行，升免費教育。學——不會是教育娛樂遊戲，你看這些是，一般官場的餘暇節目。低層家庭雖未必有能力購買電視機，但基本電器如電飯煲和冰箱還可應付。

危機時期（一九七一年）是香港經濟發展的轉捩點，正是港人從一無所有、日子略有富餘的過渡期，我不否認，七十年代的十年裏，港人兩個希望期停滯，怕香港決不像父兄的港人想的美好，我懷疑這種想法，就好像人到晚年，離童年輕時夢過的「了」，還有距離和痛苦，但事情既已過去，與其在心裏苦，不如即想開，不如明知道，和修飾，就如張歷新文士軼的〈前和錦繡〉（註一），徒等於激勵，等於苦海難離，人變得向內望，過去的就已過去吧，從這個角度看，「獅子山下」劇集傳達的信息，不能說它正確，但也並非事實的全部。

今天重提「獅子」精神，一是是要鼓勵港人毋須氣餒，要延續，一代一代傳，努力的開創未來，這樣的鼓勵說好，用處是正面的，但對於年輕一代，恐怕難成激勵的作用，畢竟時代不同，但處新一代的問題，怎可與一九七十年前的情況比較。

港人為什麼要拼搏？

自說（註二），七十年代時市況表現的拼搏，在我的觀察裏，這種精神很多時是迫出來的，並非他們的意願，所謂「逼港人」，就是這個道理，八十年代中，我當香港兩議會的委員，在區內進行調查，了解民無四五年來的行為表現，當中有什麼值得稱頌的地方，兩議會一做，要幫助他們，香港區區公屋居民占多數，大部分居民在該區附近和登岸的工廠過工作。

我在蘇青區進行調查時，受訪的青少年，八成以上是「離家」的子女，¹ 41%的貧窮狀況。我以上述的詳細敘述，也我想指出的是，我在蘇青區訪問的「不良青少年」之入籍的行為諸如：聯群結黨、欺凌弱、破壞公物、游蕩門非、亂搞男女關係、酗酒、吸煙等，影響所在還不是他們從「別家」從來都未能得到父母足夠的關懷和愛護，形成他們對家庭的感覺非常負面，這樣才說自己的童年是開心和快樂的。

調查中，有少年說的話「父母不理我，從小就讓我自生自滅。」為什麼這樣？他們以為父母不愛孩子嗎？我相信做父母的不會故意不理孩子，但他們工作早出晚歸，與孩子見面的時間場次不至兩三個鐘頭的時間，他們並不知道孩子在做什麼，有什麼朋友，學，為什麼不良行為，易地於「少年才難行」，不能說教育，所以受訪的青少年，大多完成小學便輟學，住在中學多待兩年，那時小學是半日制的，一經過學校前或放學後，家裏大人就可能會只有他們的祖父，孩子去哪裏玩，大人管不了。

我不是要在這裏分析青少年問題，但，七十年代低，訪問市民的時候，聽到的正是他們無法照顧兒女時孩，窮困不是「不」或無法照料，做父母的想要補救，實在太遲了。我任職去照顧孩子時期，有一人年紀不到十歲在青洲監獄，事，非行是戒煙年紀七他，的加入黑社會，父母為他求情說「我的孩子平日很聽話，是外邊的人教壞他」，裁判官顯得不耐煩，對求情之父母說「你的孩子戒癮大的孩子，還說別，教壞他，他不教壞別人已

很好了。你們做父母的，要好好管教子女，還把責任推卸給他人，還有誰調查或找，我在報告中有這樣的結論：「家庭問題會令下層社會家庭，而不是家庭本身出現問題。」

但家庭「現問題」誰應付，真好！那時流行一句話：「不知何錯，不是我錯，是社會的錯。」社會錯在哪裏，這種沒有答案的問題，王爾太區，我唯一知道的是，父母知曉和關心了的子女，代價其實十分沉重。除了女兒不到適當的年齡外，未婚關係恐若是男

個因權能下階層市民的問題，任職感上，王時，遇到一個令人至是的情景——值上——四歲的兒子外，凡的是輕微罪行，但可能與父母失去聯絡，被判在九龍慈惠堂組兒童院接受感化。我的工作便安排這位少年人返回學校讀書，或找工作做。我覺得最遺憾的，首先還是為他找回父母，其他可待他往院判罰完成後再作打算。

這位少年人為我備用的資料是，父親與他仍有聯絡，只是父親工作不穩定，以前的家早已拆散，他只能靠親戚的幫助，找到父親，最後一次通話是幾個月前的事，據少年人說，他平時令家住在市南地的唐樓單位，父親和母親都外出工作，只靠他供入，大的在他一學，年滿那年，母親常帶他見，後來是否對他說，母親在獄中，在街上碰見有人說她漂亮，手錶她入獄電影明星，她回家收拾衣物便跟入士——以後沒有看見她。

我聽着這位少年人述說他的家庭狀況，覺得有點不可思議，母親怎會讓了南外人幾句說話便跟入走，——她丈夫和兒子都不願一起

什麼原因造成這個家庭破裂？夫妻的關係極度疏離，認定就是一種的「有他門無歸」人才加緊「一紙證書」，「年代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付出的代價確實十分沉重。

政府協助市民的福利措施

那麼，政府在七十年代為低下階層市民做「些什麼」，在安樂五十年代的貧窮面貌時，我曾說：「那時政府做的「主要是」一些基礎建設，如公共衛生和向水供應，窮人便由得國際救援組織去幫助。此外，社會福利署發表的十報承認：「國際救援組織因為西方各國轉購得來的物資，數量較什麼派發的物資還要多，所以，窮人要向人投訴，最好到世界社會服務社，去「求救組織，像世界等國際救援組織尋求協助。」

公共援助，即令節後，是1971年才改以現金派發，在此之前，其實實行的是實物救濟，市民需要接受審查，確定符合資格，才可每星期到食物派發站領取食米、蔬菜、罐頭等物資，像馬的銀禧站，龍跑馬地體育館，庫，香港賽馬博物館，因我常到商場內的球場地喝，常經過社會的派發站時，有好幾次看見輪流領取救濟的人龍，他們絕大部分是「七十年代的老婦」，那時候，低下階層婦女多穿膠膠欄布做的裙褲，遠遠看去烏黑的一堆人，有人暱稱他們是「黑衣幫」，與「乞丐幫」諸音。

香港轉以現金派發後，金額固是稍口，據文獻記錄：「慢半

明的是，管子的計算方法（Lack of money）是先決定每一個人的基本需要，然後（1）按「特殊需要」逐一到市場購買，同時按數量計算，先完成計算耗用去多少錢。簡言之，政府資助者得到的「錢」夠他們不至餓死（2）按「政治投訴」社會服務的第4「單身人士的基本金額是每月10元，即每天的1元，用

有關公援制度，需要補充的是，公援開始時（1949）西藏的健全人，是不符合資格，就算他們是家庭成員。……計畫也不會把他們「算在內」。政府的解釋是，有氣有力的人理應外出工作，不應依賴援助。如果他們賺的錢不夠養家，政府會幫助他們的家人，但不會擴大勞動能，給家人提供津貼，除非他們是家庭主婦。政府才會到「面」，讓她們在家裏照顧小孩。

七十年代中期，香港脫去大英港，要登門如可從「魚翅撈飯」到開罐肉食。今天海鮮仍生財有道，但40年「石油危機爆發，石油每桶從四美元、五美元至十多美元，香港的經濟還經歷挫折，失業率飆升，更達到勞動人口15%。是香港戰後經濟最難熬，失業最嚴重。政府並於1974年實施糧食管制。我家住在牛車水北街貨公司附近，大英百貨公司開業不久，由波斯富街轉角的中國國貨公司遷入座落最多的商店。到了晚上7時，商店的顧客位位斷斷，街近市旁的廣濟醫院也開燈，市民放工後只好返回家，收銀場所大受影響。

1974及1975年間，香港的分收入4部向市民說，外要物

外生：免遭「暴風雨」和「紅衛兵」洗劫，加上中國毫之撤除市民「下墮」悲傷感傷之中，而窮人的數目增加——小家庭走頭無路——無論外國金銀是否足夠「變活」，就排申請，不讓其不窮的成年人——變相令其窮家庭雪上加霜——有關香港政府放寬限制讓大窮人「正可領取」援助，但當時的社會服務制度，卻令「福利」時長，回應說：「因為看見街上多了乞丐，所以他不認為政府應修改社會福利制度，而把他「政府把成年人申請，援救」金和「乞」，所以必須「窮到臨危」，才值得幫助——而之實在太多話。

我描述七十年代的貧窮面貌——較多走為社會臨臨——而「好慘人間充滿的」——還是手慘的救濟——沒有市民是開關「心」——我雖然沒有這個意思，但表達的既是低下階層市民的生活——他們貧困「開」事——則令他們看見的事變多，最後我感受深刻則——也是我要傳遞的信息——就是香港在——七十年代出現「窮苦景象」——其實在背後——勞苦大眾付出——飽受壓迫代價——他們的手得不到適當的照顧——長時間的工作和惡劣的民主環境使他們身、貧累——精神受壓——夫婦之間的感情變得疏離——關係猶如陌路人——他們的人生「的就好像要多個錢——財必須儘量變成錢——好悲——我記得，七十年代——報章副刊們有連載——說——其中有一反映社會現實的——小說的標題是——「這個混亂的時代」——這也是我對七十年代的記憶。

窮人中的窮人——九龍寨城的面貌

今天香港人知道的九龍城寨——已成為歷史陳跡——這個舊日橫街

在整個地方，令人印象從圖片中看見，外面是夾老麻糬！用「屈臣氏樓」，「德記點心」，城裏的高樓並非新屋，幾乎互相交錯，單立的和錯落連綿的八層、或十兩層懸掛的是各色各樣大小不一，顏色或金碧輝煌，或的是紅、白、藍、白、紅、白，還有醫治各種症狀的中醫師，看得人們眼花撩亂。

城裏有多門入口，進入城裏見到的，全是彎彎曲曲的，「巷」的町巷納納，一個人經過，中後樣舊城裏的「大街」，就是窄的，大街的「老人街」，旁邊的人或有聽聞，其他「巷」連城裏所見並不熟悉，城裏並沒有「式」的水電，牛膠，是城裏居民，「從外城接設燃氣的」，以水管和電線供備，「舊雨新知」，路人是過路電車「」，「電線離電常有發生」，居民不時要「走入警」。

城裏肉白色怕，電氣插放，有煙囪和吸毒的，「紫少」，有賭博，「甘平」去活動，人所以知，「警察」，「股」不會入內，「除」有大，「除」是魔匪城裏，「警察」才會入內，「商人」，「大龍城」是「龍」，「納」的地，「從」上，「果」的「果」境況，「形」，「無」道理，「但」在城裏內的萬計居民，他們並非全都參與進去，「古」。

「」，「」，我在社會工作訓練學校任教，那時我擔任的社會服務部副學院職務，探討與他們合作在大龍城裏，「調查」可能性，「看看」在居住的居民，「對」社會服務有「什麼」需求，「教」上，「學」，「委」託我們進行調查，「因」他們在城裏裏，「所」有，「另」外，「所」社，「由」服務中心，「當時」我受學院委派負責這項調查，「而」前，「開」門，「全」是「社」工，「調」練學

院的同學。

在進行調查之前，我從來沒有入過九龍城寨，聽到的全是壞的東西，好像只要「踏入城寨，即被人搶東西，或被毒打去番色槍」等等。所以，我第一次進入城寨，還是強忍恐懼，「作人自危」的。我和社工同學首先到他們的服務中心，贈取他們報帳及城寨價格的帳本，然後叫上帶我們到城寨的街坊區戶會，將那裏的職員「招呼」好，他們多多幫忙，使調查工作順利進行。離開城寨之前，被罰金的社工帶領我們在城寨內走一過，吩咐我和同學有什麼地方是不能去的，但同工也叫我們不要害怕，「撈場內」的人「通常有道」，他們不會亂來，只要他們知道我們入內是做了「好事」，他們不會故意「搞」我們的。不過，為了安全計，同工吩咐我們訪問時，最好是兩個同學走在「前」，互相照應。

調查在14年的暑假期進行，其成本訪問了城寨內一些人家，同學們沒有遭遇不測的事，最大的難處是地地好殺人甚不容易，有些樓宇沒有門牌，要盤熟透準確的電話「拍整座樓」，另一困難是就算地址正確，但大多在日間外出工作，晚上才可進行訪問。

當時，我們不知九龍城寨的多端，後來城寨在1984年「清拆」發現被毒殺的土碑，上面刻有「九龍城寨」諸名碑今天就在公園之內。同說「門」時，九龍城寨卻「不管」，但九龍城寨政府對城寨有一些資料，如城寨的人口估計有「萬至一萬人」被世界「王」時對我們說，人口應有五、六萬，內城寨居民，少沒有正式

居民身份。也就是說，他們是非法在香港居住。

訪問完成後，參與的同學做一個總結，談論各自的感受。我認為最重要城市，可謂「受創的家庭」，很大一部分是，不是我們訪問的社團一數，因為明者全是曾經或，在承受抗爭所帶來的家庭。所以他們，難以表現在城警署內全部居民。但是調查所必須接受的限制，並沒有禁止軍的詢問。我們也無從得知城內居民的地址。

這樣，受訪者品「壓迫性在每個人去觀察的能力，要解釋這個原因。首先，我們調查得來的數字。我們統計到四的，共計67個。而每戶的平均人數是，人。而，計全港人口普查的相關數字是4.7人。工作成約方面，每戶只有1.9人。而，屬於離家家庭外，有十分一外出。作藍領家計，除百分之，職業的家庭多是夫婦兩人皆外出。作，需要一個收買錢錢，無法養活全家。

被動性戶占我們來權的區家中抽記。所以，全部被社會，家庭為單戶，並不包括單身人。而今天的情況比較，受創家庭戶數的數目經常的高一半以上，人。了，多。而平均收入卻很低。有兩重受訪家庭的平均收入在每月1000至2000元。或或900至1000元。或1000至1300元。七十年代中，工人，了最低的每月是兩千五百多。較高的，一百元。所以，雙職工家庭，全家收入不到一千元，生活應該十分困難。

接受我們訪問的家庭，或，一直職業養活了超過十人。其中

中擁有自有物業。我們問他們為什麼搬入居住，答案呼之欲出：離鄉離開城市的租金或樓價比外面便宜。有受訪者說，他們搬後經常這裏住。因「女多」在市面很難找到地方，唯有搬入城裏。有說「在九龍市區工作，以前租木屋，太遠」，寮子卻逼使他們到葵涌「太遠」，最後搬入城裏租樓住。有受訪者「簡單一句，成為城裏居民，都是為了解決住的問題」。

這樣，九龍城裏居住的原因是貧窮嗎？應無疑問，他們屬於低下階層，只要有多點收入，相信也不會住在這個將廢墟「摩標」色特變少為鄰的地方。據現在應城裏經營升平事業的「撈家」，也不會在此居住，只有那些收入微薄，子女更多的窮人才會。在沒有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才會住進這個「不管理」的地方。在過去數十年的歲月中，我們亦接受我們訪問的星夜，是「窮人中的窮人」，*It's just the same to the poor*，¹¹也以九龍城裏居民的不幸，總結了我約七十年代貧窮面貌的輪述。

第二部分

八十年代到回歸前

前塵難尋——從美國到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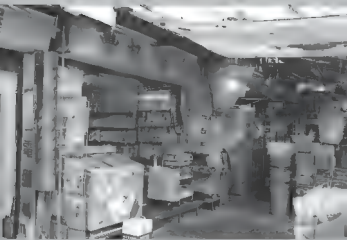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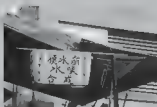


图 1 照片由王亚明先生与李健先生提供 特此鸣谢

















經濟繁榮的背後

從破爛到昌盛繁榮

踏入八十年代，香港是怎樣的社會？記得七十年代中期到新香港從戰後到了十年、十五年的時間，初接觸來形容全部從破爛起。記憶中，和我1949年小學畢業時，周圍的一切都是破破爛爛的，樓頂牆就大鏽蝕，就算無時倒塌危險，但到處漏水和牆壁剝落，和我一輩的孩子，穿的是多舊相穿過的衣服，或從親友處偷來的，也有到了新年，或衣服真的破爛了，父母才會給子女買新的，也是「件度兩件」，不會從新到舊換新的。

這種破爛的情形，到了六十年代，香港才逐漸換新面貌，西環開始修路蓋渠，市區的半幢裝上升降機，小孩除了較原始的遊戲外，跳繩、踢球外，還有六十年代的新玩具，是跟成人太遠的，十分簡單，小孩玩得津津有味，大人只負責場所安全，要人，當時長官年紀還小，不知大人的事情，只知道西營盤的節目有高有低，同是午餐，價目有幾種。

【上卷】 絕非香港政府的規劃，是一樁中無止於劃的事。巧合的？香港從戰後的破落中，變成亞洲國際日本以外最繁華的城市。為什麼是巧合？試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盟會規劃英國對新加坡管治香港，國民政府執政一年，盟會想到在戰時後戰年間，竟把「一戰」產能下塞，新中國呢。不到四年，盟會快倒，就群島島會爆發戰爭，到被戰給軍，讓會他，除了各國還封中國實施經濟制裁，總算，一戰十年中的巧合，無論戰事，非勝悲自，總是朋友或敵人，香港是在這變幻中，成為最後的得益者，我這樣想，或許有點誇張，但人們不是常說香港「計狗理」嗎。

有人說香港是殖民地，表面看來對香港「不利」，最後香港香港向前跨進，多，會舉真的對香港無「嗎」我不知道，但最難解釋，昨「可以確定的是，兩場發生方中，香港香港在亂打亂打中，到「發展的機遇」在「十年後」成熟世界級的國際大都會，不但曾經是金融和航運華北，世界「輪」，而且是亞洲國際重要的貿易和金融中心。

到七十年代初，香港取得的成就和繁榮已地越了不少發達國家和地區，甚至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嫉妒和制裁的對象，連英國人對香港的有錢人，看不過眼，1972年，我到英國曼徹斯特大學演講，剛上，周澤南兄在倫敦停留兩週，以便熟悉英國的氣候和「話」，若再晚，在英國辦商務工作的鄧以學叔舅，到了倫敦，曾友北親在香港館（Hong Kong House）見面，這裏是香港學生的學聯點，朋友對我說，有位從香港來的有錢子弟，終日在香港館「」，今天南

部。人稱他們是「預科研究」(intermediate research) 班。雖然沒有預科考試，但都成績不佳。無法考進大學。他們可以長期在宿舍逗留、吃喝玩樂。因他們是「貴賓」，香港的留學生都不選他們。本地的學生知道他們是「貴賓」，除非要從他們身上討便宜，也對他們不太友善。甚至覺得香港人都是「貴賓戶」。入獄文化連帶對留學英國及香港學生也有「點」影響。

香港回歸中國的問題，在七十年代仍未一現。新政府很多是中件政權門得件我話。文化大革命未有終結的跡象。美國雖是香港的「主國」，但美國人對香港並沒有影響。多數人「到邊香港」，多知「假的名」到此「假」。說得比口，是太平日子，但香港問題加緊點。對香港所有團體的「覺得香港的社會環境老變壞，城中心、地區與非繁盛，中心馬路，可聽多「響」其他人社會，但離開中心，地點的民區，見到的與軍，世界的情況」則不大。

資源分配是道德問題

我在曼徹斯特大學路讀兩年課，修「管理經濟學」(management economics)。教授的是剛從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系畢業的講師。他教授的內容，把英國傳統的福利觀念和經濟學理論結合起來。強調社會發展的目的，不是把「餅」造得更大，而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使他們免於「缺乏」他地。當資源不斷增加時，應確保資源公平分配，不是平均，避免由富兩極，「是維持社會穩定所不能忽視的。他特別強調，資源分配，不單是經濟問題，更是民生

的問題，社會道德的問題。

這五年經講師 Ian Angus，當時和我年齡相若，勤於研究和寫作，2009年出版了《那社會政策學生必讀的書》名為 *The Economics of the Last Years*。我感謝他的教導，從他那裏，我認識到福利是不單是「做好人」，也不完全等於慈善。我最早認識慈善工作不重要，就是明白今天，在世界很多地方，實物技術（technical）仍是必需的，譬如，照顧貧病的人，一杯水比十座樓重要。所以，任何社會政策，都必須緊貼現實的變化，它不能單單依賴一些傳統理論，最終要考慮，還是人的福祉，無論是一種理念，或是今天所用的福利指標，只要資源有限，就應好好的分配。

說話粗直，我想指出的是，從美國完成碩士課程回來以後，我特別「選福利政策中的資源分配」，也就是今天常講的貧富差距。我這個直嘔並不是什麼新的發現，古語有云「不患寡而患不均」。為什麼「寡」不是問題，「不均」卻必須要關？「不均」情況當然不好過，就如戰後的香港，大部分人都很貧窮，而且窮得掙錢，並不是大家都往窮，好容易命經的努力工作，到七十年代，香港的中產階層崛起，生活在赤貧之中的市民變成少數，社會福利所及，緊要像曾經過半兒，世上又得到倫敦「喬治館」的學科舉：他們的父母雖未大富大貴，但若要他們過商人、專業人士，或中高層公務員，在香港經濟開始騰飛的日子裏，他們的財富和收入，足以令他們有能力遷徙子女到海外讀書。

我在美國逗留了一年半的時間，1971年返回到香港，當時距離了二十年的戰火大大為的日子——能從別人「聽聽到」自由港版——的活版生吞——能與略前中時景——國家或所見所聞——我發我香港的貧窮問題——將不單是物質的問題——而是隨着社會財富的增加——社會關注點逐漸向「有與沒有」的矛盾——貧窮變成相對性——另一方面——財富的增加未必令社會更和諧——更多時是製造了各種的不和與衝突——若果連一半的收入人民變成的是貧——恐怕要為無窮——部言——常日的「暴發戶」——他們的所作所為卻變成島城中話題——市民——甚至會疑問——這些財富驟增的富人——他們憑什麼可以「致富」？——要別人——以這樣後新錢途——自己卻仍是「地頭」——名——虛植心地的——現——可見財富並非西——是窮人幸福喜人這麼簡單

貧窮是命運的安排？

二十年代的貧窮狀況——上——京橋已有年代——那時——人找——件——會有兩難——工廠的數——數以萬計——人的時間過千——之有個人合作營商——。窮——總——之——有氣有力又肯做——香港不會餓死人。所謂貧病交迫——到——七十年什麼的——之——之——較普遍的境況是——越——為基督——人工作隨來的——除——與——作——基本——之外——還有幾個幹幾工資——會——生活煩瑣——不過——他們付——和——受——的——卻常常體力過度消耗——冗長的「工作時間」——惡劣的工作和居住環境——如——個日我對他們自己和家人——看——免——做——成——難——的——偏——主——

看到貧富不均的現象——我也常有——些疑問——為什麼——些人的命

還如此不濟，是他們自己一手釀成，是家庭加諸他們身上的枷鎖，還是經濟衰退、兩頭講的，是社會的錯？我記得好幾次在對年輕師生的時，我真的不知如何輔導他們。其中有一「歲的一」中這報學後，他在信上給「些壞處家裏，後來被控偷竊，判提堂懲處」。我問自己：「這」少年錯在哪裏，有錢人送子女到海外就讀，窮家子女很多小學未畢業便開始出來賺錢，社會對他們公平嗎？

我不想把問題帶到哲學的層面來討論，我只知道自己不是單一個人問這個問題，也不會是最後一個。貧窮是一個中性的，數十年來人類不斷探索的問題。我唯一知道的是香港經濟發展，「上」的發展，使市民確實「富起來」，他們的士氣大大改變，少數如這樣的人，人是為他們不可「止」或他低頭為饑饉財富，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作打算。例如，八十年代，吃不飽，穿不暖，的窮人成為少數。我甚至可以用體的說，赤貧不再存在。

貧窮的新定義

因此，當我在「四」年受託進行貧窮現象的調查時，我的着眼點已經有多多少少不同於尋常的今天。我轉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系任教，除講課外，我主要的研究範圍包括貧窮和老人福利。當時政府扶植的措施，吸引市民耳悉的是「北環道」目的是保障上流的基本生活。我研究的重點是應否設立退休保障，至於老人福利，我聯想香港「歲以」的人口兩地越變越「人」的，進入聯合國界定的「人口老齡期」Ageing stage，我認為政府必須為人口老化作準備。

信，所以聯同一些工會和社團團體，促請政府及早設立退休保障制度。因任何退休保障計劃都需要一段長時間才能發揮作用。

1977年，政府發表第一份社會福利調查報告，其中提及政府擬出的部分，決定發給老人和傷殘人士額外的補助，但福利要協同十萬名公援金額水平，以作分配。政府於是委託中大社會系進行研究，看看政府應如何改善公援。當時我在中大社會系專修研究的課題是貧窮，這個研究便交給我去做。

首先，我確定不會採取英國（Low Income Group）和（Very Low Resource）於十九廿五歲用是量貧窮的方式。你的是欠缺生存的條件。從事社會經驗告訴我，香港家庭無論怎麼窮，「食」是不餓，穿不暖，這就是說，香港已過赤貧的階段，香港人雖非富有，但只要找到工作，收入足夠維持生活。有些市民因年老、傷殘、失業等原因，沒有收入，但政府設有2000援助，讓低收入者生活開支，但不會叫人餓死。

其次，我確認香港的經濟已發展到了相當水平，資源足夠保障每個市民的基本生活。所以，貧窮問題不是資源不足，而是部分人未能賺取資源，需要別人的幫助。任何社會，總有一些人有錢，一些人貧窮，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問題是社會是否願意協助窮人，協助有多。對於貧富差距，社會是否感到哪個地步，我們又是否願意看光顧越富裕的社會。一些市民僅巧生活在赤貧／中下1977年發布雜誌時，有人「劍指博愛，罪惡畢露」，但此市

民窮到「無錢開飯」，如唐代詩人杜甫說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的社會正常嗎？

或許我這觀點都是出於婦人之心。過去，有人說我「好不做壞事」，在有良知的社會裏，我當醫生的家會亂看，我認識一些中央黨部「是錯的嗎？無論如何，我當時的結論是：我，應單單研究怎樣改善公債，儘量給我訂個定義，請大眾知道貧窮是什麼」，因中，我既決定「貧窮線」不等於赤貧，所以貧窮是相對的，即窮人被界定為窮人，不是他們太缺乏食，而是相對於其他收入較高的市民，他們的生活十分艱難，買東西都要精打細算，比十元五塊，要是差一點，怕別人看不起他們，而防備自己比看不起自己。

窮人的真實生活

當我提出用相對的觀念來定義窮時，有人質疑窮人為什麼「孔子的弟，顏回學『一簞食，一瓢飲』，這不難得嗎？但顏回不是貧，且得孔子的稱讚，是因他太貧窮，顏回的高尚人格，許多人可以仿效，我常常做場實驗，要求班上工的学生以分我的全部「零錢」生活一個月，體驗分成受過人上所過的生活，同學其他做「『一簞食，一瓢飲』」的，也做，就算把也和顏回，這必須有最便宜的，一個月後，他們沒有剩餘的錢，還用多。

窮人的生活就是這樣，每天一個錢，還要過過量度過，年存都沒有受到威脅，但這樣的生活，二十個月，社會叫人發瘋的，可

舉一個例子，有單親家庭的家庭，子女很喜歡吃糖，肉類的價格比較貴，會買便宜的一種，脾氣的「錢」會買便宜不買肉，「女型」女孩，看她的營養比較高，小孩家庭的貧富，「一般市況不會用口」認為這些只是單親中，就是這些單親中，「有人煩惱，富家便事情難受」，比較價錢，便宜就博，我問她的錢，這樣的牛馬，窮不好過。

我決定以相對性貧窮的概念來進行研究，但問題來了，怎樣的相對性概念才可以用為量化的標準？我查英文獻，發覺過往以相對性概念作為基礎的研究，人的可分為「種」，是以收入分佈的情況來量度，例如把全港的士巴路收入分為三個等分，收入最低的10%或20%，便劃分為貧窮社群，成為援助的對象，是以生活開支的情況來量度，例如士巴路由於食物的開支超過整體生活開支的50%，這些士巴路便劃分為貧窮，政府給他們提供援助，減低他們用於食物開支的比例，這樣，他們就可以有多些錢用於生活的其他部分。

第一類方法是我最後決定採用的，是以「話方式來量度貧窮，這種研究方法牠生起來較複雜，卻最能反映窮人的生活狀況，其實「窮」的定義，已超越「吃不飽，穿不暖」，還有什麼比「話方式更能顯出有錢與沒有錢之間的分別，以上講到窮人的生活，每「話」都要仔細思量，非有錢的人，想買的東西就買，甚至向財政司，長途過渡的「錢」了「才是你的」，對窮人來說，「還回來」的錢才是自己的。

我當時以生活方式來量度貧窮，主要是參考了英國社會政策學者P. Townsend¹所發表的報告。他正是採用生活方式來量度英國的貧窮狀況。除了很多科學的報告外，我還花了不少心思，認為在香港做這種研究是可行的。從開始，我便以總家庭收入和開支等數字來分析貧窮。我希望研究可以真實的把窮人的生活顯露在大眾面前，讓大眾認識到，貧窮不是我們想像的只是「極點」，而是無時無刻地影響着窮人生活的每一個細節，包括他們每一個決定、購買的每一件物品、向家人所作的每一個承諾，金錢都成為他們心中的考慮，他們無法逃避金錢對他們生活所起的作用，正處處受制其中。

貧窮生活是怎麼一回事？

為探討金錢在窮人生活所起的作用，我設計了一個問卷，用意是量度不同收入階層和社會背景的市民對窮人生活方式的意見。如我所料，食物食費佔支出不一定是衡量貧窮的指標。多數受訪者，就算午餐都是幾塊錢的飯餐，不代表這家人「貧窮」。在香港四、五十年代香港人的穿衣習慣十分隨便，先脫膠衣後襯衫，的或膠衣十年全領口，年青人參加歡宴，只穿T恤牛仔褲也不會失禮。衣着，順乎個人的品味，與有錢或貧窮沒有關係。

貧窮觀點調查問卷

如一個家庭個人息有限，無錢而必須做以下的事情，每認為這

個案題是甚麼呢？請在適當位置打勾

範圍	表居住行的問題	是實察	%	不是實察	%
1	房屋上多於地（外地房）	40	12.4	273	87.6
2	高層——購買時這房中與鄰	117	36.0	206	64.0
3	中區舊屋村——在過時設施—— 設施及門	104	32	221	67.9
4	在屋上部分可實察	88	26.4	240	73.6
5	在屋上——過時設施及門	115	35	201	65.3
6	只有非常緊急車才用道的士	59	18.1	267	81.9
7	今日屋上——新地——鐵路	36	10.8	269	89.2
8	房屋內全沒有間隔	149	44.3	177	45.7
9	孩子讀書室有自己的書格	134	41.4	190	58.6
10	在屋上——只有非常緊急車才用道的士	146	42.5	167	57.5

範圍	屋內設施	是實察	%	不是實察	%
1	有廁所	217	66.8	106	33.2
2	有廚房	211	65.1	113	34.9
3	有浴室	166	51.2	158	48.8
4	有書格	179	53.4	144	44.6
5	有客廳	216	67.4	106	32.6
16	有電話	197	60.8	127	39.2
17	有廚房間	208	64.4	115	35.6
18	有浴室間	84	25.9	240	74.1
9	有書格	55	25.9	270	83.1

範疇一 教育訓練		是實際	%	不是實際	%
20	是否接受過專業培訓	12	6.0	173	84.0
21	是否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培訓	191	93.8	131	64.2
22	是否接受過實習培訓	231	72.4	88	21.1
23	是否接受過實習培訓	29	89.4	34	10.4
24	是否接受過實習培訓	232	71.4	93	28.6

範疇四 生活環境		是實際	%	不是實際	%
25	是否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培訓	19	49.6	9	60.4
26	經常不買報紙	164	32.0	221	68.0
27	假日常感到忙碌	51	18.0	275	84.4
28	從來沒有出去外地旅遊	66	20.3	259	79.7
29	從來沒有去過青年公園	73	22.5	252	77.5

範疇五 生活方式		是實際	%	不是實際	%
30	是否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培訓	59	68.9	66	71.1
31	是否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培訓	96	60.1	128	74.5
32	每年無錢去旅遊	270	83.1	55	16.9
33	接受有否接受過專業培訓	247	78.0	78	24.0
34	是否接受過社會工作專業培訓	30	44	230	80.0

在表四的項目中，明多士認為「代表個人生活方式的」是

「個」，「北部對唔起邊食海鮮吃」，及「輸就要穿呢部穿過的衣嘅」，這兩個單「得個的」認同基本一致。這「得個的」受訪者中的「得之」不認，的「得之」都對衣服「衣與食」的選擇與貧窮生活方式關係不大。貧窮「得之」再提「食不飽，穿不暖」飲食習慣和衣著就只算是個人的喜好，是不再受有錢和沒有錢的牽制。

衣與食以外，住與行，而又有那些可見表窮人的生活方式。香港八十年代已完成部分地鐵工程，成為香港大眾日常的交通工具，最暢的士，地鐵普遍，所以沒有「個」的「得」代表窮人的生活。「得」的項目中，有反映被訪者認同「貧窮家庭的特徵是「屋屋內金沒有問題。」這個項目在後來的調查改良，水中是每個受訪者都有自己的家，「屋內是屋內問題雖有一致的定義，不同人對此有不同理解，例如「兩木板分開的地方是各算各間房，公屋單位的「騎樓」算是間房嗎。」

屋內設備，「得之」對屋內的房屋，大部分有齊全的基本設備，如廁所、廚房、浴室等。較家庭三權有各種電器，如電燈、水喉、電視機，所以「得之」的答覆，或受訪者認為「家庭中沒有（？）裝置就是貧窮，廁所、廚房、浴室、電視、電燈、電話和收音機，其餘種種設備，洗衣機和冷氣機」，有5分，受訪者同意是家庭貧窮的象徵。我的理解是，廁所和電視機等「個」的「得」已被視為每個家庭必須有的設備，沒有的就是貧窮，「洗衣機和冷氣機」因價錢昂貴，而當時「屋內」不許在屋內安裝空調，所以「家庭有這些設備」不是貧窮家庭的特有情況。

醫療和教育方面。列出的三個項目中有四個被列為貧窮家庭的特徵——家人有病要去公立醫院醫治，「家人大病後買場送好野食補身」，「戒一讀書一買場起醫作武祖湯」，「就是戒了讀書就望好」也要靠九「免費教育渡出書」作——若果顯示香港人「分重規」女的教育——醫藥教育好明顯密切家人，這些都是華人社會認同的責任，是每個人都應該做的。若果顯現去履行責任，就為貧窮所做成的結果，所以是貧窮的象徵。

生活方式和人情關係方面，有一個項目被視為貧窮的象徵「全係生日都買場送禮物」，「新年無錢派利是」，「親友有席慶事無禮埗」，香港人好句說話「人怕窮怕衰」，就是到「今天」，到「朝」人話親朋友結婚，「已無錢做私人情」亦是不起賓客。可見人情這件事，無論社會如何改變，都是不可避免。如果人來說「本聊借錢」也不能兩手空空的參加親友喜宴。

貧窮的九個指標

有了初步的認識，我再做了一些統計學上的分析，最後選取九個項目作為衡量貧窮的指標，這九個項目是

家中是否每一個成員都有自己固定的床位，

家中有沒有電視機，

家中有沒有書櫃，

家人有病時是否通常看私家醫生，

家中在喜慶時 全家 股有沒有出街吃飯？

除「過時過節」外有「有酬發喜帖」？

親友有喜慶時 有沒有送禮做人情

過年時 有沒有壓利是？

平日有沒有過朋友飲茶吃飯？

除了「這九個指標」我得到統計處的協助，隨即進行全港性「抽樣調查」訪問時採用的問卷（除以上九個項目外，還有工作、房屋、就業和收入等基本資料，還包括他們對貧窮的看法，調查成果訪問「的」，而統計局「處理結果大型的」，所有數據是經過分析的。

調查結果顯示：貧窮人口共 141.7 萬人，佔 48.4% 全港約五百萬人口的 1/2，比十四萬多窮人，數目是多多少，我自己不會作之論。當時有些認為「以土法方式更可靠」，有「科學依據」，經過大調查而出來的數字，與口條和其他方法計算窮人的數字「實際」相差無幾，又怎可謂調查用科學方法不科學？

調查報告發表後，引起社會人士大加討論，從無理監視攝像的種種刺激，亦是其中之一。此一集思廣益問題，故黃允財飾演的男角是愛動腦，女角麥嘉聲言：「男仔才需要必須配備電視機等物品，而鼓勵女兒不要嫁他，因為「陳先生還要早屋」。這是從人的說話中反映了在「七十年代」市民仍以「食不飽，穿不暖」來形容貧窮，而是看一些「表示生活水平」的家電設備和生活習慣。

社會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我這種生活方式會變得更壞，好處是可以比較地減輕窮人的生活狀況。第四五十年代時，單是「餓」和「無錢搵飯」便逼走了窮人的祖輩。到了八十年代，香港已是小康社會，窮人的生活，相信，已「他朝我他朝是拉差」起，也可擺脫窮人面對的冷峻和嘲笑。

窮人可以不與他人比較嗎？

從七十年代初期開始的十多年裏，香港經歷了三次波折，連幣兌換美元也起大落，中英談判衝擊港人信心，中產家庭大量移民海外，加上「六四」中的憂慮，都令港人感到陰霾和不安。相對土生土長和邊緣化的基層市民來說，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已往來人的生計，會否因政局的，即因而改變。他們的卜筮，會否在香港前途的困局中失去教育和發展的機會。

我在八十年代初所做的貧窮研究，多和社會對以上問題探討了答案。首先，窮人並沒有很多選擇，沒有錢，「食草」又冇來儲蓄，港幣貶值不利他們的事，更不會移民外國，他們草拚的是搵足的生活，渴望的是自己不要與別人相差太遠，如當年回歸就是個人有得派，自己不能落到無米飯。雖然50包裏的數額會一點一點人家裏有電視機和雪櫃，他們也應有同等設備，除了可以抵擋一點風和雨之外，吃飯，他們也應可以調一下口味，食雞的食雞當然不能養雞，豈言之，自己就算是窮，也不想與別人過着太犬豕欄的生活方式。

窮人有這種想法，最普遍嗎？這種「人有人有」的要求，我們應該接受，盡可能去滿足，還是鄙視他們，認為這是「貪得無厭」？我領導的「理論」研究是隨著市民「話」的改善，我們為民生的看法，應有所轉變。我的調查報告發表後，隨後正有不少關於窮人生活的調查，有些正採用「生活方式」的研究方法。例如，八十年代的年輕人喜歡看香港新聞，運動點，有報道青年人為了得到一雙名牌運動鞋，不惜做違法的事，勾結違法行為，為的只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當時社會上有不少議論，我意見認為，如果承認買「名牌」運動鞋，向工人不應區別，比較「廉價的」帆布鞋，帆布鞋一樣「可以穿去做運動」，亦有意見認為，青年人「貪心」較多，不想被同學看扁，別人有的東西，自己怎可沒有，為什麼買單就會給別人看不起？

當年「麥當勞」漸趨普遍，有調查顯示，窮家孩子多思「母親帶他們去買美麥包而滋味」，小孩「真的很想吃漢堡包，我看不見小孩子看見同學地排排隊去排」，麥當奴「自己回家吃漢堡包，他們心裏會怎樣想，怨恨自己家窮」，「每無錢令他們到「麥當奴」，還是靠自己賺來吃不到漢堡包，更不至於排隊」，所以沒有「要大方」，「我希望小孩子有骨氣，不會因為窮而感到神衰，但在現實社會裏，誰能去與別人作比較，改變了自己的原則和理想，大人做不到，何況是小孩子，批評別人很容易，但多多人真的做到去實踐道」。

香港人常說「人比人，比死人」，說話不無道理。兩坡智慧也說「比不足，比下自餘」，我們不能凡事知足，物質匱乏情

然，足赤金一個多的人可以應酬得起，我們變態和別人生活在一起，人是群眾的，自然會互相比較。各人就有不同的喜好，但富人人點覺得一些物品是生活所必需的，自己沒有，就是一個好的問題。是我輩的後輩。我做的調查發現，人性是不想窮窮，承認自己貧窮的感覺並不好受。

1965年，我第一次出席「社會福利發展十年計劃」的檢討會，討論的是給殘廢及弱智兒童補助的金額。會上，我用一頓親身看見的餚子來說明金額應增加。我好像武鬚仔的舉動，……就也解凍看看。（成群的中學生，游來「舉例」地）來，他們駐足冰池門口，生食蝦、喝汽水，還買兩串魚蛋吃，花費十七八塊。我在會中指出，如果有助取公債的學生，他們沒有餘錢，費冰中後會怎樣做，是否離開不與其他同學一起走，還是向其他同學說自己沒有錢。我希望公債的，有了誠實的對同學說真話，但青年人有這個勇氣嗎，如果我是他們，我會混假話來掩飾窮窮事實。

富裕與貧窮 觀點與角度

到「八十年代，富裕和貧窮有多種變成觀點與角度的問題。難有絕對的真理。……同年，同屋署建議以居民月收入超過一萬五千元，應提高他們繳交的租金。社會人士稱這些「門戶」為「富門」，「卡」為「低市民屬低門階」，怎可算「富有」，應注意是收入者改善。我當時在報章發表了〈論文〉，談到香港人對貧窮的看法。簡錄如下：

什麼是富裕，什麼是貧窮，這是千古以來爭論不休的題目，去年房屋委員會擬議將富裕住戶及「資助和增加租金計劃」管轄區，劃如以界定，但即引起不少爭議。是否全家的收入超過某一限額即稱為富裕，但各分單既無論訂在哪一水平，都難得到大多數人士的同意。其實，極多非收入較高的住戶為富裕地，多份富，一來在香港整體收入的分佈中，我們未必真的富有。一半住戶在公共屋邨的居民劃分為富裕如不富裕，則兩者都不會有好處。房委會的建議，目的只是希望收入已有改善的住戶多付一點租金，這樣便直接知道些為收入較高的住戶，也不用冠以什麼富裕的名稱。另外，如果建議只是關於租金的問題，那麼反對的，也應集中在這個問題上，而不應為著富裕，抑或欠債史事。

至於貧窮，如果以街上乞丐的數目作為標準，則實在太無稽了。香港不見沒有乞丐，但只發生在過路者，我們要是有一點辦法，絕大部分香港人都不會無恥到做乞丐乞。事實上，自一九七一年政府成立現金形式的公共援助以及申請的人，約不多，而各資格領取援助的，不是年老無依無靠，便是患有癱瘓或身體殘缺，那些有工作能力的，只要有，肯僱用，多數不願長期倚賴政府的救濟。

在一般香港人的觀念中，貧窮並非是罪惡的，對即是上，一輩戰過來香港的，除少數人外，哪個不是馬牛墮金，但經過「百萬富翁」這些人的生活都得到改善，而香港也成一

個盲目發展。五十年代的「難饑荒」饑饉交加，但正是苦力、救苦肉身，在在亞洲區數一數二時工商業城市。香港雖然有今天的富裕，但對於戰後來香港的人來說，五十年代的難饑還是不會忘記的。

香港新一代無從把貧窮忘記了。物質的富裕使年輕人以為香港從前便是這樣。隨著經濟發展，吃不飽和穿不暖的時代可算一去不復返。但上一代卻常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努力不懈的執著。香港回歸前時代是重新思考，對年輕人說，他們所關心的，已非基本衣食是否足夠，而是在生活方式上，如何才可適上則矣。整不來他們入心下止。事實上，物質亦是豐盛，年輕人愈是不能扭緊。上一代不認為貧窮是可恥的，因為他們多曾嚐歷貧窮的滋味。但當大部分人都得到相當高程度的物質享受時，貧窮便不是必需了。因此，年輕人對貧窮的反應可能比上一代更敏感。他們不但不能避窮，他們甚至願意不擇手段，去擺脫貧窮的困厄。

香港人對貧窮的觀念，無疑在急劇轉變中。香港人除了「食貧不笑話」，相貧窮已成失敗的象徵。很多人不願承認自己窮，並非他們收入比別人高，而是他們不想在別人面前承認。說成，或自己經濟能力不及上地人。在一個競爭激烈的社會裏，這種反映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除了物質的標準外，香港也被之其他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尺度。

神光畢竟改變了。成功人士雖非腰纏萬貫，但貧窮的人，則肯定不會在香港有甚麼成就。富強，這份觀念是不正確，但除了經濟條件的人，不論他有多「成功」，相信也難在香港有發展。這情況又，可能並非香港獨有，但在一個缺乏高尚理想的社會裏，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

或許香港社會，自察與經濟繁榮逆反？何光偉有興趣把毫毫鉅細出來，至於貧窮的人，也即既是社會的失敗者，除了依賴社會命運的救濟外，哪有勇氣站出來香港社會更多幫助。這樣，香港便只有繁榮和穩定，貧窮的人就不會對社會有什麼貢獻。大多數人也樂於不提他們。

上述言論或許有點偏激，但可發現：除了自然基本生活而外，觀測者，他們更感憂慮的是，他們無辦法增加自己的收入，生活會不好過，雖不至要匍匐八街，但會處於社會「墊底」的，非「被」人覺得自己好食懶食，他們毋須承認自己是失敗者。社會對窮人有這種印象，貧窮逐漸變成可恥的代名詞。

貧富懸殊變得醜惡

八十年代的小康社會

經過三十年的經濟發展，香港到八十年代已是中區社會，日常新聞報和東方、高層處處，地下鐵路各線路線陸續通車，地產私樓叫賣最熱發展的新市鎮。窮人當然不會消失，但需要政府援助的家庭不多。到八十年代中，香港的住戶有百分之九萬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的個案，有七萬二千，其中老年個案佔百分之三，共四萬八千零一百，因低收入及失業領取綜援的個案，不及百分之三，領取綜援的個案不代表全部窮人的數目，但可反映市民能夠自食其力，只要有工作，生活就可過得去。

當香港逐漸變得富裕，市民關心的事情開始轉向致富之間的差距，這收入貧富懸殊，只有極少數有錢，貧富兩極化的情況不會顯著。到了八十年代，那時有一個教師人，從事製造業，賺取的工資不會相差太大，工廠正氣缺人手，工人生活相對穩定，人家都把錢去賺多些錢，不會太介意有啲人腰纏萬貫，其差距始終有限，他

們也會覺得奇怪。比有錢人更有錢。

以前向「我師傅俾我」傾嘅成山主，多數是收中學或大專教育，多可在政府部門或大機構任職。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事業。收入足夠他們置業安居。生活頗舒適。逐漸「香港」現一個不需要為基本生活煩惱的社會階層。他們不用「兩餐肚子脹」，可以追求生活享受「喝紅酒，看法國電影」。

七十年代開始，除一般中等收入人士和家人開始參加旅行團出外旅遊。初時去的地方，是東南亞地區的泰國、菲律賓、新加坡等。但隨着過去，他必須申請批發手續，才能領得後來有機會到日本。已是「廿家數」香港的旅行團，着重的是吃、喝、玩、樂。參觀名勝古蹟其次。行呀就是：斷的吃，不斷的購物。雖有什麼文、有話可言。目的是盡情享樂。這按在香港外的所謂生活。

當時參加旅行團的團友，並非大富大貴。一是收入增加，生活有改善。到有機會到海外走走。享樂之餘，回家可同親友炫耀一番。講說自己旅遊時的經歷。不外是「的舊店紅何豪華，吃的正樣特別。香港人有錢出外旅遊，可見生活多已擺脫「窮困」開始對自己的生活添點歡樂和色彩。

參加旅行團的有老有幼，很多是全家入一起去的。我常看到的是「子女長大」出來工作，有點積蓄錢，與父母一起旅遊。表示自己對父母的孝。這是對父母說，自己長大了，可以養。

其實，他們的父母年紀一點也不大，只是二十歲，多是戰後來港的華民或他們的女子。來港後，靠工作，一直沒有出外遊玩，最終看見兒女長大，在友誼的環境中成長，暫時有機會，家出外休養。

階層分野變得顯著

到六十年代中，香港的階層分野變得明顯。社會上的市民或人口需要倚賴政府的公共服務，如公共房屋和廉價醫療，方能維持基本生活。餘下的，可以自給自足，毋需家人資助，令家庭收入足夠養家糊口。香港也出現一些非傳統家族的富有商人，他們白手起家，戰後來港時兩手空空，但經過二十年的奮鬥，成功變成富甲一方的大企業家。這樣的例子，過去有不多報道，現在這裏多敘述。

在認識的人中，也有白手興家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有親戚隻身遠離來港，他剛十歲出頭，初到香港，全沾祖傳技，作粉團及發叉子粉，因沒有家人，晚上在茶館留宿。幾年後，他投師餛飩，收入增加，自己成家。不到二十年前，他在門口，自設攤開「自己第一間店頭，專門做餛飩，後來店鋪變工廠，訂單源源不絕，生意愈做愈大。到六十年代，這位朋友已是社會上略有點面目的富家。

香港逐漸變得富裕，除了，社會上年老和殘疾必須倚靠福利

國助外，香港是否擁有窮人，「貧富懸殊」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課題。² 1992年1月，我在報章上發表了〈窮題為「貧富懸殊與社會公平」的文章。

最近接受一個英國電台台的訪問，記者問道：「香港人衣食住行，走在街上都是名貴名車，吃的盡是各國的鮮美味，香港是不是一富有窮人。」我思了一會，腦海裏浮現著香港的繁華景象，隨即回應說：「香港哪會富有窮人，你看不到數以千計無立腳之處的「劏屋」居民，十萬名被駁於公屋輪候的貧困人士，五萬名在勞工短缺情況下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士嗎？」。

記者追問：「香港既有不少以億萬身家的富豪，才有估計市民收入不成餬口，香港是不是一個極不公平的社會，政府有策略改善，說香港公平，但貧富懸殊要實令人憂心，說香港不公平，香港卻充滿機會，今天的富豪差不多全都是白手起家，所以香港經濟的反應富者中第，可見香港並非不公平。我避開問題不答，只簡單的說：「以香港今天的財富，社會裏才有人士應得到更公平的特遇，我們社區的關懷是不足夠。」。

最近參加的研討會，講者不約而同的指出：「香港正正經歷急劇轉變，各階層是包圍（enclosed）作為孤獨和閉關以七十年代開始，香港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香港貧

香港經濟大是意料中事。在七十年代，香港初步工業經濟為主，製造業工人，是佔全勞動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而製造業工人的工資水平，所以香港那時才出現低物價低租金。但自八十年代開始，中國大陸開放，香港製造業急轉，製造業工人數目由佔全勞動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不到工人轉去做各行各業，無去轉業的，在忍受工資不斷下降的境況。在經濟轉型的時期，收入分配不公平，難免造成貧富差距擴大。

還有一點造成貧富不均現象的，就是在勞動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是大陸移民。他們教育水平較低，又缺乏現代技術，只能賺取微薄薪金維持生活，香港戰後也有百分之十大陸移民，但那時香港經濟結構簡單，大家都是窮人。七十年代以後，情況就改變了，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做的研究顯示，戰後早期移民中集團與家庭經濟的收入不齊，二十多年後差距愈僅有。

香港是轉型的資本主義社會，富者愈富，窮者愈窮屬自然現象。但香港到了哪個程度才值得憂心？首先，我們說香港差距擴大，是不表示所有「食不飽，穿不暖」，或他們的社會愈來愈差。整體而言，香港人的生活水平仍不斷改善，只是，一些人的收入以一倍或兩倍的幅度增加，一些人卻只有輕微改善，或今年加了百分之五，下年減了百分之五，或無。香港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但一般人的生活仍有改善，所以在心理上，覺得差距並不明顯。譬如一場競賽，同跑一萬米的和

我的差距愈來愈大。但只要大軍仍在聽，我的不會覺得自己差勁。我養一隻羊，它停下，我的就會發覺差距太大了。

所以，中國香港就略低了些增長。貧富差距不會造成社會衰退。但衰退，已出現。大陸經濟停不前。其實，先不為社會也必然出現不安和動盪。目前環境來說，香港差距並未造成威脅。但政府是否可以袖手旁觀？答案是否定的。任何人都知道，香港不能永遠以繁榮而沒有罪過。香港差距造成無法填補的鴻溝。貧富差距的社會衰退，生命痛苦。或許香港不會出現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大革命的聲音。但七十年代中產階級的不安不穩。相信很多人都不會忘記。那時女士不敢單獨外出。男士夜間走在街上也心驚膽跳。

不過，政府是否有責任縮減貧富差距。這是公平的問題。香港要成為安穩繁榮的社會。社會裏必須有軍人認可的公平。這公平使其人權和自由。香港無端是永久人權平等。這種制度是實證成多於好處。但也不像事任何入勤奮工作則無由要求甚好。香港應繼續研究對無門。這樣的社會是不公平！

為了公平，社會不能對貧富差距坐視不理。但不能為「平均分配財富」造成社會上錯綜複雜的現實。

貧富懸殊成為熱門議題

貧富懸殊所以受到關注，主要因為政府於 1971 年開始計算香港的基尼系數，¹ 基尼系數是衡量收入分配等的數字，到八十年代（一九八〇年代），媒體和學者常用基尼系數上升的數字，指責政府，指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的問題。有一次，我出席香港電台舉辦週日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城市論壇」，當時討論的主題是房屋如何對付基尼系數不斷擴大。那是 1984 年的時候，政府剛公佈 1981 年人口普查的初步結果，² 基尼系數是 0.34，是國際平均 0.3 的指數水平均相差不多，³ 上下的 0.1，和 1971 年的 0.27 相比，收入總分佈擴大，⁴ 不過，原來貧與富的收入差距愈來愈大。

在論壇上，有講者認為基尼系數走向惡化，政府不應坐視不理，認為香港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我認為這樣的說法太片面，⁵ 雖然「基尼系數」是量度收入分配的情況，與窮人的數字沒有關係，⁶ 即使有錢人多，⁷ 也不表示窮人的數目相應增加，正如其他大城市，香港的經濟以服務業為主，僱員的收入差亦較大，⁸ 人總是不自然認為應減少，紐約、倫敦、東京等大城市，⁹ 收入分佈一分九塊，窮人的數目也不會少，但這些大城市都沒有各項社會保障和福利措施，窮人只會流徙街頭，得到的僅是生命，¹⁰ 在香港雖然過很好的生活，¹¹ 所以，「基尼系數」的高低，與窮人的數目和生活水平，並不一定有關係，¹² 貧富兩極的愈來愈嚴重，並不表示窮人的生活愈來愈不好過。

學界多數繼續反對窮人的救濟，但社會收入才線不平衡，難免造成貧者愈窮，貧者愈貧的印象。「民食在街」，月見有錢人生的明車愈享愈多，貴人十年代有統計顯示，以人口計算，香港人均擁有的「芬蘭蘭斯」和「五十」牌車，是全世界最多的。那個時候，傳佈經常報有窮人的貧困，去，高不可攀的有錢人生活羨之，餘，莫不夢要問：為什麼這些人這麼有錢，凡，智識的稍多過他們，一個月約糧，公平嗎？

1981年，月，時任立法局議員的馬傑基，在會議上提出動議，促請政府「研究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及要求政府提出應有的措施」。馬傑基的觀點是：香港的經濟雖有增長，但貧者甚少受惠，愈來愈「闊」，貧困而民及不公平地分享經濟發展得來的利益。政府的回應，成為日後的政策答案，就是政府向兩任在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即政府經常病的「社會安全網」(Social Safety) 而香港作無貧者主義社會，政府無意，無情維護貧苦老百姓。

八十年代開始，貧富懸殊，首是社會上分層，立法局議員方面，傳媒不時報道香港有多少個商人打入「黑名單」內，多少「打」，多少「年」收入，以千萬元計。另一方面，新聞常常報道有多少市民生活貧苦，貧，環境如何惡劣，多少老人以拾荒果作生計，何窮而？有句國語說我沒錢問，問的是街上走的是否世界最基層市民的生活不好過，香港是怎樣的社會，我，馬，1986年，月，在「中國現代化」研討會，對香港貧富懸殊的經濟作一問題，節錄如下：

香港貧富不均，相信不會有人異議。香港作為極度開放的社會，貧富不均屬正常現象，是推動經濟向前發展的動力。因此，問題並不在為什麼，它人有錢，它人窮窮，而是為什麼在六、七十年代，香港收入分配極度不均。細則，八、九十年代，情況卻轉趨惡化，貧富的差距愈來愈大。香港政府是否有責任收窄貧富差距的幅度？

對於香港貧富差距擴大，財政司的回應是堅尼士指數不是準確的衡量方法。財政司認為香港市民於公共房屋、醫療和其他福利設施等方面得到的資助，並不能從堅尼士指數中反映出來。財政司的解釋自有理，堅尼士指數只分所住戶的收入分配，卻忽略收入最高收入的住戶按序排列，由此計算差距的幅度。至於住戶的實際開支情況，及他們的生計水平，更不是堅尼士指數可反映的。不過，政府卻迴避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也就是香港的收入分配為什麼差距會愈來愈大，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也許有相似的现象，但作為負責治理政府官員，財政司不應視而不睹了畢竟貧富懸殊，對社會的穩定有負面影響，政府怎可不關心？

收入分配不均，不，一定是壞事，只要全體市民的上層有改善，部分人士收入較多應可接受。不過，香港近年卻出現兩種特殊的情況，使貧富差距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一，是轉運屋升使財富高度集中，八十年代間，它還專門記錄的項目轉而服務富，更可增大中產階級的數目及他們的收

人，但繼續上升，這也即收入的主要部分轉移到極少數富有人士手上。結果是財富高度集中，中產階層無法享受收入改善的好處。第一層，新移民增加造成低收入階層擴大五十。新移民本身並不是問題，但他們多以中國農村或鄉鎮為背景，教育水平低，也多無一技之長，求職時多只能找到低薪工作。新移民占香港人口百分之重要部分，他們所得收入偏低，貧富懸殊現象只會惡化，不會改善。

不過，四十年的經濟增長，平穩回歸前，市民每天見到的，盡是繁榮繁華消費的標值，物價繼續上升，物價如脫韁之馬，1.5倍位數，倍增，倍增緊接倍增是真實嗎？市民心裏十分迷惘，覺得繁榮或許是必需的，是個發展力罷！但升溫在回歸前經濟陷入衰退而製造出來的假象。

香港聯合、緊密經濟財富高度集中在：極高收入層，繼續上升，誰知道最大，股市變，高位，賺錢的是金融機構和退休的老人家，還是操控股生人，大港的炒家，結果，香港社會階級收入和財富都增加了，但富人和窮人，差距愈來愈大，貧富懸殊將會愈來愈觸目。96年回歸前，香港仍未呈現明顯的地區現象，但市民隱見的是，社會分化工作，呈現象，惡劣逐漸加深。

97年窮人的生活

她所窮人的生活：1997年，我在徐華碧表了「窮人章」

題目是「貧窮家庭生活實況與成因」 翻譯如下：

當我提到一些關於香港貧窮家庭的數字，碰見的朋友多表示驚訝，認為香港近年經濟發展穩定，香港民的生活不斷改善，為什麼在社會裏仍有數十萬計窮人？一些認為是激進團體慫恿政府把數字誇大，意欲提高福利金額。他們認為，問題在乎貧窮的定義，每人每月一十元的食物費用尚以不足夠，但一家四口，每天八十元，便可維持基本生活。此外，我悉你按金銀的朋友都有一個疑問：這些貧窮家庭是否申請公援？一家四口包括租金在內每月會額超過一萬元。如果他們住在公共屋邨，除房租金還有七、八千元，隨手基本衣食雜物有餘。他們為什麼不申請，卻甘以艱辛收入生活在赤貧之中。最後，很多朋友都問：確實的問題是什麼。

我不想在數字上糾纏，更是我自己觀察所得。我也曾看看香港窮人的生活，及什麼原因導致這些市民生活有困難。到1996年底為止，領取綜援的個案超過十萬，是前所未有的最高數字。十萬領取綜援者中，因年老原因申請的佔百分之二十，人數超過十萬。香港六十歲以上人口約八十五萬，即是說，八個老人有一個是窮人。除了領取綜援的老人外，是否還有其他老人也生活有困難？答案確是有的，但確實數字無從知曉。

香港為什麼有這麼多窮老人，需要十分簡單，是政府過

產生了「個個大唔得」經濟不穩定退休保障制度。沒有退休保障制度有什麼更直接。以下是「唔有租有屋」的例子。五十年代的「香港人口調查」顯示，多是二十歲出頭的男子隻成夫婦走到香港搵錢搵錢。這些年輕力壯的男士，對香港早期的工業發展有極大幫助，提供廉價勞動力給「港督」及整個人口年輕化。不過，四、五十年代，這一批戰後來港的男士，有家室的就算有子女支持，但部份仍是孤家寡人，初期收入不穩定可以自給自足，成家體力不順，收入下降，或租住房屋，到後期人分租，最多人住「籠屋」，原係「生番」已得僑領幫襯的支持。這些貧窮老人為數不少，一些就是育有子女，但子女幫收入有限，畢竟應付自己的生活已十分吃力，亦有時須滿足多輩父母的需要。「打工仔，平日儲蓄不多，政府又冇是條計劃畀畀他們早作個咩，到了晚年，怎會不窮？」這些老人的壽數愈來愈長，退休後的晚年歲月，對育窮的老人來說，日子實在不好過！

除了老人外，現在領取公援的個案中，因失業而困的有一萬四千，低收入的，二千，單親家庭的一萬二千。這些數字不表示整個家庭，貧窮的原因是其人與非唯其本身生活。在領取公援家庭，其中不少是新移民家庭。我去年做了一個關於新移民的調查，促觸了「些新移民，其中一家丈夫剛過五十歲，過去在國樓工作，月入至一萬八千元。1984年時，他這四所公屋，生有兩個子女，過去他把薪金的一半交給太太，妻子在內地養育兩個子女，有幾千元生非費已相當滿

足，丈夫在下水時扭傷後開膏，生活問題可以解決。有假期，返回內地為聚妻倫之舉。去年初，妻子和兩個子女成功申請來港，問題立即出現。首先房租太大，略的房間，才可容納一家。不幸的是，丈夫工作的酒樓生意大不如前，唯時到車中餉手糊口。原有員工被迫離職，按合約領取遣散費，這令那時陷入困境。唯一唯神信仰的所屬是申請綜援。現在這個家庭每月領取的金額一萬多元，但租金支出是三千多元，七千元的生計費不算寬裕，但比之丈夫過去賺取的多，所以也沒有什麼怨言。

以上這個案例為例，香港是個家庭的數目正日漸增多，主要是家庭負擔較重。一家四口的稅、食、住、行和兩個孩子的開支，每月支出一萬元是不行的。不過，香港現有工資中，這數是九千五百元，每月薪金五、六千元比較普遍。以這個數目是「要緊」的人。這是香港面對的最嚴峻的社會問題。如果當家的人沒有工作能力，一如以上提到的退休人士、失業者和傷殘的，社會服務部門理所當然，以香港現有的福利制度，也是力不從心。但香港還存在有些窮人，並非他們沒有工作能力，只是「公司事的行業人例」。十年積累的工作經驗化為烏有，一星期之內也來港，完全沒有適合香港要求的技能和知識，只得靠當雜工度日，收入不足糊口。

這就是香港的貧窮現象！六十多萬窮人的數字也許有鬼誇大，但正在領取綜援的二十五萬四一點千死數，香港二十

窮人中間，一個窮人，數字是多或少，見，見智，但社會人士必須承認的，在香港這個富裕社會裏，窮人是非虛假現實，也不是學術上抽象的概念，窮人就是窮人，沒有政府的支援就無法生存，窮人的生活也得不舒適，全靠政府的援助，每天，細錢也要緊省，這樣就聽見村的生活非，抑不止的富人可以想像。

香港確實有窮人，而且窮得致命，為何科學家因為其他地區的窮，社會不應對他們更憐不憐。

以「文匯」總結「回歸前香港的貧窮面貌」不過，這篇的標題並沒有說，香港的地域範圍，有欠完整，曾提到國際社會其他地方，香港是否已沒有貧窮？

繁榮背後的陰暗

1994年4月，聯合國在外貿和本地發展問題第一屆社會發展高峰會議，出席的代表來自世界各地，包括是發展中國家有一百多個，包括美國副總統，泰國和中國的總理，會議討論的議題，符合傳神的標題，我寫「1994年文匯」有顯明香港在發展問題上所處的位置。

這次大會取名為第一屆社會發展高峰會議，但聯合國作為最具代表性的國際組織，早於六十年代討論社會發展

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關注焦點亦以修學堂建為首要任務，但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物質生活狀況改善，但增加的財富並未如想像的以社會主義方式達到平等（*Ten times down*）。富者比前更加富有，而貧者生活雖有改善，但與富者比較，收入和財富的差距卻更甚於前。隨著戰後國家重型的國防被神聖化，貧富懸殊引起的社會矛盾將更強烈，許多國家的政府發覺不能於貧富社會安定的動盪袖手旁觀。

聯合國曾把六十年代的整整十年訂為發展的年代（*Development Decade*），其成員國既是社會發展的工作延長十年，但這二十年內推動的計劃，對一些發展地區雖大要緊，一紙希望，但整顆心片，首屆仍是眾多國家的明視敵人，而實難解決不了。文盲、失業、城市化問題也難有改善的算事，六十年代，聯合國曾警告各國不問把發展看成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應以發展為綜合的考量，是經濟、社會、文化和環境等多方面整體的改善。聯合國雖對苦口婆心勸喻各國，但效果有限。貧生土力仍有待提高的國家，認為只有生產數字不斷提高最重要，至於財富如何分配，怎樣不讓富者賺又有推動經濟發展，又如何避免大量農村人口湧向城市等矛盾問題，都有作難之處的。在一些政治不穩定的地區，執政黨多認為如無內在短期內改善經濟，或有餓肚皮，哪會理會經濟發展與否帶來惡劣的社會政策。

這次聯合國社會發展高峰會議討論的焦點，以一七十年代

代討論的並沒有分別。同樣，世界經濟期刊的討論，雖不關貧或貧窮的主題，或許是「今天世界上這半國家」，貧窮情況不但沒有改善，且有資本和原料跡象。以美國而言，東歐的有百分之七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東亞是百分之十，東南亞是百分之十一，非洲除去南部是百分之十，西亞是百分之四十九。香港在過年的東亞，貧窮情況不算太嚴重，但人口稠密，百分之十一貧窮的人，總數即以億計。以中國為例，貧窮線是人均收入每年三百元人民幣，現在低於這水平的約有八十萬人。南亞窮人的比例最高，在孟加拉、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國中，兩個人中差不多有一人是窮人。窮人太多，可見這些國家政府工作十分吃力，也因為窮人太多，覺得可惜。這些國家也不需貧窮是怎麼一回事。

除貧窮問題外，聯合國各大召開的會議更對發展工作研究得詳細，已提及高率、工資水平、勞動力短缺時，貧富懸殊情況，年事問題等。按照以上描述，世界上許多富裕國家雖然物產豐盛，但社會發展上卻頗有缺憾。以西方一般工業發達國家為例，赤貧不再成問題，但初級市場類型的效果，失業率普遍高，長期無法解決，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福利成為國家主要的財政開支，而高稅率逼，勞動或受壓者的工資水平，如這些國家否月在華客上維持經營，社會發展腳步停滯不前，美國和英國是其代表者。

回頭看看香港，赤貧基本上不再存在，政府給予窮人的紅

合補助金雖有新改善，但領取者絕不會兩餐不繼。不過，香港也不是沒有窮人，年老無依者是。雖，此近日申請援助的家庭，竟有不少是長不大的孤兒。他們子女數目多，家庭收入多偏低。此外，香港經濟逐漸出現西方工業社會面對的問題，即有工無入錢，有人無工做。失業率慢慢向上調升。還有，香港不像其他國家以負有過龐大的軍費開支，但在貧窮懸殊方面，因政府無意透過社會福利重新分配財富，致使高低收入人士差距十分大。結果是，香港社會表面十分平穩，但內裏矛盾重重。

面對世界上的貧窮狀況，社會發展高峰會議建成的宣言確有十項承諾，但未能提出有效的對策。姑其量，聯合國可以呼籲工業發達國家多提供援助，但光憑工經驗看，只有挪威、瑞典、丹麥等七個國家，為貧困地區提供超過本身生產總值百分之十的援助。其他先進國家如美國、日本、戰後歐洲生產總值百分之零點一至四，數字十分可憐。從一角度看這些援助又發揮「什麼作用」？這些國家拿「這些援助去購買軍火」，「集中搞私營，探礦盡是會官商包攬，不但窮人得不到甚麼好處，且有權有勢的人暴發成財，歷經無窮時役卻受到壓迫。」

聯合國把一九九六年定為「發展教育年」，因此，這次社會發展高峰會議的討論，並未會因會議的結束而停止。到了明年，國際組織多將召開會議討論貧困問題，我們可以期待，一些曾留港香港國人士主事的班子，在香港，即是貧困者，

是否提高了綜援金額使不再有需要人士？是否有此的執實方法？是否搞一「兩文憑」等社會動便界有新變化。

94年也是聯合國訂立的「國際消除貧窮年」。聯一千一百多政府作「怎樣的回應」社會福利署於94年檢討綜援金額的水平。張志強在報告中建議全面及大幅調高綜援金額的數目。持異議說：「受助者」金額增加，「綜援金額提高」。政府福利會資格索取給市民功績，社會會增加。通過政府正福利制，至九七年度的財政預算。市內涉及過渡期。香港政府已必須把預算案提交上英聯絡小組會議。記得當時中方代表才。是陳其南。提交預算的是向陳其南的鄭其江。陳其江在會。批評香港政府這樣大幅增加福利開支。雖知在高地降。張強在。稱名貴跑車。給或名「軍用人士」。陳其江的批評是否有道理。我當時作了一些研究。以地利的角度來說。上了香港這麼多。確實令人感到意外。也覺得奇怪疑慮。但綜援金額水平簡直是事實。提升也有必要。我這樣的評論有點機咬嚼的。明顯不想向罪任何。但。張強在「不信任。我根本不知道他們言詞背後的目的。所以只能就自己所知的事實談論。

香港在過渡期出現的各種現象。很多都令市民感到憂慮和疑慮。這固。香港是不入為夢的城市。市民衣著整齊光鮮。處處高樓大廈。交通尤更暢。以國際標準總算。香港也是亞洲最發達。的大都會。不過。在繁榮的背後。市民正過着怎樣的生活。我希望本部分描述的。對香港從八十年代初到回歸前的十多年裏所經歷的。可能作點補充。這是本書寫作此目的。

過往，我亦有些機會到世界各地，發覺「光」色的繁華背後，每個人的邊緣感若隱若和明顯的。此「明顯」的隱晦和邊緣感非城市中的顯而易見，或大城市裏總會有的真正勾當。我愛讀的是，大都會裏人們聽見其台詞的「意圖」於一些成功的事例，如同歸國的處女，報刊有不少關於有錢人如何「發跡」的報道。富豪也喜歡其文章好的記述將他們歷寫傳記。

不過，成功例子背後，人們有沒有註視，多少市民多勤工作賺的博足糊口，多少命係玩用「舊門」上落，敗家場，多少因心理和情緒的缺乏而離不開是，多少遺憾「來源」始終生。當我們的目光只集中在一股成功的人，就難免忽略「眾多無光攀升」的「十窮」市民。及至多被媒體關注起來施舍的窮苦大眾，這就是我講的隱晦和全黑。城市裏沒有被光照射的地方。

回歸的「年」，市民的心緒確實有點恍惚，好像「一切都朝好的方向走」，暫時「都」好後可能「現」現的風浪，正不斷吸力和噴出的噴打而造成時起時落，一九九〇，過去，香港用許面對忽略多時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很受的神收就可想而知。元朗地區上之先，我憶要應給兩類人，「上」最受市民關注的窮人，他們是「較」和「靠」的老弱及病來維生居的內地居民。

老年貧窮與奉養父母

● 年，我在社會服務處的貧窮研究，細細是香港市民中

會兩類窮人最需要關注。一是孤獨無依的老人，二是子女最多的低收入家庭。第一類孤單家庭的數目正漸減少，在香港家庭計劃協會的大力宣傳下，年輕夫婦已減少生育兒女。外國經驗已證實，隨著「七情六慾」父母對子女的期望提高，他們也不愿多「栽秧」。醫學界則也提醒兒女扶老負擔重，夫婦不用多生子女保險。

相反，老年貧窮卻是香港未來面對的大問題。¹1947年，聯合國在德奧利維亞鎮舉「世界老年會議（World Assembly on Aging）」，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類有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和社會代表出席的會議。參加的人數超過一萬人，大會用「東方人非常熟悉」的舞廳作為大會的會堂。當時和老人可說「一見如故」。時候，我從灣仔摩頓球場的資料館跑馬地景光街上学，沿途經過樂人廣場、灣仔街市附近轉入禧街大馬路，常常看見老人在榕樹下乘涼，樹下有孩子在玩耍。這樣的景象，現在不再有了。雖然計市人口，是以有量處的輕視。

會後，台大文學院關於老人生存問題，醫學方面的新發現我聽不懂。如何護理老人的知識我是一知半解。最近做老齡化研究興趣的，是家庭制度的轉變與老人照護之間的關係。其中涉及我們的倫理價值觀，我很會講回家境，決定社會保障和貧窮問題外，還會選擇社會工作學作為我的研究領域。Atkinson（1973）曾從社會工作轉到香港大學上校時，我到香港約的幾個月，到日本東京的東京都老年研究所（Tosyo Metropolitan Council for Geriatrics，簡稱「馬學人」）與所屬的研究員交換研究心得。研究員「松澤英治」表示，

無法溝通（我並無日文基礎），並在他們介紹下，參觀了東京市內各田老人護理措施。日本早在 1970 年代就進入「成熟期」，歲人口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所以在老年學方面的研究並不顯其特色。我在研究所逗留時間短暫，卻得益良多。

八十年代初，我做了幾項與長壽生活有關的調查，其中一些發現令我感到興趣，就是有關誰提供傳統有關長壽的觀念，如認為「孝」十分重要，及子女有奉養年老父母的責任。事實看起來，卻不是講的那回事。被訪長者最喜歡說：「子女是有心的，只是有心無力」。在課堂上，當討論到「孝」應否奉養父母時，我常問同學們兩個問題：「是，他們是否覺得有責任去養父母？」是，到他們自己年老時，他們會否期望子女去養他們。對於第一個問題，同學們多覺得有責任。但到第二個問題，就未有期望的反應。據說，孝養父母的觀念在兩代人有兩種看法，他們認為自己已盡養父母的責任，卻不期望自己的子女對他們有所同等的對待。

90 年，我出軍社會工作，拿到薪水後，除必要使役外，全數交給父母，獲得理解當然。到八十年代，學生對我說，他們會先考慮父母的需要，然後才去交給父母，較好的，如父母有足夠收入應付所需，他們只給他們零錢或數額，作為孝順父母的表示。到回歸前後，學生對我說，他們都「每月給父母零錢」，在重要節日，如父母慶生生日，他們會請父母「額外」吃飯，或送他們禮物，他們已覺不錯的了，父母也認為他們孝順。

孝順行為的轉變了。理解，但令我感到憂慮的，是在調查訪問中，老人一般對老年生活感到十分無聊，尤其最低一階層的長者，他們多認同「等死就是等死」，何等可悲。我查閱坊間的調查結果，無疑間，為什麼老人對生活感到無聊，如果他們在「家」做了「家」的活儿，麼不好奇照顧他們？我當然明白，香港這個樣競爭激烈的社會裏，為人子女的，自有他們的困難，但他們可令父母「點嗎」，傳統的孝道去了哪裏？孝的觀念是否需要另「番解釋」。

年老是否「等死」？

首先，老人不快樂，多，這與社會關係，為什麼市民到了老年，就要面對無奈的威脅。香港人——戰前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五十年代初，增加了「白蘭人」，其中約幾十萬隨先在香港居住，香港淪陷時逃往內地，戰爭結束返回香港。其他——多萬，用今天的說話，全是新移民，大多隨男婦女來的，我的父母屬這一類——對不少是「外」婦，因為可在香港能否找到「伴」，所以沒有與家人「起來港」，好分開兩地，怎會想到這樣分開係咁相見無期。

戰後來港的「白蘭移民」——十五、四十歲的表十人，絕大多數到「八十年代」離開戰爭結束已有「四十年」——做來港的，現在「六十歲」年紀，已「生活怎麼過」出來的，戰爭受難和所成的「生活當然不快樂」，那些孤家寡人，「日子艱難不多」或要能縫接舊內地家人和親友的，如「退下來」自己身無長物，「家徒四壁」，「生活怎麼過」，所以，公援個案中，「八十年代」是長者家庭，也多在逃難

視年終「咁一個以埋」的就是申請公屋。

造成老牛貧窮的原因，還有「點」可忽視的，那就是價值觀的轉變。戰後來港的大陸移民，持的是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生兒育女，愈多愈好，咁人好」，「個子女，分咗幾」，「唔係多數，唔好」，沒有有效的節育方法，「生多生少差差」已能夠控制，就算自知沒有能力養育孩子，也惟說「大」大養，或把孩子送給別人，在父母眼裏，多生一個孩子，有時就只是吃飯時多壓一雙筷，「唔係乜，到十歲八歲，唔」出來工作賺錢養家。

戰後來港的移民，到他們年老時，才開始想起退休後的生活，傳統觀念是父母養子女，到他們年老時，子女便應全責他們，所以多生兒女，是保障晚年生活的最好辦法。到了八十年代，這種觀念仍存在嗎？

我在七十年代做的調查，發覺市民仍相信「孝」是很重要的，「盡自己的能力去擇父母所好」，不過，經過深入分析後，發覺年輕人對「孝」的看法，已出現了錯位的變化。第一，傳統上是「以孝為先」，但年輕人並不認為「孝」有凌駕性的地位，換言之，年輕人如果有了自己的話，的話，他們會把這些事放在奉養父母責任之後。當時，年輕人掛在嘴邊的是「四行八德」，盡倫於婚，「上」裡有自己的房子和車子，要達到「四行」的目的，年輕人賺的錢已不夠用，沒有餘錢「孝敬」父母，投問他們，「正錢在自己身上，唔理會父母需要」，心裏是占有人欲，我驚訝的是，年輕人的反應

是「他們心裏『覺得不好』，『覺得自己犧牲』，又覺得『願意』」，總言之「心情十分矛盾」。

另一發現是「年輕人一般不願意與父母同住」。我訪問的年輕人不單年齡的「廣」，是職階也「廣」，就是令人講的「60後」。他們沒有在大陸生活的經驗，接受的是香港有別於內地的文化和觀念。包括「個人享有」的「家庭不再」的夢的遺址，為「追求個人自由和活動空間」，或投入後成家。若「除非沒有經濟能力」，否則他們會選擇建立自己的家庭（「願與父母同住」）。這種觀念的轉變，兩時覺得很多老人生活實用（因為子女離巢，開支增加，給予父母的金錢也相應減少，由子女照顧後，沒有子女的「分」之得家計開支，令自己負責，「口鹹面澀」，生活艱苦可想而知）。

近來政府常提所警的「老人山」，是香港未來發展面對的最大挑戰。其實「老人山」早在八十年代開始。從做老後項目關於老人的調查後，除關注退休保障計劃外，更提醒政府「家庭照顧長者」的功能「過地減低」。政府必須增加照顧長者社區設施，並應响自長者，「定個子女同住，他們是不願入住安老院，無論何時」。八十年代開始，置業是老人的節節給人，照顧長者的「活」成為政府福利利用支中最大的項目。老年貧窮的問題，一直延續到現在。¹⁰ 1994年9月，香港的扶貧委員會以「老人息」，截的「五成制」為「貧窮線」，估計貧窮老人的數目，其中「十五萬」的老人有「十四萬」的是老年人「的」，可見老年貧窮十分嚴重。

新移民來港攞福利？

易顯在八十年代的筆下，述今天所謂的「新移民」，實在是降居順境的社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種「大戰後」是這樣，那些稱為「移民」的，回答不是數百年前從中國遠颺落腳香港的「新移民」，所以移居香港從來非罕有。在八十年代前，沒有人用「新移民」一詞，用的是「大陸難民」。

七十年代初取消「抵壘政策」，在此以前，除少數獲在探親或公務而最終在香港定居的移民外，其他都是華、越兩輪渡來港的。一是偷渡來的，怎會稱他們為移民，什麼是抵壘政策。長話短說「太明白」，只知早上經過金鐘地鐵站時，見金鐘站停車場；盡的各地「雀兒」，幾十人排隊等候。他們都是成功進入市區「抵壘」的偷渡者。所人民入境辦事處閣內部分，他們隨即入內登記，可獲准在香港居留，繼續在香港生活。年「四」前成為香港永久居民。輪候的人群，有時幾十人，有時一百人，千禧年的數目更有數萬人。尤其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大陸南渡來港的人愈來愈多。這樣，「香港真不「陸」」。政府於是取消抵壘政策，重啟港以渡海入境，「上」人從內地來港定居。從此以後，社會用上「新移民」，*new immigrants* 一詞。面對非永久入境者，*limited immigrants*，政府採取的是「即歸即解」的政策，就算成功辦證入境兩、三批入境者，不可在香港居留，即時被遣返。

我與新移民的接觸始於一九八二年，當時我擔任為人民入境署

幾區的審裁員。直到1974年，審裁處做的是「假政府」工作，即解「非法入境者」，他們有上訴的權利。香港實業已在香港出生或曾在香港連續居住滿七年，他們便可擁有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審裁處的工作是聽取他們的「訴」，審閱他們提交的文件（包括事實文件、判斷、決定、訴人是否有原居的證明、審閱文件和其他證據等）。審裁員是以事實為根據，涉及涉及法律條文的解釋。所以，審裁員不需要是法律人，但接受「訴人指控」，可「議權」。審裁處改組，退休法官擔任審裁員。

我出任審裁處工作的時間，是我出外公職中最多的一年。香港審裁處每天審理七、八萬內地來港定居，但那時內地與香港的生活水平相差以十倍計。一個普通工人在香港每月賺一萬千元，內地工人是二千五百元。所以內地居民覺得香港遍地黃金，日就月倍，隨來香港，做「闊」，「年年發財」，「萬萬」，這回家鄉幾年不發財，結果，不少自氣自力的內地居民都想來港「試」，每天被排的非「入境者」以十倍計。審裁處中先設於多和監獄，後則審裁處隨審判，都要經過難船非法入境者的收押所，他們排成幾排，蹲在地上接受入境處人員的審問，其中不乏年輕力壯的男子，但也有年齡「十幾帶孩」的婦女。我不禁心裏想：男的想在香港做「黑工」，女的帶着孩子來香港做什麼？

我在1980年出版的《見證香港五十年》書中，有這樣的記述：

除老人外，香港的某人不少是新移民。八十年代中，以

境。香港前途問題引起憂慮，移民外國的人數激增。但正像有人給留聲機裏，有人給廣播報導，前門有人走，後門有更多人湧着進來。六十年代末的幾年，即在接受政策取向前，約有五十萬內地居民，合法或非法的來了香港，他們只要在香港住滿七年，即可成為永久居民。這五十萬新移民，男性占多數，年齡多在二十至四十歲之間。他們在香港安不下來，在內地有多室的，想盡千方百計申請他們來港，沒有妻子的，盡力找尋對象。不過，新移民想在香港找尋適婚對象並不容易，問題並不在香港女子眼高，只是她們在香港土生土長，一般有中學程度，在家中嬌生慣養，怎會對大陸的男士看得上眼。加來港的男士是明白這個道理，鮮有以農村來的，讀不了幾年書，收入有限，住的是板房寮屋，吃的是鹹魚鹽焗，怎可高攀香港女子，也怕別人嘲笑。

新移民在香港無法娶妻，但他們每月數千元的收入，在內地抵一個合職俸的女子，絕非戲言。於是，八十年代中，這道所以地結婚的暗潮不絕。況且，中國開放以後，就是每星期去趟港，已不再是問題，何況，過去十年，香港居民前往申請「舊債證」的，數量二十萬之多，有證人取「舊債證」，還可在大陸結婚，沒有確實數字，但應在十萬以上。政府曾估計，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而擁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女子，約有廿一萬人。在中華簽署《聯合聲明》前，香港居民在內地所生子女，皆不算作香港居民。《聯合聲明》把這個情況改變了，只重父母一方是香港永久性居民，他們在內

也搬生子女。到了九七年前勸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到了九七年，持有身份人及公務員遷居。勸居來和可。但以前有定。香港與內地之間人口轉移更頻密。

看看以下，個典型新移民故事。八零年，即在「經濟恐慌」前，一位青年從港中，香港，剛，出。他來，惠瑞，農家家庭。畢業生先在附近鄉鎮打工。鄉鎮不，入偷渡來港。他也跟著一起偷渡。去了香港，鄉里教習。得了一份「順車」工作。擔的怕。成欠薪地盤。每月有幾千元收入。在經濟恐慌。他在惠瑞有不，親人。八五年，他四鄉下結婚。娶了位他。五歲，結婚後，他安排妻子偷渡來港。但一個月後，因為有身份證被遣返大陸。一年後，妻子偷渡回港，被遣返來港。妻子和兒子都要去居留。幸好八七年政府宣佈大赦。人。兒子留下。帶說那時懂。此後，妻子兩次懷孕，都是偷渡來港生孩子。子女留下。母親被遣回。

我訪問這個家庭時，丈夫得到消息，妻子可合去來港。這自是喜。但心中還有些遺憾。因為子女，分別是八歲，五歲和十歲。大兒子在香港住了，年。帶過惠瑞跟隨母親，到，學入學年齡返回香港。其餘兩個，的，出生後即把他們送回鄉下。做父親的不會，可。賺錢，隔兩，星期過內地與家人團聚。現在太太來港定居。一連串糾纏出現了。首先，他仍想寵。一，學習，太太和三個孩子。

一家有五個人，地方住不下。他們有片格中低公屋，但最少要給住五至七年。此外，五個人的主要費也是大問題，月收入不大穩定，七盤工作每月可賺二萬七以上，但月薪一萬元也賺不到。以廿一也每月拿一數千元給太太做家用，在鄉下生活也算不錯。現在他們求，一個林伯的退休金也要二千元，除去自己的開支，維持一家五口的生活十分困難。

過萬元收入的家庭，在香港不算富裕，但早中有一兩千子是，又三幾人住公屋，要舒適地生活並非易事。香港富家，個這般家庭，看來數目不少，這些家庭貧窮嗎？五十年代初期，香港超過一半人口剛從大陸來，十分貧窮，但那時富有人家不多，貧窮是多數。而香港百廢待興，有的是希望，只要努力，不怕沒有好日子過。道理，不會感到自卑。現在情況不同了，香港大部分人士喜安定，物質豐富，新移民是「整底」，感覺上不好受。另一方面，五十年代時每個人都想跑，並非不逃，現在則想，一些人跑在前頭，看一看自己的條件，只會不斷回流，難有真正的機會。這就是現今新移民貧窮家庭的處境。新移民能否改善生活，無關財問題是家中有沒有工作成員，如有成員患病或遭遇意外，全家便會陷入經濟困境。一些新移民家庭缺乏保護系統，只有希望下一代有翻身之日。

以 提到新移民，人的正父即從廣東來港，僑安回鄉修墓，所以夫婦之間的年齡相差有幾年。1997年，我是民政署的委員

做了一項新移民對社會服務的需要調查。發覺回鄉娶妻的「陸文華或來港的一群」也包括了於八、九十年代來港的男士。他們年紀不輕，因為經濟條件不好，所以從來沒有正式結婚。他們趁改革開放後的機會，返回內地尋找對象，組織婚姻團，買賣婚姻，沒有上崗。夫婦之間的年歲可相差二十多年，才掩出現的家庭問題。可想而知。

總括而言，返回內地結婚的既多來自基層，他們的配偶和子女，多是國粵，若無收入不足開支，他們就很容易成為貧窮的群。新移民與貧窮因此扯上關係。

第一部分

回歸後香港的貧窮

香港人能做什麼？



100 第三部分的國內重要選舉產生過程





個人責任還是社會責任？

老年貧窮與退休保障

問題在「貧窮」是市民所知的事實，不用傳媒報道。問題後「貧窮」沒有這麼顯著，傳媒卻還要搶先搶色的報道。為什麼這樣？

當香港仍是由英國管治的時候，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不會太高，最終是英國政府要派來管治的。他救急的形象是英女這「處人」的領袖終於要顯顯，因此只為了做好修補，他最終的負責對象，乃是委派他來港，正經督的英國政府。因此，就算貧窮是每天看見的事實，傳媒才經常報道，因知道政府不會徹底解決。

以「老年貧窮」為例，我從英國訪問回來後，認為香港必須盡早成立退休保障制度，因參考其他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根本保障不能一蹴而就，等閒老弱，口多，那時才應創經多變，老人極易成為貧窮的代名詞。

除進行退休保障的研究外，我亦讓社會人士對問題有認識。我於是聯絡基督教（靈）委員會（Catholic Social Services Centre）^{（一）}，知道（一）是關心工人的退休福利。當時（一）的負責人是我于白，他熱心工運，常為爭取工人的權益存在最前線。與于白傾談後，我們認為首先要做的，是使市民了解退休保障的重要。在中國人傳統觀念裏，根本沒有退休這回事。「返老」靠子女工作能力，就得靠子女孝養。養兒防老，就是這個意思。生兒育女除傳宗接代外，正是為了保證年老時有所依靠，不至孤苦伶仃。

怎樣增加市民對退休保障的認識，已經是太難題。單時的傳媒主要因紙張窄，標誌、電台和電視、電台和電視不會給我們足夠已打好的文章刊報載^{（二）}，讀者未易，看看報紙有刊登的機會，電視兩位平日熟悉的記者作專題訪問，這樣的機會並不多，除此以外，（一）是搞「人地熟」，搞長篇專訪對市民，於是我們到各區租借場地，舉辦「退休保障資訊」的專題展覽，並印製爭張，宣傳退休保障的重要。如是地這六，我們還會舉辦講座，介紹退休保障給市民認識。

這些宣傳有没有效用，效果並不顯著。例如向傳媒宣傳有傳媒來報道，但退休保障是新聞，市民多「知半解」，實在他們身邊，不親友退休保障所無益。縱使用英文又有子女似我，對聯是無可避免的結局。即市民除了諮詢外，還可幹什麼，自己多儲蓄嗎？卡卡儲的錢已不多，生活能撐幾分，如何為年老生活儲多些錢，期望政府設，退休保障可以嗎，市民的反應是：如果他們必須

供款。總之，他們沒有這個能力。如果由政府支付全部費用，市民根本不知道政府會過關。好萊（Leah）總之，香港政府是殖民地政府，不是市民「抽水」要錢。己仁平裁減，怎會希望政府為他們的福祉作長遠打算。

回歸前政府對老年貧窮的回應

到九十年代初，市民的概念一般的是「才不才管門」和「入地獄」。雖然那時社會的改變，從升斗市民的角度看，政府倒尚是不好惹的。世界是最低級的公務員，有一般事請求他們，也要受他們的氣。像說政府，就是欠債，但，政府有權力，市民又多次被迫中知識，只說什麼，他們只得就範。

今天的情況當然不一樣。政府官員經常說他們要管市民的氣，例如在議會會議，議員不給無理取鬧，議員之外心氣在野。不過，這樣的轉變，由於議會有「反強疏日」？早在八十年代才加入直選議員，離開回歸八十年時，現在市民認為，回歸前的政府「才開放」，我認為是錯的。從我參與公職的經驗，回歸前的政府，分保斗，也不見得把市民的權益放在第一位。我講了這麼多，想強調的是，回歸前，市民既不對政府有期望，也不認為政府會照顧他們的權益，所以面對強權，怕擾，只好自己想辦法。解決不來，他們會向親友求助，到什麼辦法也沒有時，他們才會想起福利機構和政研部門，或者可以得到幫助渡過難關。

八十年代初，我們除「宣傳退休保障外，還做」兩次調查。計的是「解市民如何應付退休後的」生活。當時對「年輕市民大多不擔心退休生活的高費，覺得參唔太直接」，到時「講解吧」年紀稍長的「盼望能在工作時多儲蓄，或子女長大後有能力奉養他們」。但有部分市民認為政府應成立「退休保障制度」，他們既不願意有「儲蓄計劃定期儲款」。

若我們問政府應否有責任解決老弱窮時，市民的反應是「老弱貧窮是個人的事情，不是生活無着落，只好靠自己，沒有一種政府計劃，不應想太多人」，被訪者還相信子女有奉養父母的責任。所以年老父母無依無靠，第一應由子女照顧，是他們的「責任」，不應把責任推到社會或政府身上。

市民對退休保障沒有太多認識，也不期望政府設立退休保障制度。我們只好改變策略，不再鼓吹「隨收隨支」，由「工作」代替「退休延長年老」，「正式」的退休保障計劃，政府要求政府設立「類似新加坡中央公積金的儲蓄計劃」，「積金計劃對老年人來說亦有利」，「六、七的僱員在」，「助學校的老師在」，「福利機構的」，「有一分儲蓄，其實是由僱員有收入時把部分薪金儲蓄起來，非加上僱主的」，「分」到了年老退休時便可「有一筆錢使用」，「致千禧口許」，「退休時無後遺症」。

公積金並非理想的退休保障計劃，「要不是全部市民都可以得到保障，家庭主婦是顯著例外了」，她們為了照顧家人，「沒有受薪的

工作，我們要保障自己年老時退休生活的權利，我們願意接受公積金這種平實的辦法，不代表我們沒有理想，或者懶惰，只是在當口的政策限制下，政府非退休保障，僱主唔夠熟，市民又認為退休保障是個人的責任，除了發動政府或中央公積金外，實在想不到其他辦法。

從經濟政策設計、退休保障制度，我清楚看到，回歸前，無論政府或市民，看待問題覺得是仿個人的問題，是個人沒有做好本身，所以，要解決老年貧困，就得從個人的層面入手，首先每個人都要努力工作，而收入則要「平均分配」，貧乏之民應互相幫助，社會不應鼓勵人懶惰，政府更不應讓那些老弱病的便宜。

這種以貧窮為個人問題的想法，令我感到回歸前雖是華人常見的事實，卻沒有人提出徹底應付的辦法。有的，是一些好心的措施，好像貧窮根本不應存在。

董建華對老年貧窮的關注

香港特例行政區於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成立，到現在一九九九年已有十年的時間，十年不算短，從社會發展的角度香港不算慢，最近，特區政府正籌備重建公共屋邨和富華，相信從橫島開始，到氹氹完成，十年就差不多了，所以十年還不快。

過去一七年裏，特區政府在扶助窮人方面做了一些什麼，特區政

府的扶貧政策。我在中環灣仔填海計劃我出版的《社會政策的觀念和制度》一書中有詳細分析。在這邊要簡述當記的是我個人的經歷。政策的成效不在這裏討論。

新區政府成立之初，市民對政府有較高期望。對剛選上順廷，政長位的唐楚騷，希望他為市民多做點好事。正有一些市民對新區有懷疑，害怕中環政府凡事插手，很怕會變好區就「拖人泊港，高度自治」了。

我沒有參與香港特區政府的籌備工作。是籌委會成員之一。我曾想，如陳惠敏、黎永春既屬前兩任的經歷，從開學，我得知並需要工作（容易，特別是中國和美國於政治制度衝突時，各有自己的打算，中方更斷言從此沒有政制，有悖中一籌委會做的就是「司徒耀升」，對於臨時立法會的成立，港人未必認同，連帶籌委會，採取敵視的態度）。籌委會在華的人這東亞日語，華社間會，會議完畢，需要開晚會，其餘部分有家事瑣事，所以，從新華社到學界到樓閣閣，晚間在新華社門前擠滿的人群，我沒有興趣接近。但晚間在該處從前門會，指示或再跑着我在寓「廢物山臥車」，我也沒有什麼好回應的。

新區政府成立後，確實有許多措施「如人意」。我以為這特首唐楚騷是有能力的。在他任內，斗多，我有多次機會向他談論如何處理有需要的百種，其中包括生活艱苦的窮人和數以十萬計的貧窮長者。四年前，世政府曾於一九八五年擬定「老本全計劃」但後來

未能完全付諸實施。政府「老年金」政府隨即成立政府強制性公積金，但該積金沒有二十年才會發揮退休保障的效用，但老年貧窮問題在冒起。

盧建華表示，他透過社會福利署委託我進行調查，看看是否有需要增加十多歲寄居長者收取的金額。如果增加，數額多少才足夠？那時，屋身位於南朗街樓下的金蘭路月租一千一百元，加上社會津貼等自己支付一百元，以基本上活的開支來說，除提供養老金外，以支薪，但用多一個錢買自己煮飯吃的東西，或租一次中醫，每個月其他使用減少。

政策有關團體得悉盧建華有意增加長者綜援金後，紛紛致電他們的要求，一般是把基本金額增加至每月一千元，這就是說

增加是一分之三。我接受委託進行調查，心中難免有壓力，如果建議的金額不足一千元，政策有關團體，它不肯收貨，但若建議增加一千元，政府必因財政負擔太重而打槍，結果，仍維持現狀。

事情如何解決？我思了好一段時間，首先想法是第一次金蘭路長者生活式調查，就好像我在十多年前所認識的，此計劃說明寄居長者需要多少金錢保障自己達到「合理」生活水平，但僅做調查會地，沒給政府知道，生活式調查引起較大爭議，結果各說各話，未必有助增加金額的決定。

後來，我想到，為什麼不直接去問領取津貼的長者，他們應該最知道自己的需要，也應該最能理解申請的答覆。於是，我向社署取，領取津貼長者的名單，從中隨機抽樣，門口作為訪問對象。因為調查是社署委託的，被抽中的津貼長者都願意接受訪問，成功率高至多達到百分之百。所以答覆的可信性絕無疑問，代表的是津貼長者的心聲。

調查處包括給提長者的其他需要，如單以給提金額而言，絕大部分津貼者要求的，是把給提基本金額增加，由每月元，單把每級長者金額從每月的千一百元，增加至千五百元或千八百元。帶解地低收政策相關主團體要求的千；為什麼每級長者的要求這麼有節制，我的理解是，給提長者多是誠實的說出自己感受，每月多五百元，生活便會好很多，他們不會像政策有關主團體般，到了關人，並不是財政好時便慫恿，我的感受是，每級長者絕對不是貪得無厭的人，每不多十元，嘆，他們，幾十元滿足。我把調查的結公布給社署，還有其他政策長者代表建議，到香港駐上海貿易經濟貿易辦事處，行政長官當時，他第一份施政報告中宣佈，每級長者的基本金額每月增加一百元。

聽到這個事件後的決定，我感到欣慰，覺得所做的調查者沒有白費，政策和關注團體的反應是，有些是勉強接受，有些還好甚至華善的，領取津貼的長者，般沒有公開表示如給是否足夠，我知道他們是開心的。

政策相關上將應關注在長者每歲金額增幅上(參見卜元、轉由市促局編譯)並與政府建議的老年金「要求政府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並反對目前籌備中的強積金」認為計劃未能涵蓋全部長者，提供的退休保障十分有限，未能令長者感到安心。

對於全民退休保障，以上講了，市民非常知道的「多」，只知道有「全民退休保障」打工，或許多世款，所以有兩大保留：做老闆的覺，即說了「我對全民退休保障」不看好，因為做社會沒有計劃，即所謂「一講出來，社會必ず議不休」甚至變成嚴重的對立。政府「不願冒這個險，強積金既已立法，條例重疊」不是辦法。對我來說，強積金猶如銀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目的所在強迫打工行為退休後的生計儲蓄，這種觀念是人民接受的，畢竟強積金的錢屬於自己，不像全民退休保障「繳」的錢在別人身上。

從個人責任到制度政革

關於強積金，以我現還有要講的，但從增加幹退休者的金額到政策要求設立全民退休保障，強積金制「變前理」市民對政策的意識和想法，漸漸從個人或個別組群的角度，轉到要求制度上的改革，為「廣有這種轉變」。

意識的改變，不是一時一刻的事，假設的因素也必然有多種。首先，現今社會變得愈來愈複雜，命運不再憑着個人的努力可以改

呢！我不過說「個人的奮鬥不重要，但社會的發展很重要」，就逼各、各業各自自的規矩，得「嚴講的「制度化」。個人若然不依隨既定的規矩做事，成功的機會微乎其微。

以「順道」(1944)的創業面世時，我得到認識的親友，有「沒錢有「麼學歷」，但憑自己「的機智和努力」，靠「出入國境」回歸成「我四哥」到這種「奇蹟」的出現。相反，現在年輕人能夠得到的機會「斷途空」，而幾可「有幾位社「系畢業生」，當「社「兩、三、四」發揚自「才太適合」，於是離開社「行業」轉行去做些「生意」，或做人際關係維護員，做「生意的」，經營世界跟過去「一樣，不錢不夠，「關係」才「過客」，很快被別人淘汰，根本無法生存下來，最終給零收場，做保險推銷員的，情況好不了，許多「社「看重的是真誠，但推銷員對「顧客」，最多時只能減價「好、好、好」，自「不欺騙顧客已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各行各業「上制度化後，個人能夠發揮的空間」亦有限。好像我「嫁給後土生的人，使夠完成「學語到「機會已「無「限量」，投身「何行業」，只要肯努力，今天的明洞是拼博，成敗「真的軌跡並非虛話。所以，「我們應許人，很容易以自己的經歷來教訓後人，「第一」總覺得今天的年輕人太不上進。

時代畢竟改變，「作以我任職社「時，有些同事遇到受助者雙「面飯」，的錢都「沒有」，就自己「拿錢大幫他們。今天的社「會這樣做，「並未他們沒有愛，「而是怕受助人有「難題」，解決問題應從制

度入手，條例不改變，窮人的生活無法為繼，社會一直拖下去。

建立專祀長者的綜援金額每月增加一百八十元，雖改善二十多萬名家境長者的生活，但長途來說，長者的退休保障還是要從制度上做底解決。後來，我有機會與政府官員討論退休保障的發展，得到的回覆是：政府「怕社會福利計劃」，所以政府首先做的，是築起「非親非疏的」一條支柱，就是社會保障、強積金、個人儲蓄和親友的支持，來解決不同晚年生活的需要，暫時不考慮推行全面退休保障。

市民對老弱貧窮的問題，觀念上明顯有了「一百八十元的轉變」，以前有問題是以個人為主發難，貧窮是自己造成的，不應委過於他人，更不應由社會負責，否則只會拖累愈重，貧窮問題沒完沒了。現在的看法是：老弱貧窮是社會發展後遺症，是經濟發展的成果能帶「超過人的平均壽命長」，人老了就得退休，這是現代社會的風尚，有老弱可以幫幫不盡，但也係好，十年的「惡長歲月」，醫食住，是必須的開支，傳統觀念是「養兒防老」，又願意負起照顧的責任當今老人輩沒了，但沒有了女的「我」女自願「晚」一晚，「講就大書因係」自己平日有儲蓄，極易解決，又容易，沒有適當的「晚景難免凄凉」。

變身乙：老年貧窮不再被視為個人的問題，必須有集體措施去解決，政府「怕怕」考驗、敘述，「上」代的貧窮風聲時，我得到那時社會團體對窮人的數量，派發的金錢和物資比政府更多。

慈善團體的資源如何尋到與否。我識過多個志願機構，今稱非政府機構，的委員或董事，其中一些與外國慈善組織有聯繫，曾得到外國慈善組織的捐款。志願機構多應拍一些窮人生活生活的照片然後寄往外國組織，證明香港有很多窮人需要救濟。我看過這些照片，雖不是做假，但其實沒有「表性」，例如窮人受露宿街頭，熟悉香港情況的市民都知悉，窮人的申請入住公屋。

還有，慈善團體亦透過電子傳媒募款經費，有時請來香港作人話為節目獻唱，合唱乞「地」情，呼籲市民多捐款。今天，不用這種手段吧？我們都知道窮人申請公屋，有既定制度去幫助他們，捐款給慈善機構，是白己多金，去幫助有需要的人伸援手。

窮人數目有多少？

解決老年貧窮問題的方法要制度化後，現在要轉入另一議題，香港有多少個窮人？及兩地政府怎樣計算窮人的數目？1994年初，兩地貧委會發表了一份由政府統計處擬定的報告，指出在1994年第四季，以平均每週淨收入的水平來計算，香港共有12萬市民生活在最低收入水平之下，其中六十歲以上的有26,000人，六十歲以下的兒童有29,000人，合起來超過五萬人。

香港貧窮人口超過一百萬人，是為政府第一次公開承認的窮人數目。數字公佈後，非政府界社會公益人士疾呼：「實在市民心裏，貧窮根本不是陌生的事，親戚中有窮人，朋友中有窮人，鄰舍

4. 有舉人可能連自己姓與國名連有起疊，百萬人民生活困苦，有什麼值得慶幸？數字上公佈，政府做好苗植，要誰比荷施扶助窮人？於是，當蔣權之的午時辰，八宮選件首成，對於扶貧委員會提出的扶貧補健，總不能置諸不理，有說這些措施「溫溫碎」，起了改變窮人命運的作用。作為委員會的成員，我當時的反應是：「此世雖老而再老，舉人有一林森木，頭好媽！樹也沒有。」

扶貧委員會於一九九一年底解散，但工民認為扶貧工作未完結，僅促政府成立貧窮關注政策委員會，該委員會的報告建議條件，認為租金已固定，不同年齡組別的扶貧指標，政府應採這三指標釐定政策，同樣地可以選出扶貧人口，政府應明白論其說，但指標有十項，政府有沒有做事，誰也說不清楚，況，政府可一把設計數字，捉回幾萬，只要指年有兩個及個扶貧措施，政府便有交代。

魯德爾在 1967 年再成建坪特內。近兩年甚至到 1972 年，在他第
二次九年內，魯德爾為窮人做「些什麼」？他的觀察是：他沒有能
建華夢耶。窮人的處境，以上述了「普通華永，好的，已經存在
改善者福利。其中取最優的「要」子每月多給他們一、
元。最近軍對其他義務所詳。回歸後的新華六國，已想多做「舉
舉。奈何，到 1970 開起，政府還增「年片現在子」。於是，那兩
中「可」等「月高產數百億元。但盧達華對有富要的市民還是關心。
的「缺點我可以做見證。

有幾年，董建華在預備「施政報告」前，會找一些學者替他做研究。2004年，董建華正準備剛年的「施政報告」，這是董建華出任首屆最後的一份「施政報告」。其中有一建議為殘疾人士每月多給一百元的補助金。董建華一向愛殘疾人士，事實上此就要「財務科的官員卻激烈反對」理由是政府沒有龐大赤字，任何新增加的開支性開支有違財政紀律的原則。在會議上，我對於財務科官員的反對十分失望，覺得政府雖有「4」的市民的困苦不能視若無睹，或許我是婦人之仁。

正當應否給予殘疾人士額外補助金時，董建華收到現已去世的「威利·鄧顯斌」來信，要求特首批准他安樂死。威利在「政界外中受傷，全身癱瘓，在醫院臥床十多年，及前幾站醒，但每次醒必需他人照顧，感到生不如死沒有意義。威利是四萬多個需要協助的完全殘障人士中的一個（會議上，我認為政府不能去接納威利這類殘疾人士每月「2萬」應是削減了要求安樂死的最適當因應。政府不能批准她安樂死，是特首對生命的尊重，但政府願意付出很多「白元的金額去，足夠」李柱銘表示「政府公開、的，董建華聽了意見，即時命令財務科官員照會執行。我感覺他並非為了「做善事，而是深覺的覺得，政府必須對市民有承擔，才能抗禦，去承擔責任。

董建華的功過，不是我要評論的，也與曾蔭權比較，兩者在其從「作」上的表現明顯有分別，可以對政者的態度「當決定」政策的方向，曾蔭權「任特首的七年內，針對貧者的承擔已可到舉國愛基

◎ 早 其他不是修修補補，就是在市民層面，「明作暗加」變異有交代。

關愛基金的是是非非

關愛基金的成立目的，至今仍是一個謎。關愛基金的概念在 2001 年提出時，先由政府撥五十億元，再向商界募得五十億元，合共一百億元。有這個錢，政府可多聘私人做事，我當時的反應是：關愛基金又有何用？如果政府真的協助有需要的人，何不透過現有機構去做，私人又方便些？何止是，什麼關愛基金，未盡即之終，民吏又何處需要得到幫助？

關愛基金提出後，坊間有極多傳言，有說政府在全體商賈後多次「保胎」，如電費補貼、代繳水租租金等，但還有些市民等不及受惠，立法議員稱之為「八加八」。關愛基金就是要幫助這群「邊緣市民」。有說關愛基金的成立是給富商贖罪，免得市議員罵富商不恤的「吸血」。不論為窮人做好事，更有說政府建立「關愛基金」是為當時行政機關長期的標準年做勢，乃為成事，「任特首鋪路」。

我當時反對政府成立關愛基金，知道是白惹麻煩，商界不會高興，覺得捐錢都撥入私囊，政府更不查話，以為是德政，誤用《都市》的譚廣。隨後，我收到唐英生來電，想知道我對關愛基金的理正。我解釋：「已非非」對政府為窮人做事，富商願意捐點

也家之不保。所以我認為關愛基金要發揮作用，首先捐錢的人不能對基金的用途諸多質疑。否則關愛基金容易淪為有錢人的政治工具。另外，我認為關愛基金應有別於社會保障，對象應是那些經濟上和社會上無法在現有社會保障體系中受惠的市民，包括「最極端」的無收入人士。出半年問我，如蒙他公開的承诺，按照我提出的問題做事，我允許都加入關愛基金籌委會。既然盧英年願意公開承諾，我答應參加關愛基金的工作。

我參加關愛基金共有兩年的時間，我是戰戰兢兢的。如所料，自從政府開始捐錢的人不可動關愛基金，指指點點。有些人認為既不能命定捐款的主意，不如就罷。政府原先希望籌得數十億元，最終不到一十億元，但有了政府的十億元，關愛基金很快便投入工作。傳聞知道我參加關愛基金籌委會，很想知道我為什麼會充公對，後來得答覆知人，是已計劃公開，或被出於了政策，又知他出來繼續工作。我當然沒有這個意思，只要政府聯想應該協助有需要的市民，我就樂於幫忙，個人榮辱不算什麼。

我願意加入關愛基金，背後另有一個重要原因，是我覺得社會保障「迫不上時代」。很多有需要的市民未能符合資格受惠。有些政策如自僱黨，在批評好還要助官中有數以萬計的工人，他們有無能力為什麼不工作，美國設有「自力更生」計劃，協助缺乏能力的受助者返回工作崗位，這是有成效的另回事。只要客觀分析，便知港人，會向輿論說「港人」問題，失業率上升至差不多40%，這種失業數字，是超過八萬宗，失業率中，「經濟」等類之

整個案隨即減少。近兩、三年只有「萬多宗」。

即使是有幾萬個成年人領取符號，他們並非全懶惰嗎？這些萬個成年人每接受助者，四萬多個來自單親家庭，他、她們，「照顧年約子女留在家中外出工作」，是他、她們偷懶嗎？另有「萬多個來自低收入家庭，他們賺到的錢不足養家，聯接要養活他們的子女同樣「掛名」嗎，我不會鼓勵人懶惰，也知道有少數符號受助者中低收入和資產時亦「誠實」但為因應「為了少數市民向欺騙行動而於十成年人申請符號，關愛基金產出後，申請者必須申報收入和資產，有記者問我：「會有市民虛報資料，我因為說「我不會因作「民的不做而使大部分「古恩羅的司「列幫助，我研究社會保障四十年，看到很多市民因嚴厲的審查而不願申請，欺騙符號的物是極少數。

談話又往後，「我講的是「回歸以後，每個制度是否有實質改善，當然有隨時間或地點調整，但時政的目的沒有改變，「社會福利保障市民的基本生活，這個目的應否改變，看來「民以食土識，我從英國回來，每接受助者出現「很大轉變，窮人不窮，「是性病的、傷殘的、犯罪的、吸毒或酗酒的，現在的窮人，有新來港的移民，單親家庭的家長，又他們的子女，「有工作，多個，「時時不報收入竟要計了「十分，「有在在偏遠地區無法找到就業機會乃低技術工人，又或是「兩歲或仍在求學的年輕人，換言之，「貧困「現在各階家庭和年齡階級之中，我總發現，「貧窮也趨向地區性，「某些地區總排在最窮地區的榜幾名。

天水圍和貧窮地區化

談到貧窮地區化，我要分享一個深刻的體驗，也可說明貧窮在社會已經成陣、成羣的現象。2004年，41歲的天水圍醫生倫常慘劇，一名母親和兩名年幼子女驚身傷身死亡，父親重傷入院，數天之後還離開人世。家庭暴力導致人命傷亡，過去時常發生。但天水圍最近倫常慘劇，令家庭「炸裂」，失去的母親生前曾多番向社工投訴，社會福利署和法律援助處曾幫助這個家庭，為什麼慘劇仍無法避免？

慘劇被生後，社會成立一個小組，目的並非追究性者的死「原因」，這方面有死因庭負責，而是怎樣改善區內福利服務，避免同類事件。我發生，我是工作小組成員之一。工作，給半年後完成報告。有「改善區內服務的建議」。我想在這裏記述的，並不是報告的建議，而是在調查中的一些親身經歷，以及我對貧窮地區化的理解。

在天水圍倫常慘劇發生前，我從未有過過天水圍，只知道鄰近元朗和新市鎮「沙田」，期間，我在社、罪案掛知，四樓價持續偏低，位處天水圍的私人屋苑「綠楊邨」，租金低廉則地盤受凶害也可負擔。當時區政府還稱為「綠楊山莊」，領取時沒的家庭可在其中享受會所設施。我讀「半信半疑」，「沙田」那幾年，意外、爭執都會發生，不能以常理來看待。

可能成立以後，社會治安讓我們到天水圍「解扎區」的情況，居民對「共租屋和膠筋的籠屋」也會參加這些活動，各相關部門也會提供資料，讓我們對天水圍有初步的認識。不過，我想覺得上述要講的新聞，有點無用的意味，未必能對勞工的生活有手的感受。我們想像居民日常使用的空間，比「而不是社會批評的政府車去做訪問」。

我聯絡了幾位在七門和九門正職的社工畢業生，相約到天水圍走一趟，參與天水圍居民交流。伴我們到天水圍的社工，有伍仕在壹壹壹，身乎中門和天水圍之間。我抵達先在西鐵壹壹壹集合，然後從外走到天水圍。這座屋邨為數整個天水圍。我在港康苑的社工留宿不可，並非確苑與天水圍很近，站之隔，還有鐵路巴士，但社工還涉走了，還是會睡「的士地」，有次作伴中場的，更多是堆滿雜物和廢物的荒地，垃圾成山什麼好看的，還把路的地方也找不到。我心想，為何居民住在這樣的社區，周圍環境這麼惡劣，政府是怎麼搞的？

我們在天水圍站集合後，轉乘輕鐵走到天水圍北，有幾個公共屋邨仍在興建，幾幢剛建成了樓宇有兩三層樓高。經過事先聯絡，我採訪了幾戶人家。我最想知道的是，他們為什麼搬入這個偏僻的屋邨？答案亦令我感到意外，居民都是港城市民，其中，前在市中心住我隔鄰，擁擠得透不過氣來，房舍告知他們「上樓」。天水圍北只接受，有「兩戶是福利轉介個案，或正在領取綜援，其中包括新移民及單親家庭，簡單一句，他們都負擔不起私人樓宇的

租金。這是1960年時，中一租屋的租金，一點也不高昂，但一人的薪金更低，估計每月只低於五元。2004年底有五十萬人，這些家庭不窮什麼，還有哪裏可以安身？

天水圍這種偏僻的公共屋邨，解決基層的住房需要，最後還是把眾多居民擠在一起。老郭移民後，我提議在附近較安靜的咖啡店，如牛園咖啡屋（見附註），或Carac Coffee，來多聽他們對天水圍的印象。計工員解說，天水圍沒有這麼幽暗的咖啡店，連發圍了十多年的牛園，都已經沒有。後來我們到「嘉利咖啡的快餐店」午膳四點多鐘，正是下午茶時段，不少小孩子放學後聚集在吃下午茶，小孩和大人都在說話，環境頗嘈雜。基爾！我的生活真是這樣。

沒有高檔咖啡店，天水圍的居民不會有損失，但可知他們的消費力十分有限。在水水圍認真地走一圈，我感覺到這裏，是「圍」，差不多完全沒有當地居民就業的機會。屋邨內雖還有的，較大的商場，有嘉利超市，但寫字樓及銀行不見。連「其他公共服務如學校」診所、長者及育幼院服務中心，他們聘用的員工，不知有多少是住在水水圍？

離開天水圍，我搭香港中環至巴士返回他處，繞行巴士十站，我與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男，同坐一車，他表現有點不快，因上車還有十多分鐘，我說第一站多經鐵路球場四多，想知道巴士怎樣走，他說巴士在水水圍接乘客，才上為便公路，經過西隧在港島。

國過他境。我問他到港點是上嘅嘢回家。他說多年才睇入天水圍，睇見我冇搵打，「什麼工作做過，但經濟不好，收入不穩定，人在天水圍就」，亦介紹他到港島的兩家大廈做夜間管理員。現在是整占士街，「明天早上最早就要八點多鐘才回家。我們除了口有」，「聽」，「聽」還在水圍陸續搬客。我問他有睡意，「不再問了」。

我對天水圍的認識並不深。當時只靠不同我們部門提供的數據，得知二樓大的訪問，總算對大水圍多了解。me, P 呢。工作才提交報告，建議有幾十項，多是借託公共設施改善市民生活，但我明，建議的效用十分有限。劉啟福為「麥斯威」的天水圍居民，不會有很大作用。到1998年，「日」，天水圍再次發生偷食炸彈，有母親把兩名子女了食炸彈噏，「已」這鄉下口語，「擇人而」，「割開喪生」炸彈秒鐘後，社會再次起那「幫襯政府投訴家庭暴力的個案」。我在報章專欄也發表「文藝」這社論，「天圍與水」，「關社區」。

上唔見天水圍發生的偷食炸彈，我除了第一個反應是「為十黎又是天水圍」，想欣賞這上網語言都會察覺，「成對天水圍是內射亦感情好」，並不因我住在元朗區，也不因我在工作上與天水圍有什麼關係。1999年4月天水圍發生，偷食炸彈，母親和兩名年幼子女當場死亡，人即宣佈入院幾天後去世後，以番成立特別調查，咀看看發生，「十黎問題和有什麼調查辦法，當時我是小組成員之一」。

那次調查工作，我是十分著意的。在這個我曾說過：「我們好好了解天水圍這個社區和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在不久到天水圍實地觀察，直到我相信自己已掌握了居民的憂慮和期望。」我堅敢說，在筆端調查報告時，建議都不是馬望鹽逢地突出了事，是準確的針對天水圍居民的需要。要糾正的弊病也是實實在在存在的。

所以，今天天水圍居民醫生哮喘，我心裏有點內疚。為什麼上述提交的報告未能防止慘劇重演。為什麼三年過去，天水圍還是這麼慘情。我當然不會認為一個調查，唯的報告可以在紙地內。三年內改變天水圍的面貌，也不會因為報告時，三十項建議可以保障居住在「天水圍」三十萬居民的命運。但我們的社會是否就這慘劇悲劇繼續發生。我們的官員在禍心之時是否只能說慘劇無法避免？

問題出現在哪裏。如果細心分析是次天水圍慘劇發生的事件，不難發現有三個問題是必須提出來討論的。這三個問題包括天水圍塑膠噴霧和公共設施出現的漏網和暗病。香港橋樑和家庭制度產生的危機和困惑。民生福利措施的推行和社區重建。

先看規劃和公共配套出現的暗病。天水圍規劃上最大的漏網是沒有吸納老門的數目。老門作為新市鎮發展「三十年」到現在還是與各項指標上最遲青。名社區之一。老門的

問題是地價飆漲，人口以公屋居民占多數，計算機會偏低，地區政府不願意即是肯費力軍餉。……澳門是政府發展的第一次新市場，規劃上犯了這麼多錯誤還可勝說知難不足，但天水圍在澳門之後，興建時間相差十多年，就是初期還不知道問題所在，但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澳門西貢的惡局，一掃而空，政府為什麼仍讓天水圍走向同一死胡同？

就是規劃錯，天水圍不是一天建成的，現在接近三十萬居民是以九十年代初陸續搬入的，負責區內公共設施的政府部門對居民的需要有否作出調整，規劃只是一種預測，是死的，官員應按實情行事，是活的，這也是最令我擔心的地方。為什麼單凭數以萬計公屋居民搬入天水圍，基本公共設施什麼都不加，為什麼到了1998年，天水圍有二十萬居民，區內卻沒有一間綜合家庭服務中心，不算不算行政失當，我在區公所向中區專員投訴，盼望為天水圍居民取回公道！

過去天水圍規劃劃分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的婚姻和家庭制度被實到了極度邊緣，亟需正視，政府最近在媒體多，開始和謝家威的虛實談判，但什麼「我們都是家人」，豈不橫着暴是，香港的婚姻和家庭制度所以出現問題是我們的觀念改變了，不再重視婚姻和家庭，不再認為結婚和初婚家庭是人生必走的路，我們的婚姻和家庭也因香港回歸出現前所未有的變化，兩地婚姻制度，家庭的完整受到衝擊，我們的婚姻和家庭也降低了期望，婚姻和家庭不再是神聖的制

度。離融合會是今天普遍接受的現象。

在這座轉變之中，社會如何看待福利和家庭？其中「我們是一家人」的解套問題嗎？社會可否傳遞正確訊息？政府的責任在哪裏？個人如何因應時代的變遷？以上都是大問題。策略發展委員會所成立有關華國發展的工作小組，期望在這些方面能找到出路。

至於民生福利建設和社區重建，政府小組在這方面會加把勁。自天水圍特劃發展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達明亦曾在區內巡迴訪問。民政司衛奕信亦提出要擴充社會企業協助區內的貧民。不過，發展天水圍成為有生氣和開懷的社區，單靠兩姓局民過的是榮耀單，社區網也不是兩姓圖計劃可建立起來。鄰里關係也要時時修善，天水圍的基本問題是：區內居民本身的條件有限和區內社會機會不足。這兩大問題沒有改善，天水圍不會是「香港城市」，因為「鐵籠城市」。天水圍居民對政府活動，一句話是：「最多人有改善，我便要搬走！」

天水圍是什麼？是個外在環境還算不錯，內裏卻因政府行政更張而集多種問題於一處的新市鎮。

深水埗、屯門、觀塘、葵青的貧窮

天水圍第一次發「偏富慘劇」後，我認識香港的貧窮不再是個別市民遇到的困難，而是已成結構性了。以上敘述老年貧窮時，我忽略問題變為制度性，當然是長者生活失缺保障，而不僅放膽子女棄養+乞食+母，或個人在收入時儲蓄多些便可解決。要確保市民年老生活無憂，唯一解決辦法是從制度的改革入手，沒有完善的退休保障制度，老年貧窮無法解決。

貧窮變成結構性的社會問題，這是我參與社會委員會時，一項觀察。該委員會按地區按全港水平，發現香港共有 16 萬，即全港貧困，若按地區劃分佈，排在首 10 個的好幾年都是「深水埗」10個，包括天水圍、葵青、荃灣、離島、+葵青、屯門、觀塘、深水埗多次（第 1 次）。該區貧窮人口最多是，葵青排名也常在前 10 位之內。令我感到驚訝的是，屯門和觀塘發展已有 40 年，同十年，區內公共設施相當齊備，新設購物商場已有所謂，為什麼住在那裏的居民仍這麼貧窮？為了解答我的疑團，我特意到屯門、深水埗、觀塘和葵青四個地區，親身觀察區內居民日常的生活狀況。

按樣本方法在深水埗找到一屋，在每區時「大半天錢」多在昂貴場所，在該區工作的計上，到附近午餐廳一聚，從他們口中，多知道區內的生活。低收入家庭又怎樣應付日常開支？我不會說自己對香港的貧困有深入了解，但知屯門區很大，佔上 10 十

為居民。在外國已是中等規模的城市，而自己的議會和獨立財政部門可劃分為幾個分區，而以小學為主的，而以老人樓宇為主的發展的年期也不相同。我得到當地社上的經驗分享，總算有「一些概括的印象」。於是我在報告專欄中談談自己對這四個發展狀況的看法，作出一些分析。時間在2005年中。

地區除貧。當然不是我一人可發「聖旨」，但我還是提出自己的想法。盼望的，就是可以引起社會人士的回應。特別是這些貧窮地區的情況和問題困膠。而大家都起來討論，就算未能即時找到解決辦法，最少也可以讓區內貧窮情況變化下去。

老幼之間。數據顯示，老門區的失業情況確實有「改善」。我舉確一點來說，住在老門區的兩成失業單親家庭的數目減少了，老門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發展成為新市鎮後，最大問題是交通不便，區內又欠缺就業機會，居民要找工作最遠處的也要到全港，而每天花上兩、三個小時到大龍和赤島上班的也大有人在。

老門為十幾間屋宇發展，理由及香港的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大龍和赤島區，住得近一點的，上班時就省電費，省交通跋涉之苦。但老門鎮當時地理環境可說電耗，其實，電力上，老門並不是這麼窮的。在香港開埠以前，更是珠江三角洲區域的轉運中心。

在人文學這一領域時，曾修讀已故羅香林教授講授的香港社會交通史。羅香林對香港歷史有較通的研究，舉例來說，他還帶領同學到新界各處考察古跡，如土官的附屬前基地、青山的紅蓮禪院等。我說得到了昔日的龍珠島，即今日的青洲島岸一帶，羅教授指出，明明政府曾在這裏造岸，所以稱為老門，碼頭更在龍珠島對開海面擊退當時來犯的新聞船艦。

我重溫這段歷史，絕非懷舊，而是要說出一地的興衰與本身的地理環境是分不開的。香港新港給英國人，是商人以及多利亞皇朝貿易中心，皇家政府相繼興建完成，輪船以陸路為主，珠工口岸的重要性大不如前，老門的轉運作用一落千丈。

我所以形容老門最近有了一點起色，第一號和永和為港相繼完成幫助不少，但是重要的，是在回歸以後，香港兩地的距離拉近了，特別是香港與珠江三角洲中間的交通，確實程度足以使何種載上升。現在香港政府興建之中的建設，除具休閒大橋外，還有香港與北江、香港與江門的直接交通建設，真正有考慮順應規劃，但以常理推算，隨著香港與珠江三角洲的緊密連繫，老門的地理位置應更吃重，甚至成為兩地的交通樞紐。

上屬溝通，地區以香港非受水陸，最有經驗者還是香港

窮地區破爛生機。有，人看，物有，就不怕沒有機會機會多了，抵抗，社會自然上升，貧窮家庭便有翻身的日子。不過，安寧被破壞，貧民政府還要多賠情面，千項，畢竟，數千年積聚下來的貧窮不會說走就走。

同樣是貧窮地區，另外，雖然專門優待之處是有權利之便，為十學界工作的受過心靈方便，這是和偏遠的之間同樣貧窮，要解僱中學員，首先要看一般大城市的發展規律，每個大城市，總有它城市活動的集中點，如紐約的曼哈頓，而香港就是香港兩區，在這些經濟活動最旺盛的地區附近，他們，兩處令人感到破壞，甚至有城市納垢之地的貧民窟。在這些破落地區居住的市民，從事的是低薪職位，薪金微薄，他們不能花費昂貴交通費到較遠而環境較佳的地區居住，只得在城中，附近覓一棲身之所，環境是綠意也看不到了，光鮮的深水埗，土瓜灣，葵青的葵輝，上環，就是在此種情況下，聚集了，那些低收入階層的市民。

與深水埗相似的，還有旺角，油麻地和九龍城，這些地區的共通點是：私人樓宇為主，一是是樓齡較高，陳舊和狹窄的私人樓宇，因這些私樓租金便宜，其中的自然就是較下階層市民，特別是，一些文化性較高的人士，更集中在這些地區的居民，除「租金支付唔好」多對地區沒有經濟感。

這些地區的貧窮特色，並不是跟城區的老化問題，而是

大多以地區為錨腳石的居民。一些成功申請公屋便「上樓去」，一些在別區找到工作便搬走。所以我稱這些地區為單人集散站。

過去，是改善深水埗的舊商棧區，並非細眉細眼的投資工業可達到目的。最重要還是舊有的行政架構穩定，只要有工開，職位不短缺，深水埗的中下階層居民便有謀生的辦法。他們不一定需要政府的幫助，當然，政府提供優惠課程是好的，也不需要政府計畫繁複的扶貧措施。當然，政府對社會企業也有一點幫助。

除交通方便外，深水埗還有一個富的獨特條件，政府區內特別多店舖，有些更設在行或市，如五金店、各式雜貨的零件店。這些店舖的生意額不太高，卻為區內低學歷人士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以前有區內填罪証為改善深水埗的形象，可算減少，各類新舖，引入大型商場，但此投資所噴的，這樣只會造成更難性的政策。區內，市民可能連生存空間也沒有，其實，深水埗雖窮，但比市中心的舊住單位，使時代難得的，店舖，正為新以萬計但欠，零兩散的貧窮家庭，提供了，讓他們還可度日的棲身之所。

老叫和深水埗的投資或服務各有不同，但政策策略卻只此一端，增加就業機會。

順德是戰後最早發展的新市鎮，同期發展的有士嘉和裕的基鎮、泗塘和全亨。順奇區是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設營區而由來獨立成區，是早期設立的新工業區，政府為了工廠有足夠工人，於是區內興建大量公屋，確保當時數以萬計「大工人」工廠不會因工人短缺而拖慢生產。

我記得七十年代初任職巡邏官時，曾志明不，接受感化的青年到工廠工作，當時，有工廠老闆找政府，在旁察探廠是最佳的，不僅是有年輕工人，政府解決了他何任的問題，工廠便可二十四小時生產，一天三班，工人連續工作八小時，不用給他們吃飯的時間，現在看起來，好像不大人道，但在「七十年代」連續工作八小時竟不是平常事。

除順塘和順奇區外，類似的地區還有黃大仙，都是政府早期為了發展工業而建立的市鎮，這幾區的特色是居民大多住在公屋，也基本未擁有私家車和私家屋，有幾分聚公屋單體，這些居民隨地區老化，多數開始搬遷到外地地區或市外舊屋，但大部分仍留在區內，只在屋裡重建糾纏在新單位。

總言之，住在這些跟隨時間而衰老的地區的居民，他們的黃金時代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十年裏」，也就是他們年輕力壯的時候。

今天，飽覽老化的社區，工廠搬走了，商業活動仍保留，帶出物的特色。只有 ap，是現代化的，但吸引來消費的，並不是獨特的前景。《看盡翻牆舊區和內地的公共屋邨》走，使可見區內的陳舊和破舊，連華住在這裏的居民都有「看盡老火」的感覺。或許這就是市建局在未來十二年要把區拆分為兩部分的原因。

以《改革開放20年》刊例文通過「中國」專欄的審察，促沒有太大改變。其明顯成結或性的問題，所謂結構性，指的是結構成為不可缺的現象。是制度的「部分」再「天水圍訪問」與內，至今仍嚴重缺乏就業機會。我對「點工作的要」以及「龍和港島站票」非會人，現以上在天水圍，搬入天水圍者在1987年，歷歷如「導我區內居民收入普遍偏低，消費能力薄弱，區內經濟不發達，就業機會匱乏」之「橋樑」，現九「限」盡性漸顯，日形成，曾「史比這個時期同，談何容易」，如「天水圍」以發生倫常慘劇後，政府有在「天水圍增加就業機會」辭大之「是些要為市場外役生的「職心」，設於天水圍「交通車單」院的社會企業計劃設「「天水圍」步實舉」，「成點結構性」依舊招驗單車料水車為「這很難辦，想開點過來，對於天水圍的貧窮，我係於扶貧委員會「說」，改善的建議，隨後律律就有成立，已於1990年11月的出版。

天水園現有二十七萬多畝地，因天水園仍在興建，農民目前只能看管，八成以上蓋房屋，形成天水園無所產糧的勢頭上，為農民或政府的作為，都顯得十分妥協和自強自足。

國這些居民搬入天水園已有數年時間。要徹底改變天水園的貧乏境況，需要時間，二十年都足夠了。因此，《天水園的扶貧工作》首先要搞清楚是防止貧困惡化了下去，也就是淨增長不多，十萬天水園居民，生活可以穩定下來。

天水園的扶貧工作最重要還是增加就業機會。但是，「一條」天水園是偏僻的，經濟基礎很薄弱，專門的職業機會有，一點特色。但天水園卻不在這些行業。除天水園本身欠缺經濟活動外，天水園還有更多家庭欠缺居住能力，如單親和移民家庭，以致他們到其他地區搜尋工作的可能性也相對的很低。

天水園居民最急需要的是工作，要解決她們貧窮，就要給她們機會，在水園區內創造就業機會，而且是一種適合天水園居民就業條件的職位。

不過，為一百天水園居民有更多就業機會，應曾在社會委員會會議上，建議區內接受政府資助的非政府機構，如社區診所等，在聘用非技術性工人時，要考慮區內居民的申請。我明白，這樣做，或許有公平等機會精神，但對失業或條件艱難，給予天水園區內居民優先權是合理的，也會合理。另外，我也建議這些機構多設立部分照顧性，讓區內有家庭負擔的婦女，也可享受收入幫助計劃。

另外，我有兩個建議，一是為「自由邦」旅客提供廉價旅舍住宿。現在內地旅客只及晚上有半宿的地方，並不是要享受五星级酒店，所以改築停車場為旅舍應大有作為。而且，內地旅客住在天水圍，可到老圍和元朗市中心，利達士尼和昇平旅館十分方便。二是，黎敦等我知道，這建議，毛達賢曾反對，認為改建停車場未必符合成本收益，改建手續也十分複雜。如果官員認為不可行，最後也應開放給私人市場，看看是是否有利可圖。

第一是在天水圍區內增建公共設施。我指的公共設施，並不單是規劃好的，如社區會堂、公眾巴士、診所等，而是在這些以外，看看是否有一些企業性的公共設施，也可利用天水圍相當的空間來興建。我特別想到為老人和殘廢人士而設的護理院和康復院等。社會對這些院舍的需求很大，輪候入住的數以萬計，所以多建這些院舍並不會浪費資源，此外，就是政府亦應增加護理院和康復院的數目。我想在地域上，重新調整這些院舍的所在地也是必需的。例如來說，政府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葵青和元朗興建了不少安老院，一些建在極貴的地皮，如華康苑附近，因為這些設施是全港性的，入住這些院舍的長者親人，並不一定住在葵青和元朗。事實上，隨著原人口推移，親人更多住在新市場，因此，如果在水圍興建護理院和康復院，傳統葵青和元朗區的現有設施，應更符合市民的需要和受用。至於現有地產能否為庫房增加收入，這是另一回事。

張金元：現在最迫切的還是在天水圍和附近區內增加社會服務，特別是針對天水圍分層居民教育和技術水平的工作。在以上兩個建議，當然不能……而政府為天水圍居民提供大量職位，但最重要還是先了一條適合天水圍現人的改善路。其實，多項地區調查顯示，天水圍居民的要求都不及他們期望的。這政府實踐諾言，給他們足夠的設施和服務，不要讓他們有事事不如人的感覺。最近政府取消天水圍巴士站，居民怨聲愈加高，只是他們可找到穩定工作，將會是以養活自己和家人，他們已十分滿足。

只要政府多花點心思，多從居民的角度看問題，天水圍不難是「慈情城市」，居民應可生活得快樂和開。

天水圍除了今天，仍不見有人轉遷，「七喜樓」仍聯入水圍道存在。這「深水埗」還是般關照和個人聚集地。一家八口聚一室，既「經濟」的必成功要發達，但鄰里、一年後給人物外，新的感覺，香港仍是由過多的老路，打工對我說，區內聯誼、晚飯和節社會活動愈來愈困難。

關愛基金做的扶貧工作

回顧關愛基金，除「加強無收被他人協助給條件，改善環境，養其心，養性型」過去提過，但很多扶貧的建議，現在政府願意撥款設立基金會，為「變不好好利用，我來剛看到，軍酒樓，門剛的封

聯「早晚來晚港來早晚來 多吃點少吃點多吃點 少吃點 我聯就改為「多付點少付點多付點」，關愛基金成立的「我也絕對聯」改成「大品貨，品貨大，品貨 多幫點少幫點多幫點 我對關愛基金沒有太大期望，但不見市民生活在貧窮邊緣，並非窮到要申請支援，如果得到關愛基金協助，生活才會好很多。」兩個故事，可說明關愛基金的作用。

關愛基金認為貧窮家庭做點事，但自給津貼不足夠，還有什麼可以「做」，委員會有接獲學童的「從地盤撈到」部分學童因家貧無法繳付在校午餐的費用，只好吞說自己正在減肥節食，或不再做供應商的飯盒，或口噴「食物」總言之，「聯學校和同學吐嘈」已家貧。委員會決定先爭取取消課外班的學生代繳午餐費用，把飯錢直接交給學校，「如此他家段為了不繳費，令忠學童就不會感到尷尬和自卑」。

殘疾人士「困難」些必須請親朋幫手動，些需要額外藥物和其他人的照顧，「十分困難」。政府常設殘疾人士可領取殘疾津貼，但殘疾人士多在怨道「認點金額不足夠，我們和殘疾人士見面，聽取他們話，意見，發覺問題不只簡單，些輪椅和需要洗腎的，還對的困難甚多，聯「關愛基金當然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但可「做的起點去支援，我聽着殘疾人士訴說他們的故事，便感人，痛楚，「轉眼即逝的百無一人要面對大大小小的殘障和不幸，些人付出一層，兩途就此死結，些人失落之後，愈拾起，「聯「人生」路沿，關愛基金能為做的，是幫助人，把「覺得他們困難是由做違背良心的事。

貧窮新一代與「M 型」社會

貧富懸殊與社會穩定

現在要轉到貧富懸殊。這在開州部分也有論述的。回歸後貧富懸殊是現在「還是變本加厲，貧富懸殊從來不是新加坡的問題」時已有「貧富立錐之危」的說法。我在八、九年代初所做的區縣研究^①也曾引用^②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名句。可以說自有人類歷史以來，貧富懸殊已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政府制度怎樣遠未公平和平等，社會上總有拾人煙剩餘者。有些人就是不幸，貧如洗，但得到的還不夠溫飽。

探討貧富懸殊的文獻多如牛毛，數也數不清。就我的理解，香港現在貧富懸殊還未到危及社會穩定的地步。有關它學問探討，時代發生的革命事件，例如法國大革命、俄國大革命、青洲的雷、多夫沙^③與貧富懸殊都有關係。當富人不知顧及平民，還說窮餓的人為甚麼沒有去吃，社會就不會出事。動亂隨時爆發。香港的富人如同看待窮人，以上再詳細論述。但香港有錢人還未至如此涼薄。

第三部分是我後場中，即時急件同，次聯席中，為何基誠白會能話政府「視其富強程度化現象」要求政府承擔醫療和貧病令辭。政府品特此反應是「貧富差距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政府創富可是保障市民的基本」。若「政府無差錯」高收入人士有更多的收入，直接一點來說，政府不會「阻人發達」。對於窮人，政府卻不會袖手旁觀，「社會保障和福利服務就是要協助窮人免於匱乏」。

1989年「統計處發表中期人口普查報告」¹⁰，將每月收入低於的堅尼系指數，數字是11.4。議員和關士由職立即拿數字來抨擊政府，「香港的堅尼系指數較強烈中國家如中華共和國，非洲和南亞要差一級」，貧富差距十分嚴重。當時時職財政司司長的曾蔭權稱堅尼系數未能準確反映市民的生活實情，指數只計算市民的收入，政府發出的社會服務和社會保障，尤其是公共房屋（低）廉價，民得益最大，但這些無形的收入都不計算在堅尼系數之內。曾蔭權的說法不無道理，但香港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也是政府無法抵賴的事實。

回歸後，香港經歷長達三年的經濟低迷期，市民最關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飯碗，有錢人是否愈來愈有錢，自己是否愈來愈窮窮。暫且擱在「德不孤，必有鄰」¹¹，多個月的通縮後，政府提出要削減撥款食餉，順士民士為政黨和組織均竭力反對，精神全投放到各類抗爭活動，貧富懸殊是否嚴重的爭論也淹沒下來。

¹⁰1989年12月11日，場發「政府為「挽救經濟」引入「11.4」。

市面情況未有好轉。在市民眼裏，香港的繁榮不再，收入就算沒有持續下降，也要因生活成本的水漲而景一分渺茫。畢竟香港經濟停滯不前，此時收入不升均如貧富懸殊的情況卻不會不知不覺中變本加厲。烏型最這樣一處理，十分簡單。如我一樣有固定收入的人，經濟雖然低潮，但薪金不會大幅一降，反因通脹令自己的收入相對地增加了。低下階層隨着失業率上升，職工薪金不保，人工也多了，入錢，整體收入的比例就愈扯愈大。

盧維華主持首屆「有次」聚學耆友團，我指出，根據最新2003年「香港的人自生活指數」1997年回歸的1年，香港的貧戶窮個家庭月入不到千元，同一時期，家庭收入1萬元以上的，不但沒有減少，且有輕微上升。換言之，在回歸後的人生裏，但收入家庭多了是不多，但一畝畝家庭卻不斷上升，兩者之間的差距愈來愈明顯。

市民對貧富懸殊的感愛

以上足數字上的分析，市民的可感感覺又如何？2003年，我在專欄文章裏這樣解釋市民對貧富懸殊的感受：

市民好像參加馬拉松競賽，有的走得很快，有的是走得慢，但大家都向前邁步，相差之間的距離不會對管理層帶來太大壓力，反正競賽仍在進行，差距是必然的。

明係道理。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前，買股票賺錢是長對香港人的重要構成部分。相對上，有錢人確實愈來愈有錢，窮人也愈來愈窮。不過，隨著經濟增長，窮人的生活仍不斷改善。他們正如社會中的中產階層，與有錢人的收入差距擴大，但生活還不至停滯不前。

亞洲金融風暴出現後，情況愈來愈糟，就好像我賣到了虛假，或突然中斷。從80年代開始，特區政府連年出現赤字，失業率飆升，本地公務員在內的打工仔利豐前所欠有的成數翻。這時買股票變成市民忿怒的導向。最後變成，2013年，11月五千萬市民上街表達對政府施政強烈不滿。

感受或擔憂怕對性，窮人覺得自己比別人窮，也是一種感受。對「富人」社會，有人認為，窮人只要努力就不會貧窮。而香港不是沒有職銜官職，政府根本不應協助窮人，幫助他們其實是其他們。他們也有喘不過氣來。對於窮人的感受，很多人已不關心。甚至說他們低質貧窮，博得人同情。我不要反駁這些批評，看看實情便會清楚。現在香港經濟的一兩千萬人中，有一千萬還在學呢。我舉個例子給他們聽。他們每天與同學相處，可以對自己的貧窮沒有感受嗎？就算是領取綜援的老人家，他們一認識窮，感受會好過嗎？我有每天去會與鄰舍見面，吃什麼，買什麼東西，誰人都會知道。誰有錢，誰貧窮，誰驕奢過人嗎？

所以，不能單倚靠數字來理解貧富懸殊，還要明白市民的感受。

受。我」：提出的「競跑理論」——「要說明，財富變遷，顯是私人市場的走勢，但香港市民對走勢的反應，回歸前，市民對變遷前途非常擔憂，覺得他們有今天的成就，暗掣了這麼多財富，『非』是他們努力的结果，更證明香港是充滿機會的社會。當時流行的一句話是『李嘉誠可以，我自己也可以』，雖然知道有『己』，在欺騙自己。」

回歸後，不到十年的時間，情況正現「一個大逆轉，市民不再以高商為主要對象，他們不是也很有钱人，但對於他們的所作所為，開始看不順眼。前建築工務局時，因為有「官商勾結」的傳言，價值準對此十分不高興。九七年有兄弟，舉辦「就是「官商勾結」，絕無其事，自然絕對不會與誰人有私底交易。另一場合，談到競跑港地地產發展時，價值準解釋，自香港金融風暴爆發後，香港經濟長期低迷，根本沒有個人願意投資，政府盡了最大努力，才得以可資財團接允「所」，絕對沒有「利益輸送」，可說商人有限光，願意冒此風險。

我相信價值準講的是真實話，但市民判斷是非，憑的是自己的感覺。看見價值準賺大錢，要不是政府「明說」有錢人，回歸前，市民仍認為自己有發達的機會。看到別人發財，自己正盡心物物。回歸後，「十四年，經濟發展不景氣，股市如同吃「萬桑苗」向下，價值準從「37年，高，調到四轉，即價不見」，平比往昔是，自資產使眾多中產家庭慘遭洗劫，萬劫不可終日。

經濟停滯使貧富懸殊變醜陋

到了「沙士」的 2003 年，市民心灰了，覺得在飯碗的已疲憊無助地，還有走刀什麼的已算幸運，本是既有的已對得起自己與家人。在陰森恐怖的情境下，誰敢奢想自己會發達，發達的心灰了。但人還是會比較，眼看的有，人人海潮無度，跑豪門晚宴可以有一餐，新的裝潢也熱鬧，「是九點」，「比上製會去」，「要分場這麼人，錯跑下前」，「飯餐還未」，跑得慢的還會「拖左型」或許，免追免費跑，最後自己可以「去」，「現在幾衰呢？」機會不再有了，「避免自給」，自己為什麼這種「酒」，真的沒有努力嗎？別人跑得這麼快，是他們天賦異能嗎？「想下去」，我感覺歸不在自己，「不是有錢人的錯」，這樣，錯的必然是政府，是政府沒分配制度不公不義。

貧富懸殊這事實變成是政府與商人的勾結，不少政府官員對這個結構感到認同，並認為「能力為證」，問責「貧更窮」就沒有這回事，但收入並非不斷擴大，有錢人的財富愈來愈多，這是董建華和同僚官員經年累月的事實，他們只「」，「建設」政府每年增薪百分之「」，「基本法」規定特区政府必須維持低稅率，「」的對富人徵收稅率，所以政府只能保障窮人的「」，富人賺的錢愈多，政府只能使呼奈何。

2002 年，政府就公佈發表「香港的士戶收入」，「主圖徵估」，「現正」驅使社會服務會「補充」，「收入差距擴大」，「這是壞事」。

社會，部分市民的收入較前多了，對於統計處長的言論，我已提出「自己的意見」認為問題不單在數字顯示的差距，還要考慮市民的感受。市民未必知道緊扣指數又表示什麼，也不知道香港的整體收入如何分佈，「他們知道的是，以數千萬計的基層工人，工資每月不到五千元，却要每天工作十多小時。」

這是在香港未實行最低工資之前的情況。那時候，對「兩千」基層工人的感受，我做「幾個訪問」對象首先是現居「樓下」的移民和清道夫。他們每月有多少款項，其次是我會向氣派的茶餐廳老闆和員工「老闆每月給伙計多少？」我得到的數字都是真實的。

點不假，與管理員和茶餐廳的「傾談時」我還會問他們家庭的情況，配偶是否外出工作，有沒有子女讀書？

窮人其實不會憎恨富人，在接受我訪問的工人心中，他們認為有錢人都有他們失敗的道理，亦有他們賺錢的手段，不能視他們不對，但非此於有錢人，他們感到不甘的是，自己為什麼賺得這麼少。有清潔工對我說，她「離家上班，六時過夜才放工，每月二千四千元，她說平的認真，我知道她心裏有氣。」

去動物園訪問時，窮人會說生活「好苦」「好慘」，但一般不會怨天尤人，有錢的是「識不用「枉世界」，即制度再壞了，平他們是知道的，有錢人知要有各種特權，政府又好像騙着他們，窮人是會憤怒的，最終，他們有這種感覺，不多不欠，受傳媒的影響，我問茶餐廳員工，政府怎樣騙着工人，他們想，「會」學的是

當時民爭議的事件，如地產商的「發水槍」，政府漲價出售建成的房屋給地產商「帶賣」，這些都是感覺，沒有什麼具體證據。但，有這印象，很難會改變。我看對政府官員說，提高懸殊是否解決，不能單看數字，最重要是市民的感受。

M型社會和中產「下流化」

除了「過渡期」，另一經濟課題等即不錯，我從公佈的收入數字，卻從從中早有「下流化」的趨勢。「下流化」是台灣翻譯給中等人，的收入不能停滯不前，且有向下流動的危機。那時是日本學者大前研一剛提出「M型」社會的理論，指出日本社會中間收入的一層，一些趨向「收入可上流，但更多收入減，向下流」，形成英文「M」字「凹部」向下陷的情況。我比較1976年和十年前的收入分佈數字，發覺「收入」萬元以上的人，多了，「收入」萬元以下的增加更多，可見中間部分減少了。

「M型」社會的意見很出現，引起不少討論。到1987年中統研處在作山國考，調查結果，是「M型」社會，卻不符合大前研一的原義。我沒有反駁，因數字分析，各人可以有不同的結論。中產人「中」確實有少數向「下」走，他們主要是中金融界，或自己息商寡人，但未專業的大學畢業生，初職教師，行政人員，推銷員等，雖自幼為中產，「出來」工作十年一載，收入與基礎明星無幾，自己已覺得向下流了。

MI 型「社會的爭論持續」一段時間，其中涉及的計算方式及理論相當複雜，還沒有引起市民太大的關注。不過，自命「中產」的市民意識到，他們的中產地位並不穩固。有時只是「虛情假意」的虛榮，相對於居住上層的「低」階層，他們只是「頭頭是道」的「實質」上「中產」。最令他們感到陽痿的是，中學的最重要特徵，即擁有自己的物業，係離他們愈來愈遠。

中產崩解，「說話或評論像」馬。但 1998 年雷曼事件引發的金融海嘯，對「中產」的「雷曼」引發事件造成的傷害，並不限於購買了雷曼證券的投資者，而是「以金融產品作為他們儲蓄工具的」中產人士。結果，凡有投資股票和其他金融衍生產品的中產人士，很難沒有損失。

雷曼事件引發的金融海嘯

1998 年至 2001 年期間，香港的經濟經歷「潮人的波動」金融海嘯，起、股市和樓市結上下林，幅度上下驚人，而美國聯儲局出手救市，開始用「量化寬鬆」政策，股市和樓市才穩定下來。香港人的經濟已知道「潮」急性的，香港「慢慢慢慢地起來」這樣的經濟，以香港的貧窮帶來「新的解釋」，令香港的貧富懸殊變得明顯。

傳統上，福利機構的扶貧對象多是「老、弱、病、殘」的市民，而大部分爭取扶貧，但扶貧金額未必足夠，叫到了「極度」，「不」想讓家庭已「停書報學」，只好向福利機構求助。福利

機構如果有額外資源，還會為求助者提供食物和日用品必需品。糧食援助方面所謂的「食物銀行」，除綜援受助者外，還有一些家庭未必符合資格領取綜援，如新來港的內地移民、收入不穩定的藍領工人等，他們正是「食物銀行」的援助對象。

2008年金融海嘯發生後，有「食物銀行」的社工對我說：近日有長者到「上城」的員工室領取食物，他們表現尷尬，明顯以前並沒有接受過協助的經驗。另有社工對我說：在中環的快餐店，午膳時分，他會看到衣冠楚楚的男士，叫了一餐後，食物如果有剩餘，他即跑到牛車水所屬的把食物吃光，情狀悲涼。

以「半倒」當時傳媒也有報道，但請問是否餐館「食無去字據」所指的是，確實有中產家庭破产，在金融海嘯中失去工作，或投資蒙受極大虧損，儲蓄卡舉債大啃盡，但一時也沒有錢卡，生活無着落，用盡「資源」學歷和專業資格的人士，自顧無能，不願告訴家人，每天為飯菜上碗，其實在街上踟躕，到「粗時」回家，正是這班中產人士，並沒有因之收入，自己不吃，但家人也要吃，只好向「食物銀行」求助，而自己的午餐也只好不要面子的吃別人留下來的食物。

還好，這樣的悲慘日子並未持久，到2009年初，市面大減價，廉價餐，「上城」收入，仍難維持，說：這是否意味「產水再向一流」，香港又叫做「只要肯努力，總會有出頭」的日子，我的觀察是：香港自此經歷「根本性的改變」改變表面，或許看不到，但

又要和回歸前的情況比較。舊城的面貌出現了變化，其留戀味也有新的解釋。

住屋問題製造社會分裂

變遷是什麼？先談1980年代出現的住屋情況。回歸後，我仍會指導的研究生，多是從內地著名大學本科畢業來香港大學就讀的「博+課程」，一般需要四十五萬港元才能「頭兩」年大學與他們提供住宿。最後一兩年，他們要自己找地方。一般在大學附近的西環有零九地城，由樓租住地方，1982年前，同學花兩千元，可覓得一個約一百呎的房間。有時，區內內地同學合租一個單位，攤分起來每月約一千元。

2000年開始，有內地同學對我說，千元已租不到一個房間。出租的單位愈來愈少，業主都把單位分割為兩個半的房間，叫價一萬千元。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香港學租，的寫字，以兩約空間裝滿豪華，多在申請對上的字。是收入不諳的單身僱住的住所。同學住的套房是另一回事。

2002年中，有一「我指導的內地同學租「超樓的食店」在望星地城，尚碼頭附近。我趁機「參觀」。房四呎，一八呎，有窗戶口，但正大堂不足青天，亦足距離十呎，一呎樓高的牆壁，鄰近窗口的自方牆，其牆和洗手盆一對。窗戶下擺一只是把浴桶，一算是有獨立的廁所和淋浴間。餘下的空位，只可坐或一坐單人

床和一張摺椅。牆上有掛衣的地方。

這類的簡屋，後來被媒體之為「劏房」，因為其九呎寬，九呎深，為最單身低收入人士租住的。後來在維多利亞園附近，將大人一起入住的舊式散租物的攤檔，拆掉鄰近樓宇，填起來，填地加上人勢，導致人命傷亡。後來發現，香港的劏樓都隔有「劏房」，居住環境十分擠迫，是大頭道租七、八樓，居民找不到逃生通道，最終也不過付門關或經常失火。

這大大地，關了「劏房」，居民不再是收入微薄的舊移民，更多是單身十呎人，兒女都有，他們可能為「劏」，可能，或不願與父母同住，於是選擇單邊，個人生活，爭取最大為自己的高，除十呎人外，還有「十」低收入家庭，他們可能正在申請入土；即，或城區中有新移民，暫時無法「一樓」人，「劏」的申請者多，但才離收入無法加上，動搖升的私樓租金，租住「劏房」，是他們唯一出路。

受大文影響的國民，其中有大專學歷的年輕社工，他沒有評論空大租十「劏房」的申請，但從他的例子，可知今天大專學歷，兩不是脫離基層生活的保證，但得到我學識的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今天中產的定義，除八呎十呎，社會人士對中產沒有，我的看法，

他有些認為，收入不斷增加，早先住在公屋的，有「足夠儲蓄」就可申請房屋，社會力許可，私樓價格又在自己負擔範圍之內，可分期付款買自持物業，無論種有的是劏房或私樓，……隨着自己的物業，就算仍受非款，感覺上也算是中產了。

復建居屋的爭議

沙士過後，樓價狂跌，到2002年，股市創新高，樓價開始起塵，股打上升的負擔水平，政策無關，團體非從政府恢復居屋，否則市民置業困難重重。那時，我參加聯發事委會成員，新落成兩座公屋建居屋，身居策發會上常的秘書席位置，反應就會積極，當官環境尚未感到「上」水平，不「上」要手仍未組織「自發者」，這時政府復建居屋，樓價再次下跌，誰來負責。

2003年金融海嘯爆發後，政府更不能貿然復建居屋，化險為夷建居屋的呼聲，在坊間，曾應響呼「必旺」樓宇軌，可謂是叮毛無成員，但「優化軌」是遙指，「民不強所」聯發要求復建居屋，並同時增加公屋興建的数量，為什麼市民才這樣呼聲，其原因是私樓太貴，租金可開始，樓價如脫離野馬，樓宇傾和，水的新樓也要萬工，唉，多人盼「結石」，股市是無止高攀。

在一次發委會的會議，我指出政府必須復建居屋的，大理由三個是經濟性的，一個是政治性的，四個是社會性的。我在調居屋不算是真正低收入市民買業的途徑，更是幫助他們才上升流動的階梯。我從2001年開始在大學任教，學了半超過十年來在公學，到他們畢業，收入有改善，但家人一起申請居屋，未能抽中，再提再試，直到成功擁有自己的物業，他們的父母才放心，覺得子女學業有成，連帶他們的生活也得改善。學生工作，幾年，有一群朋友，自己又打算結婚，下一步就是置業安身。這

樣，父母得到去郵局自己還有物業，兩件都不用作往匯銀館，心也才踏實，從匯銀到中環差人是值不得及的夢想。

政治上，我看不到政府不興建屋邨的理由，樓價升到不合理水平，取市民買不起，自然積累怨氣，政府官員的反應也令人氣結，拜官當權者動亦動，不問急於富貴，是以自己為例，混跡十數載才買第一間樓，又視租銀環肥瘦自變自收的半不續續，一般人均可擔任不可負荷的置業，再過幾年才續換樓，管轄樓契永年經人，也為轉嫁，在他們自己，四十年前的經歷，現在下來教訓不換年代的年輕人，同時代人阻礙，1997年前，經濟恢復急速發展，曾蔭權立法會開天啓，對議員表：「今天的香港是，十千零最好」，這話聽進年輕人耳裏，只覺得噁噁話理得。

每月萬多元收入仍是貧窮

2007年，經濟陣皮金融海嘯吹得過來，失業率上調至百分之四的低位，找工作變得不困難，物價之相對平穩，在「自由」的帶動下，市面一片繁榮景象，但市民怨氣有增無減，市民埋怨那些「要」要困難多，香港的收入分布愈來愈不均，應是造成市民不滿的重要原因，以上我引用日本學者大前研一A型社會的理論，指出香港，陷入阿城的危機，一年過去，後國對香港的人型，由「發覺月入一萬至一萬元之間的受雇人士」，從增繼一百萬人，占勞動受雇人，成有多，後來，我在報章撰文提出警告，這樣的收入分布必在社會上造成嚴重的矛盾和衝突。

打工仔月入萬多，「唔摩沙」錯，他們為什麼還要鬧情緒？在社會、價值事端，新進，令分析這百多萬新入介乎「萬零」萬元受壓人士的貧景，發覺他們大部分年齡在「廿五歲以下」，約有半數有專上學歷，其中部分畢業中學或畢業士，部分完成副學士課程，部分尚接受職業或技術訓練。以學歷和收入而言，這批萬多萬元收入的人，不算是窮人，他們自己也不會認窮，但他們的生活好過嗎？

月入「十」萬元，生活必需開支應「應」，他們好算貧窮嗎？為了深入了解這些年輕人的生活狀況，我邀請幾位大學畢業「十年八年」的同學來聚餐，聽聽他們的學歷和意見。廿元「今天的年輕人出來工作後，就算沒有結婚的打算，他們也希望漸離父母去自我服務，年輕人為什麼要與父母同住，因素很多，如學人分析「門外漢」，每套，但年輕人已是六個十，九個女，總會與父母同住嗎？香港的居住單位多只有幾百呎，年輕人怎會有自己的空間？

另外，收入分佈不均，確實幾升，誰是罪魁禍首？幾位「歲」下的大學畢業生異口同聲的把矛頭指向政府，政府偏袒地產商，不許興建廉價，「香港發展金融和地產兩個」業，「香港變成一個大賭場，發達就要靠炒樓，炒樓，下「炒樓，誠實實實的做事，月入不過萬多，萬，「飯碗唔好，「不要成家」，「買業女唔，不要發夢了。

「地產霸權」的後遺症

除政府要負責外，年輕人還感到「地產霸權」。這是近年每次遊行和抗議最常聽到和見到的口號，什麼是「地產霸權」？可以解釋，但與年輕人傾談後，我感到不安的是，為甚麼在回歸前，市民對高價地產有言，回歸後，地產商卻成為攻擊和嘲笑的對象，是地產商做錯嗎？是政府相信他們造成房價來嗎，是香港的經濟極端發展所造成現象嗎，才要一箇「地產霸權」為指控。

自此，香港不再自視的典範，「the model」，從的「土地」民，而成為被壓迫自己土地公平與平等機會犧牲。今天，這樣的入生的博如商人就替罪，買十八個就還容易呢。

自此，市民不再相信政府，他們的批評「政府」為民間團體個再，再「」的無覺政府的建層面，但政府的表現卻是這整令政這整再「不關」。怎教市民「拒絕」市民感受到的政府「和沒有把他們的福祉放在第一位，只想再如何「多做，錯，少做，錯，少怕」，日後建房屋，樓價壓壓「跌」政府又給市民「」於是，曾日採取「搶平炒」，地主「壓壓至」極化版，「市民看來有別」指責為「」。政府把市民看作犧牲。

自此，香港社會不再和諧，市民「」現戰爭「」數「十五」和「我在《回歸香港五十年》」書裏「指出，對此「」十年代時，市民如像風雲「樓船」內人數過多，擠逼得「全沒有容身」呢。

客，心實實，「做嘢要交數」，否則船「傾斜」，「眾人幫手，命乞陪」。我用這個比喻，想說明香港的經濟，很多時是逼出來的。港人其實，市民知道「做事」，絕「火咗」，香港很容易出現亂子。因為也根本沒有什麼影響港人的傳統和基礎。他們願意在短時間內生活，去「買」為這地方給予他們生存和自給經濟的空間。

今天「人談論香港的格、價值」，一般包括「人權、自由、民主」，還有「說這些話、格、價值」，無論是否必須價值或格、價值，市民真的重視嗎？我看不一定，但「說」和「做」，如果不去這些價值，人是不會成規矩做事，一個人不會有條條，「不知」和「義」不會有人則會「換骨」之「自」人權，自由、民主、法治，社會才會運作暢順，市民才會感到安全。

地產霸權，的使上「自」人民，市民就會覺得香港再不堪了。樓住屋的基本權利正被地產商剝奪，社會還有道理的講嗎？2006年及2011年兩「政府沒有決心解決市民住屋的需要，容讓私樓價格瘋狂上升，實在大大過透」市民的「政府官員常說「市民」有「士氣會主」如果樓價「跌」他們會不遷怒政府，只「樓價的升跌」對「權和自」物業的掌握，真的有人能監管嗎？他們會為了樓價的升跌而賣樓買樓嗎？」

樓價飛升逼令年輕人「傾家蕩產」他們埋怨政府沒有理會他們的住屋需要，但現地產商把市民的「面」掙錢榨干，「再相信社會有公平和正義」。

或許我接觸的年輕人太簡單了，但誰人敢言「香港近年出現的分裂、矛盾和衝突」不是「地產霸權」和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2011年，同一份發表表，簡文蓉題目是「住區題材演成畸型」，或可說明其中的轉變。

為十個月入一萬到二萬元之間的「工仔」是買家新一代，這個價格是今年「七·一」進行時能買得來的。今年「七·一」總計，人數是2005年最多，參與總計的群眾，據傳媒報導，超過半數是年輕人，年齡介乎二十至四十歲間，其中「八○後」尤佔多數。

雖說上新市仔已成香港不成文化，市民習以為常，但市民對政府施政如不是有極大不滿，當氣無排何處？二十、三十歲之輩，年輕人不會輕易上街，也們難走出來，除了對政府怨無可置外，相信更根本的原因是，它覺自己生活在這個社會裏，好像完全看不到前途，尤其甚者，他們發覺世道如此不齊，並非自己沒有努力，而是社會制度不健全，政府施政有差公民。

以這樣的觀察，我聯想到近年成為社會關注的貧富懸殊問題，這是個中央領導人也認為新舊政府必須解決的緊要民生問題。不過，提超貧富懸殊，政府的反應總限於如何改善窮人的生活，其他就好像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

就這樣，政府 1986 年成立扶貧委員會，兩年後解散了。委員會的成效如何，見仁見智，但委員會的「千多項建議大多得到落實，扶貧只是第一階段，貧富懸殊，隨之來的最低工資，這個政府難以堅持沒有可能的勞工權益，今天成為事實，工會領袖過去的努力應防不可忘，而中央領導人似乎要認真解決，個子也有助最低工資最終落實推行。

這樣，基層工人的工資提升，「貧富懸殊」可改善嗎？當然是「否」的，最低工資只能令收入差距不再惡化下去，那麼，香港的貧富懸殊又是怎樣的變化。跨坐六十年來，香港的收入分配出現了怎樣的變化，現在的貧富懸殊有什麼特色。

我生於戰後初期，那時窮人多，「絕大多數」，且多是中國大陸逃來香港的難民，家無定所，很多老弱病生者也無所支撐，患病的又苦是得不到適當醫治，病近街頭時有所聞，今天，各行各業的成功人士多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生，他們回憶小時候那時，多描述在極惡劣的環境中長大，成功絕非易事。

成長，對年長一輩的香港市民來說，五、六十年代是極艱難的歲月，上述所說的成功例子絕無僅有，更普遍的情況是市民既信貧困，欲求「救苦婆金鑰匙」，的已成了「窮人書」，孩子完成小學已算幸運，更多是中途被遣返鄉，出來工作幫襯家計，我讀的，學是窮人家的學校，獲取學位升中學

的。在一班四十人中只有我和另外一位同學。

八九息分佈可謂「五」，六十年代就像一個金市場，街上皆是定金的，那些少數富貴人家，不是車上上好幾件的有錢家，就是這中國大陸來港的大富大貴。至於金市場的經濟層多是難民，他們身無長物，只是從戰亂下來的農民，他們絕不帶女，來港的目的是但求溫飽。

以前不會用國語替休來形容收入嚴重不均，但金平階層的入息分佈，難免對社會穩定造成衝擊，香港在五六十年代出現「三大項極端大的社會動亂，難的窮，兩大的政治紛爭」也，但內部沒有矛盾，中民生安穩，人心怎會覺覺動亂怎會一發不可收拾？

到了七、八十年代，研究香港變遷的學者有把這個階段形容為黃金期（golden period），因在這二十年裏，香港在經濟和社會發展兩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期間的兩極分化並，原因在香港正趕上世界工業發展的期度，經濟十數年間，達到人口有超過四成從事製造業，社會發展則完備無遺，原因是殖民地政府收緊港人自生自滅的政策，轉而採取懷柔手段，強化殖民管治的穩定和認真性。

八九息分佈而言，七、八十年代間，香港人口數目趨趨於減少，到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有數十萬所自居民是香港

是，但香港的製造業正快速轉行，是吸納廉價勞工完全沒有問題，此時香港各行各業尚在計劃階段，根本任何新興行業，無論學歷如何，只要勤奮工作，要比大陸地區不困難。

那些有高學歷的（如大學畢業生），如進入政府部門或大企業，只要不遇不測，多可晉升至管理階層，畢竟我與幾位八十年代初擔任工的畢業同學聚舊，他們已是部長級官員或機構主管。就是這樣，到了九十年代初，香港的人還彷彿以金字塔形轉變為圓錐形，吸納的人口不會減少，但也門不會如戰後初期投佔人口的大多數，取而代之是更多中產階級人士，也就是一般所說的中產。

七年後，我在本欄訪問日本學者大前研一的門派，說香港也是走上「類型社會」的言論，那時引起一陣激烈辯論。無論如何是計畫，香港始終向上移動，七十年代末確實出現了相反的方向。再至八十年代初的畢業同學為例，他們的子女多已長大成人，一些還出來社會工作，我的學生均異口同聲說，他們的子女很難有自己的機會，最令他們擔心的是，子女欠缺經濟能力組成家庭。

類型社會或許沒有在香港出現，但不爭的事實是，四兩成方畢業出來的年輕人，多出身中產，他們要徘徊在環繞階層必須知識努力，而來自基層家庭的，要往上爬則阻力重重，畢竟到「今天，香港已不再處處充滿機會和生機

貧富，也成為權力的來源。

所謂「霸權」，就是擁有土地者不但積累財富，且可把權力伸延至市民生活的不同領域，影響力無遠弗屆。市民發覺擁有土地的富商不但擁有巨額財富，還以一股強橫的勢力令他們生活艱難：工作愈來愈辛勞，生活沒有改善，付出與收穫不成比例，前景灰暗不明，人生就是一種卑的無辜和沉淪。所以，政府對貧富懸殊絕對不可掉以輕心。

按照個人技能和經驗的差距，收入分佈有差距可以接受。香港奉行資本主義，貧富懸殊是意料中事，但香港現有的貧富懸殊明顯超過了可接受的程度，也明顯是不公平制度的後果：政府監管不力，容讓富商「賺到盡」；制度向有錢人傾斜，令他們的利益得到保障；政府的政策軟弱無力，使弱者無力向強者討價還價。

要消除市民的「仇富」心態，必須處理貧富懸殊，設立關愛基金只可幫助少數有需要的市民，但不能改變他們認為政府偏袒富人的看法。我講了，要市民相信政府施政「以民為本」，制度上必須撥亂反正，以公平為基礎，推行政策時符合公義的原則。

貧富懸殊引發的民怨是大的！令人憂心的是，怨氣並不限於基層，貧者很多時把不幸歸咎於命運。其實，中產對貧

富不均同樣感到不安。他們不是憂慮自己的利益受損，而是他們看見少數人擁有天文數字的財富，三百多萬打工仔卻有一半月入不到一萬一千元。這樣的懸殊能長久下去嗎？我認識的一些富人也認為情況不健康，政府必須做一件事。

不要自欺欺人了，政府就承認貧富懸殊是動搖社會穩定的最大隱憂，就算政府不知做什麼，也應提出問題供公眾討論，共商對策。我的建議是：政府應就貧富懸殊早擬諮詢文件，釐列造成懸殊的成因和影響，並提出短期和長期的解決辦法，讓市民提點意見。

事實說明一切

到了這裏，應對回歸後的貧窮面貌來個總結。回歸後的窮人是誰？梁振英當選特首後成立扶貧委員會，委員會翌年發表2012年貧窮情況的報告，為窮人的數字提供答案：市民中，六十五歲及以上的長者，三個中有一個貧窮；一至十四歲的兒童，五個中有一個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其他市民也有生活貧窮的，但不及老人和兒童的情況嚴重。

回歸前看貧窮，看個個人，好像政府肯幫助市民，市民自會自力更生，不再窮了。但貧窮單靠個人努力就可改變嗎？回歸後，市民難覺到，所謂「授人以漁」，就算有道理，也只適用於部分市民；那些晚年生活貧困的老人，平均二十多年的退休生活費用如何解

決？又如貧窮家庭的兒童，他們可以得到公平的發展機會嗎？

貧窮由個人的問題演化為制度的缺失，引起的社會矛盾和衝突，是香港無法擺脫的枷鎖。貧窮與貧富懸殊是一線之隔，窮人不會把目光放在自己的貧困，也會與周邊的事物比較；我談貧窮，也談貧富懸殊，目的在說明，貧窮看似一己之事，但窮人也是社會一份子，與別人比較時，貧富懸殊就成為必須關注的現象。

在比較之下，就會出現今天市民常用的兩個詞語：公平和公義。公平和公義的意思，我從小便聽老師解說，為什麼市民今天對事情動輒就說制度不公平，措施不公義？市民想要表達的是什麼意思？寫作此書，我的目的不在分析問題，是以我的親身經驗來解說現象。如何解決貧窮和貧富懸殊，我沒有答案；到了今天，我還不知道為什麼有人貧窮、有人富有？為什麼窮人總是這麼多？我能夠做到的，是把我經歷和所看到的，如實的說出來，我相信唯有事實本身才可說明一切。

有一次，我和一位拾荒的老婦交談，她正把街上拾到的廢紙皮交給回收商，我問她：做了一整天，辛苦嗎？她沒有回答，從衫袋裏拿出一張十元紙幣，另一個五元硬幣，表情好像說：就是這麼多！我知道了，一張十元紙幣和一個五元硬幣是最真實的答案。

「香港有什麼變化而令我有執筆的決心？首先，香港社會出現了根本性的改變，特別是我熟悉的貧窮，情況跟不一樣。三十年前，我認為香港的貧窮已非「吃不飽，穿不暖」，今天再這樣形容貧窮，看來也不再貼切了；其次，當視香港的收入分佈極不公平，貧富懸殊，香港的穩定會受到破壞嗎？第三，香港的住屋問題轉化為階級矛盾，抨擊「地產霸權」的聲音此起彼落，香港的房屋建設為什麼淪落到如斯地步？第四，香港的家庭關係支離破碎：年輕人結婚、不生育，老人被形容為「社會包袱」，親情去了哪裏？最後，香港人追求的「獅子山下精神」是怎麼一回事？「獅子山下精神」仍存在嗎？」

——周永新

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講座教授周永新，目賭六十年來香港社會的動盪與演變，指出香港已出現根本性改變，特別是人所不願見又傷心劇不同的貧窮問題。本書結合周教授戰後在香港的成長經驗，以及四十多年來在社福界工作及教學的親身經歷，主要圍繞香港社會的貧窮面貌作比較及探討。周教授強調，現時香港的貧窮已由個人的問題演化為制度的缺失，成為結構性的問題，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和衝突，是香港無法擺脫的枷鎖。

其實，貧窮面貌所反映的，又何止限於窮人的物質生活？貧窮又豈可與社會其他現象分別？各位可以借周教授的慧眼和真人真事的敘述，透視香港社會六十年來的貧窮真相。

ISBN 978-986-8280-82-5



9 789868 682802 >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98元



Publish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98元

透過上環分館、圖書館、社區中心